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青山血淚》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9月

目 次

我家的三十年·····	开封市紡織印染厂女工	周玉兰	3
九死一生·····	贵阳市新华废品加工厂厂长	侯玉英	11
掏粪工的今昔·····	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	时传祥	19
苦难的养成工·····	宁波和丰紗厂副厂长	余阿青	27
血泪凝成的“双刀”皂·····	广州源昌肥皂厂工人	周平	34
請客·····	沈阳机車車輛厂	鄧宝章	41
青山血泪·····	川西北伐木厂老工人	黄志	47
煤海恩仇·····	淮南煤矿谢家集三矿	赵揚全	118
党呵,我的再生母亲·····	常州民丰紡織厂	赵誠	131
“五一”节的回忆·····	杭州市重工业局副局长	吳宝坤	143
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	上海楊树浦发电厂工程师	魯宝林	149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青山血淚》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9月

目 次

我家的三十年·····	开封市纺织印染厂女工	周玉兰	3
九死一生·····	贵阳市新华废品加工厂厂长	侯玉英	11
掏粪工的今昔·····	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	时传祥	19
苦难的养成工·····	宁波和丰纱厂副厂长	余阿青	27
血泪凝成的“双刀”皂·····	广州源昌肥皂厂工人	周平	34
请客·····	沈阳机车车辆厂	鄧宝章	41
青山血泪·····	川西北伐木厂老工人	黄志	47
煤海恩仇·····	淮南煤矿谢家集三矿	赵扬全	118
党呵，我的再生母亲·····	常州民丰纺织厂	赵诚	131
“五一”节的回忆·····	杭州市重工业局副局长	吴宝坤	143
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程师	鲁宝林	149

我家的三十年

开封市紡織印染厂女工 周玉兰

三十年前，我家住在开封市青云街。父亲是个泥水匠，媽媽在包袱坑街妇女职工厂做縫紉活。父亲死时，媽媽刚刚二十八岁，我也才三岁。孤女寡母，本来生活就够困难了。不久，我媽媽又受了恶霸保长李先亭的污辱，怀了孕，生了一个妹妹。

媽媽一个人做工，要养活三口人，那真是难。一天有时吃三頓稀飯，有时連三頓稀飯都吃不上。

工厂里又是好几个月不发工資了，我們的生活，更像是在刀尖上一样难过。一天，快晌午了，我抱着妹妹坐在門口的大树底下，等媽媽回来，带点东西吃，好填填肚子。盼着，盼着，看見媽媽走来了，我們心里真是高兴。可是，媽媽走近跟前，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拉着我，眼泪直往衣襟上滴。我看見媽媽胳膊上紅一道紫一道的，問媽媽这是为了什么？媽媽說，是她向管理員借錢，被管理員用网綫条打的。沒有錢，也不能坐着等死，媽媽把里面穿的一件破布衫当了几个錢，买了一些米。

我越来越大了，生活的担子不能老叫媽媽一个人担着。九岁，我就进媽媽做工的那个厂里学落綫。这里虽然是个工

厂，却没有机器设备。凡是落线的都是童工。每个童工面前，有部木制的手摇纺车。坐的是潮湿的土地上摆着的几块青砖。人小，干的活可不少，每人每天得落四十个线轴。第一天，我只落了三十个线轴，管理员抓起我的辫子，拉到办公室里，要我跪下就打手板。为了少挨打，从此每天天不亮，我就和妈妈到了工厂。晚上，星星出来了，我们才回家。

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占领开封以后，工厂关了门，我和妈妈都失业了。没有办法，母女俩给人家洗洗衣服，补补袜底，挣几个钱维持生活。有时，我领着妹妹，端着碗，站在路旁乞讨。

一天，妈妈领着我和妹妹去东司门讨饭，迎面忽然走来了李先亭。这个狗东西，国民党时代是保长，日本人来了，仍然是保长。李先亭看见我妈，劈头就说：“你不是周家的寡妇吗？跟我走！”在那时候，孤女寡母怎能抵挡得了一个大汉奸。我们被关在李先亭开设在双龙巷的赌场里了。他逼迫我们母女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转，侍候赌客，给那些脑满肠肥的大汉奸特务们点烟、叫饭、倒茶、打扇。拿的头钱，交给他到乡下买房置地。一到麦收季节，一輛輛大牛車，往他城里的家送粮食。我们在这里，眼睛熬肿了，熬红了，还吃不饱，穿不暖。

受不了这非人的摧残，我们母女三人借着机会逃跑了。我们逃出的那一天，正是腊月二十几，眼看就要过年了。有钱人，都在忙着办年货。我们娘儿三蹲在西门根城隍庙里，要锅没锅，要勺没勺，要铺没铺，要盖没盖。这日子咋过下去呀？正在这时候，一个人贩子来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妈妈一狠心，说把妹妹卖了吧！当人贩子领人的时候，我妹妹抱住妈妈的

腿，哭死哭活不肯走。媽媽心里如刀割一样，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說：“孩子，別哭啦，不卖你啦，要餓死，咱們娘儿三就餓死在一起吧！”我看着，妹妹要不走，娘儿三真会餓死在一起的，就忍痛对媽媽說：“媽媽我願意走，把我卖了吧！”媽媽沒作声，搖了搖頭。人販子看見媽媽不願卖人，接上去就說：“不願卖，当也可以，当了到时候还可以贖回来。”媽媽听他这样說，心有些动了。就把我以一百二十元的身价，两年为期，当出去了。这时，我才十四岁。

誰知，这一来，我掉进了一个火坑。我被卖的地方，是开封市第四巷天乐妓院。一到那里，就叫我学唱京戏，学哼黄色小曲。夜里睡着睡着，老板李亭义把被子一掀，就得起来調嗓子。每天老板和老板娘躺在床上抽大烟，我得跪在床前的脚踏板上，把学的东西唱一遍。一次唱《苏三起解》，有一个弯沒拐好，老板李亭义拿起烧紅的大烟針，扎进我的腮帮里面，鮮血順嘴流。

两年到了，我媽媽来向李亭义要人。李亭义不仅耍賴不給，还又以二百元的身价，把我轉当給安阳文德妓院。从文德妓院回来，我已經十八岁了，不幸怀了孕。妓院老板李亭义恼在脸上，恨在心里，要把胎儿打掉。还口口声声說：“我这里不能有一个吃閑飯的人！”他讓我吃鉄末，吃鉛粉，什么打胎药都吃遍，嗓子都烧了，胎儿还是沒有打下来。沒人性的李亭义，看吃药不行，就找来几个人，把我脸朝上按在地上，将一条长板凳放在我的肚子上，四个人踩着我的四肢，两个人站在板凳上，使劲往下压。胎儿到底被压出来了，我也不知死过去几



次。从此，我站不住，坐不稳，一病不起了。老板不愿我在这里吃闲饭，才一脚把我踢出了妓院的大门。

我挂着一根秫秸棍，回到家里。妈妈看见我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想哭都没有眼泪了。这时，家庭生活仍然很困难，又加上我这个病人，怎么办呢？穷人怜穷人。在开封铁路机务段做工的赵士祥，很同情我的遭遇。他把省下来的钱，给我治病。病好以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家里有个男人，

好像就多根顶梁柱。妈妈满以为，这以后，日子该好过了，起码少受些欺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结婚刚刚两年，大祸又临头了。一天，日本鬼子诬赖赵士祥和别的几个工人把马达偷走了，马上把赵士祥抓进铁路局的特务班，捆到一条长板凳上就打。打完以后，又把赵士祥拉到水龙头下面，往嘴里灌水。接着，又把我抓去灌煤油。因为我们没有偷东西，打死我

們，也沒有辦法承認。關了我幾天，問不出名堂，才把我放了。

出來以後，我借了錢，買了一雙禮服呢面子的鞋子，兩盒點心，給翻譯官送禮，想請他們把士祥放出來。可是，只因禮不多，起不了作用。

轉眼之間，大半年過去了。一天，忽然聽說，特務班里押的中國人，不久都要送到東北去做勞工。這真是晴天里一聲驚雷。我急忙跑到特務班要求和士祥同去。日本人同意了，判我和士祥同罪，到東北去服勞役。收拾好行李，我要走了，媽媽拉着手不放，妹妹抱着腿直哭。我也泣不成聲地說：“士祥一走上萬里，啥時候再回來？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去受罪。”說着，我跪下給媽磕了一個頭：“我再叫你一聲親媽。這一走，能回來咱們再見面，萬一回不來，你也就別想我了。”

光聽說他們要走，但是不知道哪一天走。我帶着行李守在特務班門口。終於守到時候了——第三天頭上，開始往東北發配“犯人”。第一批“犯人”，被繩子綁着走過去了，第二批，第三批……也接着走過去了，我不眨眼地找，沒有找見士祥，心里很納悶。人沒有找到，我不走，繼續等着。第二天早晨，天剛麻麻亮，從特務班推出一個人，撲通倒在地上。我忙走近一看，呀，這就是士祥。大半年的監獄生活，真是把士祥折磨得不像樣了，頭髮長得遮住了耳朵，胡子把上下嘴唇蓋得嚴嚴的，滿身疥瘡散發着腥臭味。我推着他叫了半天，他不答應，也不會說話。這時，我才覺悟到，為什麼沒有把他發配到東北去，原來是他已經不能服勞役了。

在工友們的幫助下，這個送錢，那個送物，士祥的病養好了。這個時候，抗戰勝利了。我們又滿以為該過好日子了。

士祥十六岁就当学徒，学会了一手好钳工手艺，不愁找不到个工作。可是，一年过去了，士祥不是被抓去当小伕 給国民党军队修城墙，就是卖小工挣几个钱。好不容易才在相国寺曲剧院找到个收门票的职务。

一天，士祥正在收门票，前面来了一个人。他身穿白衬衣白裤衩，脚上拖着拖鞋，手里拿着个芭蕉扇，径直朝戏院里走去。士祥向他要票，他眼一瞪说：“老子看戏从来不买票。”

“不买票不行，我们这台前台后的人都是靠卖票生活的。再说你不买票，经理看见了也不答应我，”士祥耐心地解释着。

“不买怎么样？”

“不买不能看戏！”

“好吧！”说完，他扭头就走。原来这个人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去了没有多久，就叫了一批人，上去就打赵士祥。



赵士祥的头被打破了，鮮血直流。幸亏剧院的职工們跑来解围，他才脫身跑回家来。

頂梁柱又倒下来了，家庭生活还是沒有着落。听说郑州豫丰打包厂要人，我就和赵士祥到郑州去了。到了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住处。銀行街有个漏棚搭的电影院，等电影散場以后，我們就睡在那里。

因为这里是打零工，每天半夜就得到厂門口排队。一直等到太阳出来，經理韓子靜，才手执文明棍，大搖大摆地出来，把大門打开，一五一十地往里数。什么时候数够了，大門砰地一关。沒有被数进的人等于白排。早上虽然被数进了，可还担心着能不能干到晚上。記得有一次，一个背花籃的男工，把花籃放下解溲去了。韓子靜看見之后，毒打了一頓，一个子儿沒給，就攆出厂去了。他一边打还一边罵：“看你一天要解几次溲？”我們女工打花，打一天手肿得像个发面蒸饅，也不敢歇一会。

就这样，我每天到厂里去做工，士祥拖着个病身子在街上流浪。在那漫长的黑夜里，我們是多么盼望太阳早点出来呀。

一九四八年九月，郑州、开封先后解放了。

解放后，我先是在开封搞街道工作。后来到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当修理工。在这里，人人同情我的遭遇，关心我的身体。沒有多久，在旧社会得下的关节性梅毒症，就治好了。有人問我，治病花了多少錢？我答不上来。因为全部医药費由公家开支，我自己一个子儿都沒有花。

經過那次老板把孩子压出来以后，我的輸卵管已經破裂，再不能生育。常常因为沒有孩子感到不順心，我妹妹非常疼

我，把她的男孩送給我了。我妹妹現在北京当教师，媽媽也在北京欢度晚年，孩子在北京的一个中学里讀書。每逢假期，孩子就到开封来看望我們。

在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我是行政組长，又是車間工会的劳保委員，常常要拿笔。但是，在旧社会里，我九岁就去做工，沒有进过学校的大門，大字不識，两眼黑，拿不起笔来。工厂领导非常关心我，开始讓我脫产一个月，参加扫盲学习。摘掉文盲帽子以后，又讓我脫产几个月，上初小班。現在，我三十九岁了，还在业余学校里，坚持文化学习。《紅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能从头至尾把它讀完。

一九五八年我由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調到开封紡織印染厂来。印染厂的领导同志，不但关心我的文化学习，更关怀我的政治进步。漂染車間主任給我送来了三卷《毛泽东选集》。車間工会主席給我送来了《怎样正确对待入党問題》。我現在正在努力学习。

講到我的丈夫赵士祥，也和我一样，解放后一个月，就有了工作。开始是在开封高級工业职业学校附属工厂做水暖工，后来調到郑州。一九五八年又由郑州調到开封紡織印染厂。因为他工作努力，常常受到厂领导的奖励。

至于經濟生活，沒有必要多說，只要看看我們床头柜上摆着的收音机、大箱子小箱子旁边放着的飞鴿牌自行車，就会知道我們今天的生活，和旧社会有多大的不同了。

吳靜波插图

九死一生

贵阳市新华废品加工厂厂长 侯玉英

我这个过去被人叫做“叫化子”、“破布老奶”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在旧社会，我六岁死了妈，就到地主家当丫头，后来，帮人、卖奶、拣破布都干过，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可是，在新社会，我却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并且参加了工作。想起这些，我怎能不恨旧社会、不爱新社会呢？

我是贵州省毕节县人，六岁那年，妈妈生下我第二个弟弟后，得了产褥热，因为没钱医治，不久就死去了。当时我父亲在煤山上给人家挖煤，养不活我们，就把我送给一个姓肖的大地主家当丫头。从此，我就离开了家。到地主家不久，我父亲在煤洞里被垮下来的煤砸死了，我弟弟也下落不明，我成了孤儿。

在地主家，挨打受骂，过的是比牛马还不如的生活，这是不用说的，有两件事，我永世难忘。

我满了八岁，除了服侍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外，地主还给我安排了活路：放一条牛，顺便上山挖树疙兜回来当柴

烧。这样，我每天都和长工們一样，天不亮就起床工。我才八岁，从小生活苦，身体特别瘦弱，扛鋤头都很費力。尽管这样，活路还是得干，不然不仅沒飯吃，而且棍棒就会不留情地打在你身上。一天早晨，我拉着牛把鋤头扛上肩时，因体力支持不住，鋤头从肩上滑下来，正好打在一口鉄鍋上，当哪一声，鉄鍋給打破了。站在旁边的地主老爷一看鍋烂了，大发雷霆，一手拉住牛，一手抓了根竹竿，沒头沒脑地朝我打来。我知道闖下了大祸，扭头就朝門外跑。我怕挨打，就朝沒人家戶的山林里跑去。这样，我就在岩洞里蹲了几天几夜。我餓极了，就跑出洞去摘些野果吃。后来，我舅舅上山割草，发现我躲在山洞里，他可怜我，但又畏惧有錢有势的地主家，不敢把我接回家去。为了給我找条生路，他就到姓肖的地主家去求情，并答应賠給肖家一口鉄鍋，这样，肖家才答应讓我回去。虽然我舅舅替我賠了鍋，但是地主并沒就此罢休，我回到地主家那天晚上，又遭了一頓毒打。我被打得遍体鱗伤，第二天还得照样放牛、挖树疙兜。

在地主家，我夏天吃的是米糠煮野菜，冬天吃的是紅子面（用野生植物紅子晒干磨成的面）加米糠，从来沒有吃过一頓大米飯。我九岁那年，快过旧历年时，地主家忙着办年货，泡了一大缸小米准备打粑粑。我实在忍不住飢餓，悄悄地吃了一點粑粑，地主就指揮他的狗腿子把我捆起来，吊在树上打了一頓，他一边打，还一边罵，問我下次还敢不敢再吃他的粑粑。打够了，就脫光我身上的衣服，把我丢在門外的雪地里。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呼嘯，地上的积雪已結成冰渣，就在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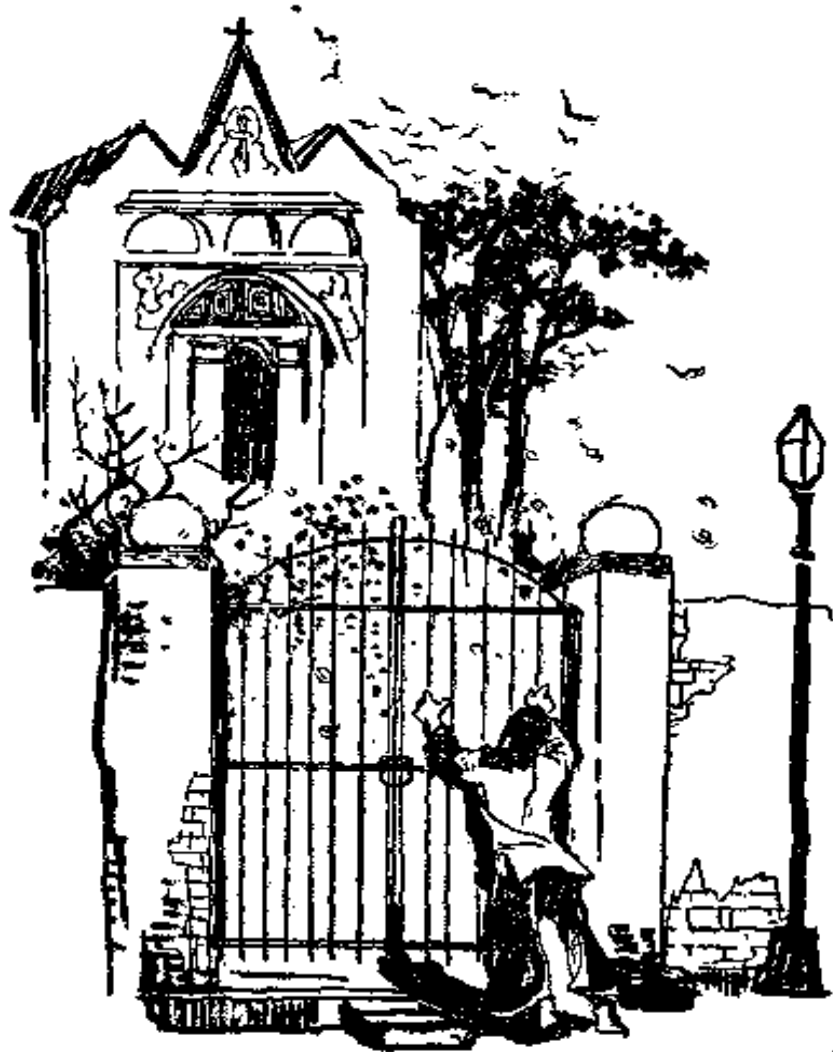
的天气里，我带着满身的创伤，在雪地里躺了好久，浑身冻得发紫，不省人事。后来，还是别人求情，我才被救起来，幸免冻死在雪地里。

我逃出这个“人间地狱”，是十岁那年。一个远房亲戚见我在地主家挨打受骂，耽心我有一天会被他们打死，起了救我的念头。一天晚上，他冒着危险，把我悄悄从地主家带出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离开了毕节，一直逃到了黔西县。在黔西县，他把我送给一家姓王的贫苦农民抚养。王家有母子五人，四个儿子都在一家油房里当长工，母亲佃地主的田种，虽然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他们同情我，待我很好。我就在他们家度过了五年。我十五岁那年，王老太太就介绍我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陈学明。陈学明也是个孤儿，给地主家当长工为生。没有住处，结婚时，他现搭了间叉叉房（几根木头支着的茅草棚）作为新房，我们吃的、住的虽比地主家的猪狗不如，但比起当了头的日子要自由些了。

我总算有了个家。结婚后的第三年，我刚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陈学明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当兵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怎能忍心离开他呢？当他从黔西县被押送去贵阳时，我就把最小的孩子送了人，带着两个大孩子赶到贵阳。在那个社会，我赶到贵阳又有什么用呢？我找到关押他的地方，苦苦哀求长官放了他，当官的连理都不理。后来他又被押走了，押到什么地方去，我就知道了。我母子三人就流落在贵阳。

为了谋求生活，我就去帮人。有人介绍我去给伪贵阳保

安司令部的一个姓楊的連长带孩子。一到他家，他看我带着两个孩子，就說：“带孩子的不行！”怎么办呢？再找不到工作做，就要餓飯了。生活逼得我把两个孩子一起送进了外国修道士在貴阳虎門巷口設立的那所孤儿院。本来，我是想把孩子送进去暂时住一段時間，等我幫人攢积点錢，就把他們接出



来。我把他們送进孤儿院那天，他們哭着哀求我：“媽媽，明天来看我們呀！”当时我虽然很难受，但我想能够暂时給他們找个地方混碗飯吃也好，我就給他們揩干眼泪說：“你們好好在这里，媽明天来看你們。”誰知道，这句话竟成了我們母子生离死别之言！第

二天当我来到孤儿院門口时，大門紧閉着，我敲开大門后，出来的那个看門人却告訴我：“这里的規定，不准看小孩！”說完，砰的一声，就关上了大門。我难过极了，伏在門上失声痛哭起来。哭有什么用呢？我一連半个月天天到孤儿院門口哭，但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在那个世道，哪有人管我呵！就这样，我和那一对天真可爱的孩子再沒見面了。后来，听说他們都被那些帝国主义强盜残害了。

我失去了孩子，但在那个姓楊的伪軍官家里，並沒有得到好的待遇。一天，姓楊的和他的大老婆、小老婆吵架，我手上抱着的孩子被吓得哭起来，他蛮不講理地說我帶不好孩子，不由分說地取下挂在墙上的枪来揍我，我連忙把孩子丢在床上，跑开了。我連二十多天的工錢都沒有要，就离开了这个充滿臭气的肮脏环境。

后来，我另外帮了几家人，改了嫁。我的第四个孩子出痧子时，照顧不好，得了其他的病，因为沒錢医治就死了。当我生第五个孩子时，我发高烧，病得不能起床，丈夫又出外謀生，家里沒有一个亲人；邻居們見我发烧，以为我得了鸡窝寒(伤寒)，怕遭傳染，也不敢到我住的房里来，所以我生孩子时沒人替我接生，也沒有人照顧我。我在床上生孩子，只有自己动手接生，因为我病得自顧不暇，知道沒法养活这个孩子，就把孩子放进床边的大沙罐里。刚生下的孩子在沙罐里不停地呱呱啼哭，我却沒能力管他，時間长了，孩子的哭声微弱了，漸漸地就听不到了。孩子的每一声啼哭，都像一根鋼針扎在我的心上，可是当时我又能怎样呢？生了孩子以后，附近

一家豆腐店的一个挑水工人，见我没人照管，很同情我，每天都送一罐膏水（又叫膏子水，是制豆腐时剩下的汁水）给我吃。他又害怕被传染上病，不敢进我的屋，他每天爬上楼梯把一罐膏水放在楼门口就走了。当时我既无钱买药治病，也没有饭吃，每天躺在床上就靠喝膏水吊命。这样拖了好些天，我的病渐渐减轻了。我算熬过来了。病轻了，我才扶着板壁，从楼梯上爬下来，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屋后的院子里。后来每当我经过这埋葬孩子的地方，禁不住要回忆起这段悲惨的日子，掉下泪来。我的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孩子生下来后，都因为饿、病而死去。直到第九个，才养活了。这是个女孩，长得小巧，逗人喜爱。可是当她才两岁时，就被坏人拐走了。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在次南门一户人家看见了她，一打听，才知道她是被人卖了的。他看到这孩子遭虐待，心中不平，就设法将孩子弄出来，送还我。看到孩子面黄肌瘦的样子，我一阵阵辛酸，心如刀割，抱着孩子痛哭了一场。当时我生活困难，但我下决心撑住一切困难，把孩子养大，于是我就把她藏在家里。我在旧社会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有九个都被那万恶的社会吞噬了。现在就仅仅剩下这一个，这一个也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

那段时间，我丈夫李福胜在“老不管”餐馆当杂工，工资仅能养活自己。我每天到垃圾堆里拣来一些破布，把它洗干净打成布壳去卖。光靠这点收入也养不活我，因此我生了孩子以后，就挤奶卖给那些有钱人家，来维持生活。尽管我俩整天奔忙，还是免不了要饿饭。记得一九四九年初过旧历年

时，有钱人家早就准备好美酒、大肉，我们家到年三十连一颗米都没有。李福胜向老板借钱没借着，空着手回家；我把布壳拿上街去没人买，只好把布壳扛回来。已经是下半天了，别家都开始做饭了，没办法，我就把沙罐装上水，放在灶上烧，拿着口袋出去借米。我那五岁的小姑娘素珍，就坐在门口眼巴巴的盼望着我回家。天渐渐黑下来了，沙罐里的水煮沸了几次，又对了几次冷水，我还没回家，孩子在门口哭起来。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米还是没有借到，我只得空着两手回家。在那种年月，穷人都一样，哪有米借给我？而富人又怎肯把米借给我们这些穷人！没有饭吃，我们一家三口抱着哭了一夜。这就是解放前穷人的年三十夜！

解放时，旧社会留给我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口沙鼎罐、一床自己编的野麻被、一个小木盆、半床烂草席和一盏旧油灯。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身上穿的筋筋缕缕。

想起刚解放时的情景，对比今天我的家，真有天渊之别。现在我家三口人都参加了工作，家里衣橱帐被、桌椅板凳一应俱全，光是被子就有五床。我不仅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也翻了身。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领导的布壳生产组扩大了，办起了废品加工厂，除了生产布壳，我们还收集废纸、废金属，我担任了厂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九六〇年三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天起，我更清楚我们穷人为什么革命，和我今后该如何工作。一九六〇年，我又被选为贵阳市南明区人民代表。党和

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但我觉得我没有为党和人民办多少事。在旧社会我活了三十四年，谁也没有给我这样好的工作环境，那时候你想做也没有人要你做呵！

我恨旧社会，我爱新社会，怎么恨？怎么爱？我想，我只有永远记住过去的苦，把全部力量放在工作上，把厂办得更好，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并且把我的过去和现在告诉下一代，让他们看看旧社会穷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才对得起今天的幸福生活。

李士仁整理

刘勃舒插图

掏粪工的今昔

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 时传祥

我是北京市崇文区的一个粪便清除工人。干这一行，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我挂着全国群英大会代表的红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还被选上了大会主席团；就在这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会主席团时，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都跟我握过手，并很关心地问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一个在旧社会做了二十多年牛马的掏大粪工人，竟能得到这样高的荣誉，这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心里感到热烘烘的，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回想过去的事情。当年的苦难，又一幕幕地摆在眼前。

我的老家，住在山东省齐河县。三十年前，家里只有八亩地，靠年老体弱的父亲一把泪一把汗种着它，养活着我们一家大小八口。天灾人祸，地主剥削，常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有一年，又发生了大灾，在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向地主借了二十吊钱。驴打滚的利息，不久就变成了五六

十吊。地主知道父亲还不起，硬逼着把家里仅有的二亩好地押了去。有地都过不下去，丢了地日子就更难对付了。父亲在气急之下病死了。

父亲死去，家里失去了支柱，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那年我已经十五岁了，父亲一死，我就得帮助母亲挑起家庭的担子。我走到母亲跟前，安慰她说：

“娘，不要哭吧，我出去挣钱养活你。”

母亲看着我又黄又瘦的脸和比桌子稍高不点的个子，抱着我的头哭得更厉害，死活不让我走，说：“孩子，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吧。”

不走怎么办呢？吃什么呢？出去总还有个指望呀。于是，向邻居借了一块钱做路费，用根草绳把腰一扎，就离开了家乡。

阴沉沉的天，周围茫茫一片，我一个从来没出过门的孩子，往哪里走呢？老天爷呀，哪里有穷人吃饭的地方？心里非常难过。我把所有的亲友都想了一遍，猛然想起有个本家叔叔在北京。北京地方大，也许有吃饭的地方。还是投奔叔叔去吧。

有了目的地，劲头也就足了。没钱坐车，我决定走到北京。晚上困了就睡在人家的草窝铺里，饿了就讨点吃。整整八天八夜，好容易来到了北京。

我这个叔叔是个开粪场的，听说还雇着工人，心想，凭着本家的关系也许能给我找个事干。等我打听出住地以后，出来见我的，是个穿戴很阔气的太太。我一问才知道这是没有

見過的矮子。我親熱地喊了一聲：“矮子。”沒想到她斜着個眼睛厭惡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把大門一關，說：“我們沒有你這麼個本家。”

我的頭“噹”的一聲，差一點沒倒下去！心想：“天呀，人有了錢竟然六親不認了。”

我離開他們的門口，天已黑了，雪花紛紛揚揚，西北風“嗚嗚”地叫。我拖着累得像棍子一樣硬的两腿，爬到鐵道旁邊，哭了一場，就在一個涵洞口睡了一宿。

第二天起來，遇到一個背糞桶的老人。我走上前去，問他：

“老人家，你能給我找個吃飯的地方嗎？”我落魄的遭遇，引起他的同情。他嘆了口氣說：

“唉，孩子！這年頭，哪有咱們窮人吃飯的地方呢？先跟着我去吧。”沒辦法，我只有跟着他走了。老人把我領到他的住處。我才知道他叫李傳道，是個掏大糞的工人。

李傳道老人把我領回家以後，就像對親生兒子一樣，每天用自己血汗換來的幾個錢給我買飯吃。我實在不忍心這樣麻煩他老人家，便一再請求離開他家。後來老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個糞霸門下給我找了一個工作。

這個糞霸胖得像個肥豬，瞪着一雙虎狼眼問我：

“在我這兒能好好干活嗎？”

“能。”我答應。

“好，到那兒住下吧！”他往一個破草棚子指了一指。

這是一個用泥巴和高粱秸子做的草棚子，棚頂破得露天。

剛一進門，就看見一頭驢拴在門口，腥臭味撲鼻子，熏得人噁心。我以為走錯了路，再往里瞧一眼，才發現裡面還蹲着幾個工友，個個面黃肌瘦，活像蹲了幾年監牢的囚犯。他們用可憐的眼光看了看我以後，說：“小老鄉，住下吧，這就是咱們的家了！”他們把避風的一面讓給了我。我感激得流下眼淚。這間草棚子，真是地獄。夏天，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外面不下了，裡面還滴嗒水。白天蒼蠅糊臉，夜里蚊子撞頭，賣一天苦力，連個安穩覺都睡不上，剛閉上眼，就被驢叫聲吵醒。冬天，風帶着雪往里直竄。睡醒一覺，眼毛都險些兒凍住。

每人一個破舊的獨輪小車，再加路不好，推起來一歪一扭，真吃力。每天，天還不亮糞霸就大喊大叫：

“起來，快起來干活去！”

晚上直到滿天星斗才讓停工。下雨下雪也得照樣干活。反正不讓人閑一天。

每天吃的都是粗面子做的窩窩頭和糞霸吃剩下的亂菜叶子。每月說是有工資，事實上幾個月不給一文錢。他們有官府做後台，誰也不敢問。有個姓陳的老工人因為問了問，就被痛打了一頓。我們的衣服，和叫化子穿的一模一樣。我的一條棉褲穿了八年，破得露出屁股，從垃圾堆里揀點破布，趁晚上睡覺時脫下來補一補，糞霸還說我浪費了他的燈油。橫眉怒目地喊着：“油是我花錢買的！”

家，誰不想有個家呢？可是像我們這樣人有了家眷也養活不起。那年我已二十多歲了，母親在山東老家給我找了個媳婦，一連來了二十多封信要我回家娶親，我不僅沒有路費，

連條新褲子都沒有，怎麼回家呢！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我還是回不了家。急得岳父把閨女給送來了。人家到娶親時都是歡天喜地，我可愁得幾夜也睡不着覺。怕以後沒辦法養活她。妻子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怕愁壞了我，一再跟我共同想辦法。最後好歹找了個破屋子，在街上揀了個破罐頭盆做鍋煮飯吃。這就算個家了。

每天，妻子沿街揀煤渣子，揀破爛，我白天給糞霸干完活，晚上再去拉人力車。辛辛苦苦，沒白沒黑的奔命，才算沒有餓死。

在那種社會里，勞動人民根本沒有地位。掏大糞就更甭提了。幾乎沒人把我們當人看待。公子哥、小姐們見了我們，都把鼻子一捂，躲得遠遠的，像看見瘟神似的。還罵我們是“臭屎蛋”。有一次我在一個闊老爺家裏掏完糞，又累又渴，想喝點水。他家的僕人剛拿起勺子，就被那個闊老爺一聲喝住：“別給他，沾脏了咱的勺子，給他那個碗用。”我拿起那個碗一看，是張貓的，里面滿是貓屎。我氣得水也沒喝，就走了，出了大門後，偷偷地流了幾滴眼淚：窮人呵！哪一年才能過上人的生活？

日本統治時期，日子過得就更苦了。有錢有勢的統治者們，整天拿折磨窮人尋開心。

有一次，我正推着小車走，兩個日本鬼子說我沒給他行禮，照著腰就是兩腳，把我踢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要不是趕忙連滾帶爬地逃掉了，准被他們用刺刀捅死。還有一次，無緣無故地被一個偽警察打了兩棒子，血順著脊梁往下淌，疼得我

差一点昏过去。回到屋里就病倒了。病了，想喝口面湯都沒有，几个穷兄弟干着急没办法，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日本鬼子败了，换来了国民党和美国鬼子，我們的痛苦有增无减，有一次被美国鬼子的汽車一下撞倒，腿摔得露出骨头，昏了过去。可是美国鬼子却开着汽車狞笑着揚长而去。

实在受不了这份苦的时候，我曾向粪霸辞工不干。誰知連不干的自由都沒有！这些野狼看我还年輕，还有油水可榨，坚决不讓辞工，和地方当局串通一气，扣住我不放，对一些血已被他們吸干的工人，就不同了。有一个老工人叫石加斋，給粪霸头干了几十年，得了一身病，丧尽天良的粪霸，見老人骨髓已干，再不能为他們干活了，便把三角眼一瞪对老人說：“你另去找事干吧。”在一个大雷大雨的黑夜把老人推出門去，老人含着悲憤的眼泪，頂着一块破席子向漆黑的郊外走去。第二天发现老人被雨淋死在一棵树底下。还有一个工人，因为干活碰坏了腿，成了残废，粪霸就偷偷地把他拖出去活埋了。

这些苦难几天几夜也說不完！

北京解放后，这些吃我們肉喝我們血的豺狼都得到了他們应得的下場。过去的苦难，一去永不复还了。党和毛主席搭救了我们，我們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我們做了国家的主人。

国家为了減輕我們的体力劳动，全部改用汽車运粪。我們每天都是坐着汽車到工作地点，再也不用推过去那种独輪小車打轉轉了。住的是瓦房，又亮堂又清洁，屋子里还有收音机。工作时有工作服。病了有公費医疗。有个工人名叫黄文

生，由于旧社会的折磨，得了很重的肺结核，党想尽各种办法为他治疗，把他送到大医院去动了手术，共花了一千多元的医药费。我们都感动地说：“要是在解放前，不要说一个黄文生，就是十个也早死了，不死也被人家活埋了。”

我们的社会地位，跟过去简直不能比较。到处受人尊敬，人人亲切地称呼我们工人同志，小朋友叫我们工人叔叔。夏天，老太太听说我们要到她家去掏粪，事先就给准备好了茶水，不喝不讓走。我的老伴是公社社员，四个孩子都上了学，大孩子在中学。我还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还当选了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

党和毛主席搭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很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挑肥拣瘦。党告诉我们说，粪便清除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假使都不干这个工作，就会影响建设。于是，我们就深深地热爱着这一工作。干劲都十足，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们。有一条胡同因为修理下水道和下大雨，汽车开不进去。我就带动大家往外背粪，这一条胡同有二、三里路长，泥濘满路，深一脚浅一脚，走起来十分吃力。我们从早晨三点开始，一直背到下午两点多，共背了一千多桶，我的肩膀虽然都磨破了，心里却挺愉快。为了搞好工作，我便发动全班展开了改进服务态度的竞赛，处处使住戶满意。住戶希望我们不在他们吃饭的时间去掏粪。我们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时候就掏公共厕所。在去掏粪以前，先向住戶打个招呼，要他们不在院子里晒衣服，以免弄脏。已经晒上了的，就帮助他们收拾一下。每次

掏完粪，都帮助住户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户有了困难，我们就尽量帮助他们克服。有一住户的墙塌倒在满是稀粪的厕所里，弄得无法进厕所，我就用手替他们把倒在厕所的砖头一块块捞了出来。住户老大爷感动得追着问我叫什么名字，要写信表扬我。

党发出大搞积肥支援农业社的号召以后，我就立刻带动全班同志行动起来，成为一支积肥的尖兵，到处寻找粪肥源。后来找到一个多年没有挖过的粪池，有一人多深。我马上脱了衣服干起来。最后槽口的四周，还剩下很厚的一层粪，站在上面怎么也弄不下来。我想，决不能让这些粪丢了，有一勺粪也给农民兄弟送去。这时，我便把衣服一掬就跳了进去，其他同志看到我这样不怕脏不怕累，也随着跳进去干了起来，没有一个叫苦。这一次搞了很多粪，既做了市内清洁工作，又支援了农民兄弟。

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深感惭愧。没有别的，今后只有以更大的干劲来报答党吧，前面已说过，我已干了三十年掏粪工作，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干它三十年，……

孙立超整理

苦难的养成工

宁波和丰纱厂副厂长 余阿青

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碗行工人的家庭里。一九二〇年，我虚年龄刚满八岁，阿爸因为劳累过度，背脊骨折伤化脓，卧床不起，被老板一脚踢开了。从此，家里只有靠当当卖卖过日子，连阿爸的医药费也拿不出。有一天，我的姨妈（和丰纱厂工人）来了。她对阿爸说：“让阿青跟我做厂去吧。”我一听要去“做厂”，就要离开阿爸、阿妈，吓得“哇”地哭了起来。可是呆在家里要活活饿死的呀！结果只好到和丰纱厂去做养成工。

进入虎口

那天清早，我跟着姨妈去上工。

一跨进厂门，我就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地方呀！门两旁挂着两块虎头铜牌，门里面两边摆着刀架，上面插着六把大刀和洋枪，还有两个巡丁看守着。我悄悄地问姨妈：“这些东西作啥用的？”姨妈说：“防贼人强盗的！”我们再往里走，又有三条木栅弄堂，在这里看到几个凶煞的家伙，对出来的女工浑身

上下，东搜西摸。姨媽告訴我：这是抄身，我們放工出来都要被抄过的。我心里不禁一呆：这不是把我們不当人看待么！

細紗車間里又是一番模样：工头嘴里衔着哨子“嚶嚶”地尖叫，雪白雪白的花衣像下小雪一样，連人都看不清楚。我因为长得矮小，紗錠子攀不着，就把落紗用的竹籬翻轉，人站在上面学习接头。

每天，我三點鐘光景就起来煮飯，吃了早飯，馬上就进工厂。从早上五点半開車，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半，差不多連透口气的功夫都沒有。有时候多做夜班，到了后半夜，眼皮就挂下来了。工头看見了，就沒头沒腦地打来，还拿长絨棍敲脚骨；对那些男小孩（也是养成工）就更凶了，一不順眼，飞脚就踢，把他們踢得老远；被工头打过以后，还不准哭。可怜我們小小年紀，有时候刚刚被打过，挂着眼泪又打瞌睡了。这样又免不了——一陣毒打。

那时候，和丰紗厂大量招收童工。因为童工工資低（抵不上普通工的一半），又能頂个大人用。像我們細紗車間，本当五个人管一部車，工头硬是派四个人管，多出一个人来为他賺鈔票。有一天，在派車号的辰光，我只說了声我喜欢跟一个經常教我的老手一起做，工头就随手拿起三号筒管，狠命地打我的手心，直打得手心像血饅头一样才罢休。手被打坏，接头接不快，断头就多。工头又将一根筒管猛地擗在我的額头上。打得我鮮血直流，还不准哭。我只有用花皮揩揩伤口，繼續挡車……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

那辰光，机器沒有防护設備，周围都是滿七豎八的皮带和张牙舞爪的地軸、齒輪，很容易出事故。我在这个車間里工作了八年，就亲眼看到三个童工死在細紗車下。

一个冬天的夜里，童工陈杭清被工头派到車子底下做清洁工作。車間里光綫昏隱，当他刚要翻身擦車的时候，身上的破衣服突然被滾筒軋住，人馬上被帶了进去。紧接着，車間里“轟”的一声，所有的机器馬上都停了下來。大家都明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拥到出事地点去。只見陈杭清被軋在两个滾筒中間，血肉模糊。許多人到老板那里去交涉，老板却像煞嘸介事，开口就問机器损坏了沒有？最后只答应給陈杭清家里几块木板，釘釘棺材。

那时候的紗厂里，不像現在有通风机、吸棉器，而是滿車間的飞花直往嘴里、鼻子里鑽。一到六七月，工头就把窗戶紧閉，車間里的溫度有一百多度(华氏)，潮湿、悶热，真像个大蒸籠，飞花和汗水粘在脸上、手臂上，可以像一层皮那样剝下來。許多工人热疮滿头，痱子紅熟，中暑、昏倒的事情接連发生。

有一天，整个車間忽然騷动起来。我連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童工林有娣昏倒了。她嘴角紧閉，脸色慘白，額头上不时渗出黄豆大的汗珠。我們手忙脚乱地将她扶起，进行急救，但是一点也沒有起色。工头就将她拖回家去。不到一个礼拜，林有娣就死了！

在旧社会里，工人有两怕，一怕失业，二怕生病，这两大灾



难一来，不死也得愁煞！但对女工来说，还有第三怕，生小孩。那时候的女工根本没有什么产假，都是肚子痛了，才准离开车间回家。有许多姊妹就这样连家门还没走进，孩子就生在路上了。有一年冬天，我们正在做夜工，已经快半夜了。突然，女工陈金花肚子痛了起来，按理她应该是再过一个月分娩的，因为劳累过度早产了。工头得知此事，忙将她拖出车间，硬要她回到十里路外的压赛堰家里去。没有办法，她只得忍着疼痛赶路，结果在途中生了孩子，孩子当即死了……

老板和工头，日思夜想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他們不讓工人有一息喘气的時間。那辰光，工人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車間里專門備了一個“泡飯缸”，中午和半夜各開一次。到吃飯的時候，工人把飯籃放在泡飯缸里一浸，就在車弄堂里吃。紗頭斷了，就得放下碗筷去接，等再拿上飯碗，飯菜上已積了一層厚厚的花衣，因為肚子餓，只得眼睛一閉扒進嘴里。這真叫“穿的是破衣，吃的是花衣”。難怪舊社會的紡織工人中十個倒有九個生肺病、胃病的啊！

我們工人拚死命地干，可是工資少得可憐！我到九歲正式擋車的時候，已經抵上一個普通工了，做了一班還只有八分錢（相當於一升米錢）。發工資的時候，老板、工頭還給你打個折扣，這樣不要說養活家人，連自己的嘴也糊不上啊！可是老板還想出種種詭計，更加殘酷地剝削工人。每年八九月，是紗廠生產的旺季，機器連星期天也不停。每逢星期六，車間門口就吊出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晚上加班三小時，每人加發半天工資。”誰知道，還沒等到我們下班，牌子就換了，上面寫着：“明天遲到，罰洋一工。”我們許多住在下白沙、壓賽堰一帶的女工，路上來回有二十里，走路就要三個鐘頭，經過十六個鐘頭緊張勞動，回家還要喂奶、燒飯、洗衣……第二天趕不上上班，不僅加班工資沒拿到，反而被罰去了一天的工資！

只有斗爭，才能得到幸福

“為什麼工人這樣苦？為什麼資本家這樣狠？是我們命生得苦嗎？”不！這是舊社會制度的不合理。這個道理在一九

二七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們宁波市总工会主席、共产党员王鯤同志就給我們講了。他还說：“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话真是講到我們心里了。从此，我們厂里工人团结起来，不断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到了解放前夕，米价一天三涨，我們工人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这时候，党派来了同志，领导我們进行了反饥饿大罢工，吓得反动政府急忙派来两百多个車巡队员，架起机关枪，把我們工厂团团围住，梦想将罢工运动镇压下去。但是，我們有党的领导，大家团结一致，罢工坚持了近十天。老板看看我們工人心齐，才不得不答应工資一半发米一半发錢。尽管这样，我們工人的生活，仍旧非常痛苦。大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斗争，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开春，我們的解放大軍终于来了，当年的工作同志也来了，我們工人真正出头啦！

看看今天我們工人的生活，真是我們过去連想也不敢想的。解放初期，厂里就实行劳动保险条例。接着，办起了托儿所、医务室、疗养室、俱乐部等等，集体福利逐步得到改善，新建的車間高大、寬敞、明亮，屋頂是用隔热的石棉瓦盖的，翻窗都用双层玻璃，可以防止夏天阳光的輻射热。一到夏天，屋頂上开动了降雨器，屋里面冷气送风、排气吸尘，在車間里生产比露天乘凉还舒服呢。冬天，分布在各个車間的保暖水管，一开起来，真是溫暖如春……这一切，党對我們工人的关怀，說都說不完。

党对我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一九五二年，組織上要

我担任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小先生。那时候，我很耽心事，生怕完不成任务。在甬江紗厂学习的辰光，一天到晚学习、研究，白天，把一只紗管放在口袋里，有空就摸出来学接头；夜里，又把紗管放在枕头下面，一觉困醒再学。平时总设法多到車間里去测定，有时候一直弄到深夜。这样，我按时完成了学习任务，回到厂里很快就把先进的工作法推广开了。往后，大家評我为劳动模范，选我当省、市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厂里还提拔我担任副厂长。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我懂得許多革命道理。現在，世界上还有許多国家的工人、农民，过着像我們解放前一样的痛苦生活。因此，我們不但要加紧生产，把祖国建設好，还要积极支援他們的革命斗争，好叫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获得解放。过去我們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实现我們工人阶级的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已經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和革命的最終目标还离得很远。每当我想到这些，就感到我們的責任重大，越发覺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够。我要努力学习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江 坪整理

吳靜波插图

血泪凝成的“双刀”皂

广州源昌肥皂厂工人 周 平

提起“双刀孖梘”(梘,广东方言,即肥皂),广州人大概都很熟悉。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从“双刀孖梘”问世,到解放之前,这几十年间,就在这块小小的肥皂上,曾经凝结着多少工人的血泪呵!

四十三年前——一九二〇年,资本家周在秀与人合伙,在广州靖海路龙隍街(现在工人医院后面)开设了一间只有两个工人的肥皂厂,字号就叫源昌。那时候,周在秀在香港还开有一家永德成钱庄,专办华侨汇款。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凡是他们经手的,都要“三丁抽一”:一次,收到一笔四万元港币的侨汇,一个多月无人认领。恰巧这时,源昌肥皂厂因为煮肥皂不慎起火,几乎把厂房全部烧光,周在秀就乘机把这笔钱吞没,用这笔“昧心钱”,买下了一德路现在的厂址,把烧剩的东西搬过来。从此,源昌肥皂厂便成了周家独股经营。周在秀临死时,又把股本分给五个儿子,由周宪巨负责经营管理。后来兄弟分家,周宪巨就把工厂佔为个人所有。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六年之间,周宪巨的财产大约增加了四万倍。

除了源昌厂盖楼房、添设备，扩大经营，发展成为当时广州较大的肥皂厂之外，还置下了大批产业：广州的协和机器厂、交通旅店、安行旅店、大华电扇厂、上海药房以及香港的中华肥皂厂……都是周宪巨的。房产就更多了，单是在广州河南，就买下了整整一条街。解放前，专门替周家收租的人就有四五个，……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乡下做长工的日子越来越难捱了，我抱着“卖猪仔”一般的心情进了“源昌监仓”——人们这样称呼，不单因为它和广州话“源昌梘厂”的发音相近，更主要的是，工友们在厂里过的牛马生活，真像坐监一般！所以，人们又给源昌肥皂厂送了另一个“雅号”：“第二监狱”——仅次于当时仓边路的国民党监狱。这些形容，真是再合适没有了。那时候，厂里有前、中、后三道铁闸门，天黑不久就紧紧拉起。工人一旦进厂之后，就休想轻易再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车间里干活的，简直就是“不见天”。每天从清早干到深夜，糊里糊涂睡上三几个钟头，又被老板叫起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每年只有春节和老板生日那天晚上，才准许上街走走——就连这一点点“自由”，也要看老板的脸色，他稍微不高兴，就一步也不准你动。头发太长了，好不容易请假去门口的摊子上剪一剪，还得限时限刻，快去快回。有一次我迟回来几分钟，就被老板当门拦住，破口大骂了一顿。不单厂里的工人不能随意外出，外面的亲友找上门来，也常常不能见面。一九四五年，抗战刚胜利，工友汤辅十多年不见的兄弟从海外回来，跑到工厂找他，老板却说：“这里没有此人！”他兄弟愿意自

己掏錢給老板，補貼湯輔出來見面誤工的工資，老板还是装傻。直到他回到乡下写信来，湯輔才知道这件事。

我进厂之后，一早起来就舂泥粉，挖烧碱灰渣……最难受的是篩石粉，连口罩都沒有，只好用手巾掩着口鼻。头发上沾滿了粉末，梳都梳不动，用再多的肥皂也洗不干净！资本家的算盘打得真精呵！为了“降低成本”，有起重机他不用，偏要工人扛着一百多公斤重的油桶爬又陡又滑的四层楼梯；有鍋爐他不用（留着囤积原料和粮食），偏要用大鍋烧木柴煮肥皂，烧开了不管多滚多燙，也要工人用鉄桶去舀；有自来水他也不要用，偏要工人从老远的井里打水洗地……资本家处处把我们当牛馬使用，处处防范我們，連技术的边都不叫我們沾。凡是带一点技术性的事，都是老板和几个“太子爷”自己动手，用完的仪表工具都鎖起来。我們把油桶扛上四层楼，放在磅秤上后，就要馬上扭过脸去，如果誰敢凑近一些，老板馬上就会大喝一声：“看什么？滚开！”誰要是走慢一步，跟着就是一巴掌。

资本家千方百計逼着我們給他卖命，但是連固定工資都沒有——他高兴給多少就算多少！最“够气够力”的工人一个月工資頂多买到四十几斤谷。他認為誰“調皮搗蛋”，还要把工資“代管”起来——其实就是变相克扣。老板“生财有道”，經常把大家的工資拿去搞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應該月头发的到月尾才給工人，領到鈔票时已变成了狗屁不值的“湿柴”。有个工友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騷，當場就被拉出去打了一頓。

工資少得可憐，總該有餐飽飯吃吧？不！資本家養的狼狗吃牛肉、喝牛奶；我們工人吃的菜，却是從愛群大廈揀回來的蝦壳，除了加點鹽以外，什麼也沒有。我們只求不餓肚就算，哪里還管吃什麼菜？可是，就連兩餐粗米飯也常常吃不飽呵！老板公開說：“給不給飯吃，是我的權利！我喜歡就給，不喜歡就不給！”有兩位工友：周耀民和周更順，生得高大，因為吃不飽，免不了講幾句憤憤不平的話，哪知道被老板聽見，馬上就開除了。周耀民流落在廣州街頭乞食，有一天來到廠門口，眼巴巴地望着我們吃飯。我們怎能忍心看着階級弟兄挨餓？趁老板不在跟前，省出一口飯給他，不料還是被老板看見了，當場把我們大罵了一頓，說：“這種人少去可憐他！”後來，周耀民只好在溝渠里拾蕉皮菜渣吃，折磨得人不像人樣，終於死在街頭。周更順回到家鄉恩平，找不到工做，也餓死了。

干我們這一行，一天到晚和油脂、皂漿……打交道，一件工作服是少不了的。可是，那時候，我們里里外外就是一身燒得百孔千瘡的爛衫，生產時，常常只穿着一條短褲，實在太脏了，晚上洗一洗，放在爐灶口烘干，第二天再穿。有時候，有的工友干脆連短褲也不穿，赤身露體地干活（當時廠里全是男工）。

住的條件更談不上了，反正是閣仔、樓角……隨便找個地方伸一伸腰，白天又把破行李卷起，夏天沒有蚊帳，周身被蚊子咬得像荔枝皮……

千言萬語一句話：在資本家眼里，“工人”這兩個字他只看到一半——我們工人只配做苦工，根本不是人！老板和“太子



爷”在外边花天酒地，玩到半夜两三点鐘才回来，也要把刚刚睡下的工人踢起来給他們打洗臉水。有一次，工友黃兆邦打水动作迟緩了一些，“二太子”周宝琳就放狼狗扑上去咬他，痛得他泣

不成声，周宝琳却縱声大笑說：“我不过試一試这条狗嘛！”碰上工伤、害病，那就是最倒霉的时候了——资本家要么不聞不問，要么板着面孔說：“你回鄉下去吧！”——这就等于宣布开除了。所以，工友們有病、負伤都不敢出声，軋伤了手指，找条破布纏一纏，照样干活。我有个姓黃的亲戚，因为担肥皂跌断了腰骨，話都說不出来了，老板叫我送回乡去就算了事。工友周树枢有一次发高烧，老板怕他死在厂里，連忙叫人用送貨車把他送到“方便医院”，到了那里，医生只是远远地問問姓名，便塞进“大房”——进了这里的人，不死也要加一重病；周树枢心知不妙，第二天便借口出恭，溜了出来，連自己的破棉毡都不要

了。至于我自己，也不例外。有一天，我用火水罐舀肥皂浆，罐底突然掉了，滚烫的肥皂浆全泼在身上，从大腿到脚面烫起了一串大泡，老板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工友們拿来一些凡士林給我擦，躺了两天，还是不能行动，老板却硬說我想闲着吃白飯，給我分配了一个“新任务”——坐在那里攪梘水……

旧痛未好，又添新伤——一九四九年五月（那时广州还没有解放），我和一位工友因事爭執，被老板一推，一只脚掉进滾沸的肥皂鍋里，立刻又燙起了一串大泡，痛得我哭出声来，但是，老板却左右开弓地打了我一頓巴掌。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等到燙伤稍好一些，便下定决心辞工回家，沒想到就連这一关資本家也不放我过去。那天，我收拾好行李，刚刚担起来走了几步，便碰上老板的几个“太子爷”，他們先是用軟办法哄騙我，見我坚决不上圈套，便动起硬的来，几巴掌打得我倒在地上。我咬紧牙关爬起来，担起行李还想走，他們又一把将行李扯下来，恶声恶气地說要检查过才准走。几个人不容分說便把我連推带拉地拖到楼上老板的房間——我在厂里干了几年，还是头一回来到这里。他們把行李打开，故意乱丢乱踩，忽然在烂衣服堆里发现了一个小本子，急忙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些制作肥皂技术的簡單数字，是我从旁看資本家操作时記下来的。他們認為捉住了把柄，“二太子”周宝琳大喝一声：“你居然敢来偷飯吃！”几个人拳脚交加，把我打得口吐鮮血，倒在地上。他們还不甘休，又打电话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找来了他們的“老友記”——中統特务陈兆佳。姓陈的一見面就橫眉怒目地質問我：“你个‘契弟’（广东方言，罵人的話），想

領頭鬧罷工呵？”几个“太子爷”也在一旁帮腔：“送他去警备司令部！”“浸死他！”……鬧了半天，又把我鎖在房里，过了三个小时，才放我出去。陈兆佳还满脸杀气地威胁我：“出了大門口不准站一步！我派人在后面跟着你，你不馬上落船，就要你的命！”……

十几年过去了，我身上的伤疤已經逐漸消褪。但是，那深深的階級仇恨，却是刻骨銘心，永世难忘！其实，解放前，那些“不見天”的年月里，厂里的工友誰沒有挨打受罵？誰身上沒有打伤、烧伤、軋伤的疤痕？牛馬不如的生活，逼得再能吃苦的人也难捱得下去，不少人干上十天半月，三几天就辞工不干，甚至連工資也拿不到就走了。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动不动就开除、解雇工人。所以，解放前源昌肥皂厂还有另一个“雅号”——“源昌旅店”。剩下那些勉勉强强捱下去的工友，除了两个人本来在乡下有家却始終接不出来之外，其余的到解放为止，沒有一个討得起老婆。

如今，無論在工厂里、市場上，还是回到家中，只要看到那块打着“双刀”印記的肥皂，过去的一切就会浮現在我的眼前。这一块小小的肥皂，随时随地在提醒我牢牢記住：是誰拿我們当牛做馬？是誰把我們从“監獄”里救了出来？这一块小小的肥皂，也經常严肃地問我：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兄弟像我們过去一样受苦受难的时候，我們应当怎么办？我的回答很简单——鼓足干劲搞生产，永远跟党一条心！

戈 东整理

姚治华插图

請 客

沈阳機車車輛厂 鄭宝章

我二十岁上,已經是个熟練的技术工人了。車、鉗、旋、刨,样样都拿得起来。当时正是軍閥张作霖統治东北,咱空有一身手艺,还是找不到飯碗。我失业已經五个多月了。就因为脾气倔,又沒錢挖門子、找靠山,眼看着破烂家当都典当光了,还是沒有找到活干。一天,听說皇姑屯鉄路工厂招人,我聞訊就赶来了,到工厂的东門一看,黑压压一片,报考的人可真不少。一个个无精打彩的,都在厂門外等着;从清早等到太阳爬上半天,才出来一个人把我們領进厂来。

在一座房子的前面,那个人叫大伙停下等着,他就走了。大伙等呀等的,又过了一个来鐘点,就听有人說:“考工的来了。”我抬头一看,那个人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鏡,两只小眼睛冷冰冰的,扁脸上长滿了酒刺。他从人群里經過,誰也沒有看一眼就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就招呼一个工人进去考試。

不到两分鐘,那个工人就出来了。

有人問:“怎么样?”

“考上了。”

“多少？”

“这个数。”那个工人把大拇指一伸作回答。我对那位工人真是又钦佩又羡慕，佩服他技术好，羡慕他这回找到了饭碗。这时另一个工人也考完出来了。

有人问他：“考上了没有？”

回答：“考上了。”

“多少？”回答是伸开了五个手指头。怎么！只有五十分也考上了吗？我心里真纳闷。正在这时叫到我了，就赶忙走进屋去，一进门考工的就问：

“你考什么工？”我说：“旋工。”他把小眼睛一眯，下巴一扬说：“就这么来的？”这一问把我闹楞住了，寻思不这么来还带车床来吗？这话可没敢说出口，含含糊糊应了个“是”。

“你懂得英文吗？”那家伙脸色铁青，摆出一副找别扭的架势。

“不懂。”

“不懂英文不行，回去吧，现在蓝图都是英文字，不懂英文怎么干活？”

我一听就像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一想到家里大人孩子，锅盖都揭不开了，只好耐着性子恳求他说：

“先生，咱大老粗哪里学过英文，不过看蓝图我能懂，保险什么活都能按图做出来，你留下我吧！”

那家伙看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懂英文你能看图？你看看这张图能懂吗？”说着就递给我一张蓝图，我接过来一看，全能懂。就指着蓝图很快把尺寸要求全说出来了。那小子一看没难住我，又说：

“只会看图不行，得認識英文才行，你能把这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認下来嗎？”

二十六个字母可难不住我，他指一个我認一个，反来复去好几遍也沒把我問住。这时，考了我有半个多鐘头了，外边的人等得不耐煩了，窗子、門口，很多人探头探腦往里瞧。那小子見难不住我，又想了法子，說：

“行，明天早九点，你来考实际操作吧！”我临出門他又大声补了句：“心眼要放明白点。”我一出門，就有人围上来問：

“考了这么長時間，考上了沒有？”

“不知道，明天还得考实际操作呢！”我一边回答一边不解地想着“心眼放明白点”那句話。

“你花了多少錢？”

这下子可把我問怔了，“敢情考試还得花錢呀！”我傻里傻气的样子，把旁边的人都逗笑了。

原来考工的这家伙是厂长的亲侄子，又狠又毒，工人們給起了个外号叫“眼鏡蛇”，这小子仗着他叔叔的势力，在厂里打罵工人，竟扣工資，什么坏事都干。这回当了考工員，更要狠狠摸一把，那些考上的人都出了錢，拇指一翘是花了十块，一伸巴掌是花了五块。有人好意对我說：“你这样硬考不行，‘工厂門口朝东开，要想进厂拿錢来’，还是給‘眼鏡蛇’送点礼吧！”

失业这么長時間了，我又何尝不想快点找个工作呢！可是家里穷的叮当响，哪有錢送礼！我暗自寻思，就是不花錢，凭我这身技术考不上？第二天九点，我又空手去考实际操作去了。

在工具房的一台床子上，好几个人很快就考过去了，干的

活很简单，我心里就更有底了。轮到“眼镜蛇”翻了翻眼皮说：“今天怎样？”我明知道这是要钱，但还假装不懂说：“考考看吧！”“眼镜蛇”交给我一张图纸，是加工汽缸活塞，这是精密活呀！分明是想要我的好看，我心里说：“来吧！车床上的活你难不住老子！”我把活卡上了，试了试摇把，先跑了两圈空车，我提防这小子算计我，看看床子没毛病，这才进刀，不一会儿就干完了。我用千分尺一量，正好，就把活交给他了。“眼镜蛇”接过活来，反来复去地看，又磨磨蹭蹭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戴上，像算命先生给人看相似的，左端详右端详，最后没法，沉着脸说了声：“手艺还不坏。”

谁知在下午公布录取名单上，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到底没找到“鄧宝章”三个字，这下子可把我气炸了。我到办公室找到了“眼镜蛇”就问：“凭什么不录取我？”他支支吾吾地说：“光活干的好不行，你理论差，不能录取。”

“什么叫理论差？昨天哪一样理论我没答上来？”

那家伙恼羞成怒把手一挥说：“下班了，去吧！去吧！”一下把我推出来就关上了门。

我又气又恨，心里的火直往上冲，有心再进去和他讲理，一推门，门从里边扣上了。在旧社会咱工人在那些人前站不得，没办法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回来了。

到家一说没考上，几个朋友也很生气，都为我不平。我有个朋友间接认识劳资科的科长，大家你仨我俩凑了五块钱，买了一些礼物给那个科长送去了，在旧社会钱能通神，那科长一张条子就把我介绍进厂了。真是冤家路窄，正巧把我分配到“眼镜蛇”的手下，这小子一看我来了，冷笑着说：“不简单，蝸

牛上山还会找門路呵！”又指着一台最破的床子說：“在这台子上干吧，当心点！”

“眼鏡蛇”是广东人，他手下还有一帮狗腿子，从我干活那天起，他就整天找我的碴口，他那几个狗腿子也变着法儿挤兑我。常言說，“无縫不下蛆”，活上他挑不出咱毛病来，也不好說什么；小小不言的，为了吃飯，咱也就忍啦。

有一天我旋一条軸杠，因为床子太老，一走刀直晃蕩，只听咔嚓一声，齿輪坏了，皮帶也刷地下来了，哧一声把我的胳膊刺了一条大口子，血像水管似的直往外蹿，疼得我出了一身汗。这时啪的一个耳光子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我一回头，“眼鏡蛇”两眼凶光站在我背后罵我說：“丢那媽，你会不会做工？弄坏車床你賠得起嗎？”一边罵一边去看损坏的皮帶。我的气呼的一下就上来了，真是杀他的心都有。“媽的，你罵誰，难道我們工人的命还没車床值錢嗎？”这小子一听我回嘴，返身又要打我，他的狗腿子也呼拉一下围上来了，旁边几个工友看我要吃亏，赶忙把我拉开說：“鄧师傅，你少說一句吧！”就扶着我上医院去了。

我还没上班，“眼鏡蛇”就揚出风来要开除我，其实是威胁我出錢講和，朋友們也劝我說：“好汉不吃眼前亏，請次客把事情了結吧！”

过了半个月我才上班，“眼鏡蛇”一見我冷笑着說：“老鄧，恭賀你保住一条胳膊呀！什么时候吃你保住胳膊的喜酒？”在医院时我就打定主意了；那一巴掌不能白挨，我老鄧就是这种性子，你不欺我还将就过去，你要欺到我头上，咱就得較量

較量。我一听，这小子又卖乖了，看看他那幸灾乐祸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稳住性說：“等开了支請头子喝杯酒。”心里却已打定了調理他的主意。发工資那天，我事先就打听好“眼鏡蛇”值夜班，天傍黑，我在沙子沟一家飯館里訂了一桌席，为了把狗腿子們調开好单独收拾“眼鏡蛇”，我先把“眼鏡蛇”的几个狗腿都請了去候在那里，然后我借口要亲自去請“眼鏡蛇”，一个人回厂来了。平时我就留意到东边小角門很僻靜，晚上更是少有人走，我找了一根长木棍橫放在門下，又找了一根木棍子藏在門后。找到了“眼鏡蛇”，我笑着說：“头儿走吧，今天我請客！”那小子一听乐了：“走，現在就走，我还当你老鄆一毛不拔呢！哈哈……”我心里話，狗崽子，你別乐得太早了。

我和他并肩从分厂走出来，这小子一道上絮絮叨叨直劝我，什么以后要灵活点啦，太死板了要吃大亏啦……我哪有心听他的，說实在的，心也是怦怦直跳，到角門时我往旁边一站讓他說：“头儿先請。”那小子当然不客气，挺着胸往外一跨步，只听卜通一声，“眼鏡蛇”被木棍絆倒，結結实实跌了个狗吃屎，我順手抄起門后的棍子就打上了，嘴里罵着：“狗崽子！我請客，我請你客！”那小子喊爹叫娘地求我住手，我也不理，直到我心里的恶气出尽了，才扔下他“蹶”啦。

我揍了“眼鏡蛇”，也算出了气，但是不敢回工厂，就到大东兵工厂躲风去了。过了些时，因为我的技术好，别的把头答应要我，我才又回工厂来干活。

赵承惠整理

青山血泪

川西北伐木厂老工人 黄志

狗腿子花言巧语 爷儿俩逼上青山

一九三九年前后，我们乐至县一带叫国民党整苦了。三更半夜抓壮丁，老的抓，少的抓，闹得乡下鸡飞狗跳，鬼哭神号。不去，就说是“汉奸”，绳子拴，棒子打，一串串往城隍庙里拉。有的逃跑在外乡，有的砍掉扳机柄的二拇指，有的上了吊，有的坐了监牢。田土荒了，穷人吃观音土，挖野菜，吃得人黄皮寡瘦。天一冷，没衣没被，拿破巾巾烂蓑衣包身子，冻的冻死，饿的饿死。我们一家六口，家里租种的田养不活一家，爹就打堂（在公路边找零活）、下力、抬滑竿；妈去帮人。我那年十五岁，也给地主放牛，看庄稼。六只手顾不住六张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正月大年一过，村里来了个带瓜皮帽的“师爷”，见人就說：“没吃的，上山当‘毛子’（“毛子”是最下层的伐木工人）吧！飯吃得飽，錢掙得多，十天一牙祭，年底发双薪。……”我爹正不得主意，在旁插了一句：“哪有这事？”瓜皮帽說：“你不信，先

支給你一半。”唉！那陣誰見了白生生的洋錢不心動呢？地主張麻子又來逼押金，再不給，收罷小春就退佃，逼得爹發呆，媽直哭，沒法子，找陳么爸當保人，找些破布巾巾，補了床爛棉絮，就跟師爺進山了，一路十幾個，都是下力人。

我們在家里盼呀盼呀，盼到十冬臘月，還不見爹來信。媽哄弟妹們說：“爹過年就回來團圓啦，還給你們帶壓歲錢哩！”臘月二十九，爹果真回來了，瘦得皮包骨，我們都不認得了。媽打招呼說：“你回來啦？”爹一言不語，捧著頭，坐在牆角嘆氣。我們都吓慌了：這是怎麼回事呵？直到半夜，我一覺醒來，還聽見媽在小聲哭。

過了年，爹把我叫到一邊，對我說：“志娃，你又長一歲啦，該懂事啦！”我看著爹，點點頭。爹連忙拉住我的手說：“孩子！你願意跟爹上山么？”我一時沒有懂得爹的話，楞住了，爹嘆口氣說：“孩子！不是爹狠心！爹在山上背了老板的債，還不清。你也上山，只當是替爹受苦。再說，你爹人老多病，有個親人在身邊，也好照顧。你聽見沒有呵？……”我看著媽媽，媽過來把我攬住說：“乖娃！我知道你舍不得媽，沒來頭，放心去吧，媽在家能熬過去，只要你和你爹早些把債還清，一家子好團圓。……”媽再也說不下去了，攬住我脖子哭，我也哭，把弟妹們吓住了，哇的一聲，圍過來抱住媽，一家人哭成一團，爹喊道：“娃兒的媽！哭不得！大年下不吉利呀！”說著他也哭起來了。

臨走那天，媽又哭著把我和爹送到五里橋。

走了半個多月，才到理番縣——現在的茂汶羌族自治縣，一進大山，風雪像針一樣刺進骨髓里。眼前密密麻麻一片森

林，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像浮在半空中一樣。我問爹：“這林子有沒有邊兒呵？”爹說：“這林子倒有邊兒，就是我們的苦日子沒有邊兒！”把我引進一個座棚里，又說：“志娃，來給王爺拜三拜，求神保佑。”拜完了，爹又領我去見“青山管事”鄧相廷。

這管事生得一副怪相，吊眉毛，三角眼，鉤鼻子，尖腦壳，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斜着眼問道：“這小討口子，瘦得跟柴棒棒一樣，能當毛子么？”爹笑道：“鄧鄉爺，我們窮人跟你們貴人不一樣，瘦雖瘦，有把力氣哩。”鄧相廷把我打量一番說：“做不夠定額，要你倒補飯錢呵。”爹連忙答道：“就這麼辦吧。”

從此，我就當了太和伐木廠的三等毛子。每天跟爹一道上山砍樹。這一帶深山老林，終年四季都是白雪滿山，頭年下的還沒化完，今年的雪又蓋上了。一起暴風，滿山揚起團團雪球，打得人頭也抬不起來。我已經學會單獨放大樹。有一次，發現一棵大杉樹，樹梢直插進雲里。找好樹倒的方向，拿大斧一口氣砍了點把鐘。森林很密，爹看不見我。我砍呀砍呀，斧子越來越重，渾身直冒虛汗，忽然一陣暴風刮來，嘩啦啦一聲雷吼，雲杉沒有按預定的方向倒，卻搭掛在左邊的樹上。我慌了，也顧不得危險，拿起斧子砍搭掛樹，砍了一會，實在沒勁了，風吹得我憋不過氣來，牙齒打抖，眼睛里火星亂飛，一剎時，天旋地轉，頭重腳輕，栽倒在地，只聽得風呼呼地響，吹得大樹搖搖晃晃，就像要倒下來。心想，這下完啦！只覺一塊冰冷的東西，打在頭上，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工棚里臭哄哄的，有一股暖氣。我輕輕喊了聲：“爹！”爹把我緊緊抱住說：“孩子，醒醒！爹在這裡！”我睜開了眼，看見

一星灯光，鬼火般的在头上跳跃。赵寿廷伯伯端了一碗开水喂我。一边说：“喝点水暖暖吧！人不是牲口呵！一天两顿臭包谷，活路又重，怎么受得住？”王万锁大哥叫道：“臭包谷还不给吃饱哩。我当了几年毛子，把这些豺狼的心看透啦，他们是肚里长牙，笑里藏刀，招工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一顿半斤面呀，十天一大劳呀，落到工人嘴里只有五两面，几块肉皮子油渣渣，都给龟孙子管事们吃啦！”一个工人接口说：“都怪穷人命不好。前世没有修福，今生才受这份罪。”王万锁说：“李叔叔！你这话不对。啥子叫命呵！听老人们说，前五六年闹红军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世道翻了个转，那些绅粮大户，都一个个遭到恶报！他们修的‘好命’都哪里去了？”李叔叔说：“那事我也知道，可是打呀分呀，到头落个什么呢？俗话说的，肩抬轎子腰难伸呵。”另一个接口道：“这话有道理，你看古时候官逼民反，宋江呀，李闯王呀，哪个闹成器来！”

一番话说得万锁嘟起个嘴，转过脸问我：“小黄兄弟，你好一点么？”我勉强点了点头，浑身骨头就像散了似的。赵大伯说：“把他放下来吧，躺着舒服些！”爹在烂草上铺好棕衣，把一床又破又小的棉絮给我偎紧。

外面，大风呼呼吼着，这工棚刮得格格巴巴响，就像要塌下来，可是谁也不理会。大家瑟瑟缩缩，想找个避风地方过夜。赵大伯没有动，依然坐在旁边，想着什么。好半天才说：“这世道要穷人活过来，也真不容易！在家里受地主、保长的气，上山当毛子受老板、管事的气，你们两爷子，还了一年半账，忍饥挨饿，淋着雨，冒着风，睡半夜，起五更，一斧一斧砍，

汗水順着背沟流，瘦得像黃猴，到头一場空。做事公公道道，整了誰？害了誰？要吃这份苦？受这份罪？那些紳粮老爷們，烂了腸子黑了心，吃穷人的肉，喝穷人的血，立起像葫蘆，爬倒像臭虫，这难道是命么？……”

赵伯伯越說越大声，是誰抽烟嗆得他咳了几声，万鎖哥又沉不住气了，站起来說道：“对呵！不要泄穷人的气！銅盆烂了，分量还在。人穷志不穷。依我說把这些毒蛇卡死。……”

話音沒落，門砰的一声开了，进来一个魁梧汉子，名叫张大成的，向大家比个手势說道：“灰鼠狼来了！”这灰鼠狼是邓管事的狗腿子，叫錢三新，只因他抽大烟，吃得灰眉鼠眼，大家就叫他灰鼠狼。万鎖順手拿起一把斧子，赵伯伯摆摆手，只听外边吆喝道：“吃胀啦，屁放不完！还点着灯干啥？”

赵伯伯一口吹灭了灯，应道：“睡嘍睡嘍！”灰鼠狼在門外又吆喝几句，走远了。万鎖哥恶狠狠罵道：“总有一天，把这些龟儿敲个粉碎！”

王万鎖大鬧太和厂 赵寿廷巧捉雪猪子

第二天一早，邓相廷把我爹叫去，說：“你儿子昨天砍了搭挂树，得罪了王爷，你給王爷挂张紅吧。”爹說：“这不怪他呀，他实在餓得不行啦！”邓相廷說：“餓？人家怎么沒砍搭挂树？明明是你們不敬王爷。不行，要挂紅，还要你儿子上工，将功折罪。”說着轉身走了。

我心里气得发慌，想起来和老板評理，刚一欠身，眼花耳鳴，腰疼腿軟，万鎖哥急忙把我按住，张大成說：“我們一块去

找邓管事。”赵伯伯想了一阵，說：“你們要按住性子，不要乱来。”

大家匆匆忙忙，带着工具和中午的包谷粑粑去上工。走出不远，就追上了邓相廷，灰鼠狼正指手划脚向他报告什么。爹說：“邓管事，我儿子还病在床上，怎能上工？”万鎖說：“难道还要找人抬着上工？”邓相廷見众人围了上来，馬上眼珠子一轉，笑道：“老黄，我这是为了你两爷子打算呵，你儿子耽誤一天工，就多欠一天債。你看着办吧！这挂紅更少不得，王爷也不是我邓相廷一个人的，是你們大家的。你儿子得罪了王爷，将来也是大家遭殃！”他向众人扫了一眼：“呢，兄弟伙說对不对？”

沒一个人理睬他。赵伯伯咳了两声，慢吞吞地說道：“管事先生，你进工棚看看去，小黄还发烧哩！他得罪了王爷，我們遭殃，不要你負責，由我們担待。”站在一边的灰鼠狼露出两排吃鴉片烟的黑牙齿，插嘴說：“你們遭殃，你們担待，邓管事遭了殃，誰担待得起？”万鎖气呼呼地說：“砍了搭挂树，要我們担待，我們肚子餓了砍不动树子，誰来担待？”灰鼠狼罵道：“王万鎖，你簡直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快上工去！”邓相廷走到万鎖跟前，眯縫着两眼說：“王万鎖，說話要知理。你說吃不飽，多少才算够？”万鎖不假思索地說：“三个人的飯还不够一个人吃的！”邓相廷一臉奸笑：“好，我就来看看你的肚子有多大！你說有三个人的飯量，你就吃吃看，吃完了，我給你添粮！”万鎖追問道：“添多少？”邓相廷說：“一两包谷面。”万鎖說：“一两臭包谷面，还不够填牙縫！”邓相廷說：“你要多

少？”万鎖理直气壮地說：“不光我一人喊餓呀，要添每人都添！……”

于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吵嚷起来，有的說：操起餓（臥）龙崗砍树子，不出皮漏才有鬼！有的說：莫說三块臭包谷粑粑，就是吃六个人的也不嫌多……邓相廷沉住气，眼珠子骨碌碌轉了几轉，說：“好，說話算話。你吃下三个人的粑粑，我一頓給你們每人添三两包谷！吃不下去，莫怪我不客气！”他量万鎖吃不了那么多。

当下，大家把带的干粮摆在地上，万鎖正准备吃，赵伯伯連忙給他使眼色，万鎖会意，对邓相廷說：“管事老爷，口說无凭，立約为据，盖个章签个字我們才相信！”邓相廷說：“我为人說一不二，童叟无欺，不信你們問老把式赵寿廷，他跟我当了十年青山匠人。”赵伯伯道：“管事先生，你向我們討債还利，当真是說一不二，众人都能作証。”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邓相廷脸紅一陣白一陣，把心一橫，叫灰鼠狼取了紙笔来，鴉飞雀舞地写了几行字。万鎖把字据捏在手里，說：“管事老爷，这三个人的粑粑下肚，保不定有死无活！我再提个条件吧：黄志不挂紅，病好前不上工！”邓相廷說：“我也有个条件，吃的时候，不喝水，不打呃，抽五袋烟的时间內，吃不完就算你輸！”

万鎖也不答話，不慌不忙，一手扞腰，一手拿粑粑，眼不眨，脸不紅，一气吃完十二个，众人說：“管事老爷，你輸啦！”邓相廷滿脸晦气，一句話沒說，掉头走了。果然再不来逼着挂紅，也不催我上工。

我在工棚里躺了五六天，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就上工了。一来是爹不放心留下我一个人，二来是我一个人也太闷得慌，跟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苦日子就觉得好过一些。

赵伯伯很会摆龙门阵，说三国，道水浒，张飞怒鞭督邮，武松义夺快活林，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得我们着了迷，一有空就围着赵伯伯，央求他讲。爹听着，忧愁的脸上，也常透出一丝笑容。有一次他问赵伯伯：“寿廷哥，你说说，这世道是绅粮大户多，还是穷人多？”“古往今来，当然是天上星星多，地下穷人多。”爹又问：“你说穷人多，为啥子要受有钱人的欺侮呢？”赵伯伯还没答话，张大成接口道：“为啥？鹰吃鸡，狼吃兔，绅粮吃的是穷人肉。鹰呀、狼呀，凭的利牙尖爪，抓鸡吃兔；保长、老板凭的钱财势力，欺侮穷人；穷人赤手空拳，为啥子不受欺侮呢！”赵伯伯说：“这话对，穷人没个依靠，就要受欺侮！”

逢到刮风下雪天，管事和狗腿子是不轻易出来的，这就成了我们说今道古的好机会。我们越来越没心思干活路了。我常常坐在大树跟前呆想，望着密层层树林和云雾，思想就好像长了翅膀，飞呀，飞呀，但怎么也穿不透云雾，依然又掉到树林里。

可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邓相廷上回吃了亏，背地里又使黑心。有一天，我们发现包谷粑粑的颜色变黑了，味道变苦了，吃起来，渣渣草草满口锁，我们以为是霉烂得发苦的包谷面加包谷心做的，勉强吞下了。谁知第二天黑上加黑，苦上加苦，粗上加粗，赵伯伯咬了一口，皱紧眉头说：“天呀，这些龟儿子在粑粑里掺了苦养秆秆呢！”

这一来，大家都发火了，晚上收工后，推赵伯伯和王万锁去找邓管事说理。只见大门紧闭，叫了半天，邓相廷缩着脖子，只不出来。王万锁撬了一通门，才招出个灰鼠狼：“你们嚷什么？邓大爷病啦！”王万锁拿出半截子粑粑来，说：“钱三新，你们就这样昧良心整下力人么？”灰鼠狼眯着鼠眼，笑道：“怎么，每顿足足添三两包谷面，还嫌分量不够？”王万锁上前一步，将粑粑凑近灰鼠狼的鼻子，说：“钱三新，你装什么洋葱！明明掺的苦荞秆秆，你把它吃了吧。”说着就往灰鼠狼嘴里塞，赵伯伯拉了万锁一把，说：“钱先生，你想想，我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活，没有气力怎么行？你们不能把牲口也不吃的东西给人吃呀！”钱三新把脸一翻：“这荞子面是好东西，爱吃不吃，随便！”说完掉头走了。把王万锁、赵伯伯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连好多天，邓相廷装病不出门，工人顿顿吃不饱，灰鼠狼尾巴越翘越高。大家一上工地，愁眉苦脸，无计可施。爹有时又自言自语地说：“狼吃鸡，鹰吃兔……穷人只有眼泪花，只有空拳赤手……”

大雪过后，是个难得的好晴天。做了半天工，快吃午饭了，我一个人穿过密林，往山岩上爬。那是一片茂密的松林，下面是厚厚的雪堆和枯枝败叶，我找块地方躺了下来，上面望不见天，阳光透过密林，在身上洒下一些白色星点。躺着躺着，忽然一颗鸡蛋大的松籽掉在头上，举眼一看，原来是松鼠在上边打架哩。我顺手将松籽拾起来，剥开硬壳，一尝，味道虽然苦涩，却比包谷粑清香，就翻身跳起来，继续找寻。松籽真多呀，正打算跑下去叫万锁哥也来拾，忽然，空通一声，大半

截身子陷进一个雪洞里。我连忙往洞外爬，一根尖利的爪子抓住我的脚，撕烂了毡子，刺进皮肉里。我痛得叫了一声，心想，糟了，滚进狼窝里啦，这回一定没命啦！喊了几声，一会，人们来了，爹跑在最前面，没好气地说：“才安生几天，你又乱跑啦！”说着便来拉我的手，我急忙喊：“底下有狼，咬住我的腿啦！”

这时赵伯伯也上来了，听说有狼，便看了看地势，笑着说：“哪有啥子狼呵！是狼早把你叼走了！”说完，梭进雪洞里，双手在底下乱摸，我急了一头汗，只听赵伯伯喊一声：“捉住啦！”接着一声尖叫，赵伯伯提起一只尖嘴利爪，浑身白毛的东西来。

这东西，样子和猪差不多，嘴尖些，爪长些，比兔子大，比狗小，白毛里透出肉红色的嫩皮。赵伯伯向大家解释说：“这叫雪猪，是山里的宝贝呀！你们看，肉多嫩，膘多厚，平时不容易找到，一到冬天，这东西就伏在雪洞里，或是很深的岩洞里。在雪洞里容易捉，在岩洞里要拿干海椒点火熏，才熏得出来。味道可鲜哩！……老黄，我们找个岩洞把它烤熟吃，拿回棚里，灰鼠狼又要找麻烦了。”

大家忘记了饥饿，高高兴兴走下松树林，王万锁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黄，今天立了一大功。”我说：“我心口还在卜通卜通跳哩！”

找到一个大岩洞，架起柴火，赵伯伯拿斧子先把雪猪杀死，然后架在柴火上烤，烤得油珠子滴在火堆上，发出吱吱的声音。我们十几个人坐成一圈，围着火，听赵伯伯讲雪猪的生活史。

不一会，雪猪烤熟了，赵伯伯把它摊在干柴上，洒些盐巴，撕成一块一块的分给大家吃。万锁拿了一根雪猪腿子，大口大口啃着，油从手上流下来。我一边吃，一边低声问赵伯伯：“我们不给老板做工，都捉雪猪吃去不好么？”赵伯伯还没回答，张大成就说：“那何苦，干脆跑他娘的！”李叔叔叹气说：“跑不了，人家有队伍！就是跑出青山，还有乡长、保长、地主卡住你！”

我惊异地问：“山里有多少队伍？”

“至多百把条枪，他们叫什么护厂队，哪里用得着就调到哪里。”

张大成纠正他：“不只百把条枪！邓相廷的大爸就是这个伐木公司的大老板，在川西坝子招兵买马，当师长、当军长，大小衙门都要听他的话。”

“这些家伙在成都过的真是王爷生活，开公馆，十几个姨太太，金条子一窖一窖的，一出来好威风，几十个马弁一溜摆，吆喝一声，叫百姓跪下不敢坐着。”

爹叹了口气说：“照这么说，跑到哪里，都逃不出人家掌心呵！”赵伯伯说：“跑不中用。我看要图活命，都捉雪猪去！”爹问：“都去？灰鼠狼来了呢？”赵伯伯说：“他在岩下，我们在岩上，他看得近，我们看得远，等他一来，唏里嘩啦一阵石头泥块滚下去，他还敢来么？”张大成接着说：“对！在山岩上砍木头放大树，还能不垮石头？”

这一说，大家的心眼豁亮了。烤雪猪早已吃光，火也熄灭，已经是下午上工的时候，大家才带着工具，欢欢喜喜地走到工地去。

众工人八面埋伏 灰鼠狼望风丧胆

我們按赵伯伯的办法，十几个人每天輪換，两个人打野味，一个人放哨。見灰鼠狼从山下远远走来，就吼一声，由一个人領头喊号，大家呼应，滾木头，推石头，一刹时轟轟隆隆，雪尘飞揚，灰鼠狼一見来势凶猛，三魂吓掉两魂，抱着脑袋，一溜烟躲进洞里，再不敢出来了。

我們打野味的劲头越来越大了。先是在近处，捉些馬鸡、雪猪之类，后来，口味大了，把地界放寬了，打回来的野兽也多了，有山羊、黑鹿、獐子、狐狸等等。捉到这些东西很不容易，經常五六天才捉到一只；我們沒有枪，只有斧子，跑不贏野兽，就想了好多办法，在野兽經常来往的路上挖陷阱，安活套索；有时真遇到狼，就用快斧把它杀死。有时凑了巧，接連获胜，大伙儿都高兴地說“生意兴隆，人財两旺”，一定要大摆“筵席”，請其他工棚的兄弟們来有福共享，一个岩洞坐不下，就分开两三个岩洞，猜拳斗趣，熱鬧一番。

这事情很快传开了，有的工棚也照我們的办法做起来。后来索性两三个工棚联合在一起，人多势众，每次五六个人上山打猎，打回来的野兽平均分給每个工棚。有时几个工地靠得很近，对山对戶，看得見，喊得应，一見狗腿子来，这边吆喝一声：“洪来了，橫山倒！”那边就应一声：“順山倒！”于是两边山上的乱石、雪块，像疾风暴雨般打下山去。这一来，我們結識的新朋友也多了。

日子一久，大家不免大意起来。这是第二年春天，一个下

午，灰鼠狼像是从地缝里冒出来的，突然出现在工地上，我们都楞住了。这天正轮到王万锁和李顺发叔叔打猎，灰鼠狼眼睛扫一扫周围，问张大成：“你们人呢？”

赵伯伯抢先答道：“钱先生，你还不知道出了事么？”

“出了什么事？”

“嗨！”赵伯伯把头一摇，“亏你还想升青山管事，山里出了豹子也不知道。”

“我不信！在哪里？”

“就在这座山上，好一只金纹大花豹！昨夜还到工棚附近来转哩！没有到你们账房去么？”

灰鼠狼摇摇头。

“你问小黄，昨夜他出来解溲，看见树林里金晃晃两盏明灯，吓得把尿都流在裤裆里啦。”

我憋住笑，连忙点头。灰鼠狼信以为真，一双贼眼四处瞧。赵伯伯继续说：“这豹子像是饿慌啦，连白天也出来伤人！这两天一到工地，就听到上头松林里豹子叫，想到账房向你们借枪，来不及啦，只好派王万锁和李顺发去挖坑坑，安套索，这阵还没回来，怕是喂了豹子哩！你来得正巧，把枪借给我们用一用吧。”

灰鼠狼没有哼声，鼻子嗅了一阵，末了，把眼睛停在我們“設筵摆席”的岩洞口，仔細瞧了一会，問赵伯伯：“那是什么地方？”

赵伯伯一本正经地答：“那是个大岩洞。”

“我知道那是岩洞。我是問你們在里边做啥子？”

“哦，做啥子？休息，吃飯，睡覺。”

灰鼠狼瞪了趙伯伯一眼：“你領我去看看。”

“你自己去吧，我還要干活哩，那裏邊不會藏豹子的。”

灰鼠狼只好一個人從坡邊邊梭過去。趙伯伯趁這個時候急忙和爹悄悄說了幾句，幾步跟上灰鼠狼，勸道：“錢先生，豹子說不定在松林裏藏着哩，你還是下山去吧，這不是鬧着玩的。”

灰鼠狼回頭看了趙伯伯一眼，不答話，繼續向前搜尋。一爬上岩洞，發現到處堆着兽骨，兽皮，他高興地叫了一聲，隨手把獐子皮呀、狐皮呀抱起來，回頭向趙伯伯獐笑了一下，用威脅的口吻說：“趙老头，你知道我錢三新是這青山上的候補管事，碼頭上的袍哥大爷，成都的鄧司令還要讓我三分，你敢提起腦壳和我开玩笑么？”

趙伯伯笑一笑，慢吞吞地回答：“你說哪裏的話啲？哪個敢和候補管事开玩笑！俗話說：有錢人屁裏有人參，餓狗跟到聞，聞慣了屁臭的，就听不得人話，我們窮是窮，說的話倒是人話。”

灰鼠狼一听話里有刺，惱了，可又把趙老头奈何不得，只好另換一套軟办法，向趙老头灌迷魂湯：“趙老头，你干得好，我升了管事，举荐你当棚长。”

趙寿廷一听這話倒真有些惱怒了：“錢先生，你把我当成哈叭狗么！你知道我趙老头只会听人話，聞不慣人參屁！你要怎么就直說了吧。”

灰鼠狼也惱羞成怒：“什么！趙老头，你……你不識抬

举……”

赵寿廷打断他的话：“算啦，你要这些獐皮狐皮么？兄弟伙大方得很，你拿去吧。拿去当人皮披上，不怕风，不怕雪，也好常到工地上来监工。”

灰鼠狼顿时两眼眯成了一条线，几根鼠须微微颤动了几下，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自己本不想说的话：“兄弟伙也够累的……”随即把所有的兽皮收拾起来，走出岩洞。

赵寿廷笑了笑，叮嘱他说：“钱先生，你披上这兽皮，要小心些呵，谨防豹子把你当獐子黑鹿吃啦！”

灰鼠狼眉开眼笑：“赵老头，你真是个好老头呵！”披着兽皮，晃里晃荡下山去了。

赵寿廷一出岩洞，就大声喊道：“你们还不快干活呀！”

话音未落，松林里传出几声豹子的嚎叫，四山回应，事也凑巧，正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平地卷起一阵狂风，吹得松林轟隆隆直响，风过处，黄尘滚滚，落叶纷飞，只见张大成从斜坡里跳将出来，边跑边喊：“豹子来啦，豹子来啦！”工地上的人全往山下跑。吓得灰鼠狼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往山下跑。工人们跟在后面，不住地吆喝，呼叫，三脚两步窜到前面去了。灰鼠狼见丢下自己，越发心慌，索性丢下兽皮，抱着脑袋，从岩壁上滚下山沟，把瓜皮帽也跑丢了。

众人见灰鼠狼走远，才不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敞开嗓门大笑，有的捧着肚子，有的在地上打滚，连平时不多说话的爹，也笑得前仰后合。我问张大成：“你学豹子叫，学得真像呀，这本事从哪儿来的？”正说时，王万锁和李顺发也回来

了，李叔叔肩上背一只黑鹿，四根蹄子用繩子拴住，听众人說，又大笑一通。万鎖哥說：“搞得好！这些狗日的，你越怕，它越要整你，俗話說得好，馬善受人騎，人善受人欺。”赵伯伯說：“这事还不算完，依我看，早晚要动真刀真枪啦！”

·狗腿子血濺豹子岭 两朋友力战出虎穴

回到工棚里，吃完饭后就休息了。当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照常出工，哪晓得邓管事忽然“出洞”了，一大早起来，头戴灰色呢帽，身穿羊皮大袄，手拿文明棍，腰挂盒子枪，下山沟去了。我担心地問赵伯伯：“他到哪儿去呀？”赵伯伯心不在焉地說：“他寻豹子去啦。”

我一眼看出赵伯伯脸带愁容。我还是第一次見他发愁。我早听說过，赵伯伯是大邑县靠山区的人，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二十年前，他还是一个穷苦佃农的时候，就成了四乡聞名的人物，能干、大胆、倔强、机智，样样活路，一学就会。穷人都喜欢他，有事就找他帮忙。只要哪家地主欺侮了他，哪家地主就要倒霉，或是在粮仓里发现橙子皮，粮食霉烂了；或是在小姐閨房里突然出现一条大蛇，盘在帐頂上，把小姐吓昏过去……有一年快过端阳了，地主叫他送五斤刀头肉，一只肥母鸡来，威胁說：“你不送来，夏上就退佃。”本来只租了二亩薄田，平常年景，一年打四挑谷子，按四六分，送給地主两挑多，剩下一挑多不够吃，哪有力办这份礼物？他当时应承下来，第二天一早，乡邻老少都在摆談，昨晚从山上下来一只老虎，翻墙剖壁，伤害人畜，真像神話一般。地主老財就怕蝕財，打开猪圈

一看，丢了一只过节猪，打开鸡籠一看，一条大蛇盘在里边，只剩下大堆鸡毛。阴历五月初四那天，地主家正鬧得烏烟瘴气的时候，赵寿廷切了一块刀头肉，杀了一只瘦母鸡，用盘子端上，附一张紅帖子，亲自送上門来。原来地主家的长工张长年和赵寿廷很要好，两人共謀巧計，半夜圍住恶狗，打开后院門，把鸡装起走了，把蛇和鸡毛換在鸡籠里，把猪牵走了，相約一堆旁哥儿在村子里传播老虎下山的童話。张老财虽然疑心是計，却又无真凭实据。他暗地中通乡长、保长，一天深更半夜，把赵寿廷繩捆索綁，卖了壮丁。一年以后赵寿廷逃回家乡，发现房子烧了，人沒有了，邻居們告訴他，他的母亲已經病死，妻子被张老财逼得走投无路，先是帶上孩子回娘家，后来又被她嫂子逼嫁在外乡。赵寿廷一听，把牙一咬，不言語，不流泪，向张长年借了把菜刀，半夜扑进张老财后院，从窗口跳进屋子，杀死了张老财，逃进了山林！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見了管事，也起了一脸阴云。

赵伯伯望着邓管事的背影說：“毒虫出窝，天要变了！小黄，你去告訴大家，小心在意！”

人們心慌意乱过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太阳快落坡的时候，远远望見山沟里上来一串子人馬，約有二十多个人，簇拥着两頂青篷大轎，有背长枪的，背短枪的，有騎馬的，步行的，邓相廷大搖大摆走在最前边，向工地这边望了几眼，然后，这群人馬前呼后拥地向座棚走去。有人說：“管事把大少爷、毕督办請来啦！”

我問赵伯伯，大少爷、毕督办是什么人。

“那就是真正的金錢大花豹呵！一个是太和公司的大股东，軍长少爷邓化平，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太和經理毕干成，外号毕督办。”

暫时的平靜消失了，一股黑风卷过来，烏鴉滿天飞，大伙的眉头皺得更紧了。晚上收工鑼打得特別早，我們吃过飯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一陣沉重的脚步声，毕干成杀气騰騰地来了，后面跟着两个背大枪的便衣队，左边是邓相廷，一双狡猾的眼睛滴溜溜轉，右边是一个蒼白瘦削的小娃，約莫十三四岁，左手拿銅烟袋，右手提一盞馬灯。在灯光下，只見毕干成身穿黑色对襟大褂，腰上插一支青光閃閃的手枪，雷公鼻子，豺狼眼睛，凶光四射，杀气逼人。人們都怔住了，毕干成把眼一扫，脸一沉，厉声喝道：“赵寿廷在哪里？”

赵伯伯正要答話，邓相廷用手电筒晃了一晃，喊一声：“老油子！你耳朵聋了么？”

“我姓赵的从来是凭力气吃飯，沒有舔过誰的肥，白拿誰一文錢！你装起那副神气吓唬誰呀！”

兄弟伙被赵伯伯的話壮起了胆子，有的从床上坐起来，有的在穿鞋，鉄器家伙发出丁当的挑战声。

邓相廷嘩的一声掏出駁壳枪，机头一扳，子弹上膛：“老头！你眼睛睜大些，我邓大爷不是錢三新！”邓相廷說着把駁壳枪一揚，“这二拇指一动，就要你的狗命！”

毕干成把手一摆，喊声：“来呀！”后面两个背长枪的拿繩子来捆赵伯伯，工人們忽地都站起来，有的拿斧头，有的拿槌杠、弯刀，万鎖用身子护住赵伯伯，准备厮打，赵伯伯把他推



开，胸脯一挺，厉声质问：“哪个敢捆我！我犯了什么法？”

毕干成咆哮说：“就是你犯了法！你煽动怠工，侮辱职员，打伤监工……”

赵伯伯冷笑说：“兄弟伙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监工贪财，自讨苦吃，与我何干？”

工棚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吼声。

“一天干十几个鐘头活路，臭包谷粑不給吃飽，还拿苦荞秆整我們，誰犯罪？”

“你这是哪家的法律？”

正吵嚷間，忽然从外边閃进来一个人，笑迷迷地說：“呃……毕經理，看在我邓化平的面上，不要动武……”大家一看这大少爷，脸上水嫩水嫩的，头上油油光光的，身穿笔挺西装，手拿文明棍，說話像唱歌。身后还跟了几个背盒子枪的。这大少爷把邓相廷手上的枪按下来，两个便衣队往后退了几步，又向毕干成使了个眼色，对大家說：“你們都安靜些，依理依法嘛，不要动手动脚。如今这抗战时期，砍木材是为了‘抗日救国’，你們辛苦点也是應該的。曠工、不干，就是反对抗日，形同汉奸……”

这話把大家怔住了。

邓相廷随即从怀里掏出个本本，双手捧給邓化平，将馬灯举起，邓化平向大家看了一眼，翻开本本，念道：“邓記太和伐木公司暫行章程第八条第九款：凡入山毛子，得遵守本章程各条款，忠实履行合同，如有怠工、曠工、侮辱监工、逃跑等情，不論輕重，按反对抗日定罪，重者枪决，輕者重責三花棒五十至一百……”随手合住本子，接着說：“听到了嗎？白紙黑字，这是‘蔣委員長’手諭邓軍长亲自訂的。你們說赵寿廷該定什么罪？”

万鎖在一边实在憋不住了，脸胀得通紅，怒吼道：“你們要送法院，送我王万鎖！要打打我王万鎖！不干赵寿廷的事！”

工棚里又騷动起来。

邓化平連忙轉弯子，說：“我家老太爷素來是待民以德、义重如山的。我生平也很重情义，毕經理，”他向毕干成使了个眼色，“看在老太爷和我的份上，姑念赵寿廷人老体衰，不加深究，开除他算啦。”

毕干成說：“好吧！赵寿廷，看在軍长、董事长的面上，饒你这一頓打，明天一早就滾！其余的人，一律听‘醒炮’上工！”

說完，一群野兽就趕忙回到洞里去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久还没有从紧张情緒里松緩过来，有的直喘粗气，有的瞪起一双仇恨的眼睛，一会，赵伯伯說：“兄弟伙睡覺吧，明天要上早工呢。不要担心我，我年紀虽老，还有把力气，啥子苦难沒有經受过？再說，我又是个孤老头子，四海为家，跑慣了，沒牵挂，……就是和兄弟伙熟慣了……”

赵伯伯說不下去了，眼睛眨了几下，滾着泪珠。頓時好多人都哭起来。

赵伯伯压低嗓子說：“我把这些龟儿子的鬼把戏看透啦！你道他們当真是开除我么？那么松和么？他們恨我，又怕我，想除掉我，又要在众人眼前做人情，敷面子，才打这个毒主意，在半路把我整死，做个人不知鬼不觉……”

大家一听都急了，还是张大成說出了个主意：“那你今晚就跑！”

我爹唉声叹气地說：“寿廷哥，你走了我們怎么办呢？再沒有别的法子么？”

“不走等死嗎？刀把子担在人家手里！”

万鎖給赵伯伯壮胆：“大成說得对，今晚跑，我送你走出豹子岭。”

一道手电的光亮在外面閃了一下，过去了。人們沉默下来。我走到赵伯伯跟前說：“我也送你。”张大成也要去。赵伯伯說：“好吧，这就走吧！”

我們四个人，带着快斧，伏在工棚外边一株大树的洞里，屏住呼吸，听了很久沒有动静，才沿着一条险峻的羊腸小路摸下山沟。一弯新月从云縫里露出臉来，一会又被另一朵云遮住，雾气从山谷間升起，在森林上面洒了一层烟幕，我們走着，不时停下来向四面张望。十里，二十里，鸡公山过去了，快到豹子岭了，这是一道約莫五六里长的狭长山谷，两边是笔陡的悬岩，中間一条窄路，走出去就是几条岔道，通附近几个县城。伐木厂的老板們經常在这条窄道上設下埋伏，抓住或杀死逃跑的工人。我一看見这聳立在面前的高大阴影，心就卜通卜通跳，我拿出快斧，紧紧跟着张大成，忽然，在后边大約半里远的地方，出現了手电筒的閃光，赵伯伯急忙停下来，向周圍看了看，說：“不要怕，看样子他們来晚了。”我說：“赶紧跑出去吧。”赵伯伯把斧子一晃：“他們有枪，我們分散开，在岩边埋伏起来，等他們走过，从背后……”

于是我們分头爬到岩边，赵伯伯躲在最前边的大石包后面，万鎖藏在一堆灌木丛里，我和张大成埋伏在岩洞口。脚步声漸漸近了，手电光在两边乱晃，一个黑影走过来。张大成悄悄捅了我一下，溜出岩洞，一块石头絆住我的脚，卜通一声跌倒了。那个黑影子惊慌地喊了一声：“誰？”掉过身来，打了一

枪。手电筒四处晃，我就势匍伏在土沟里，头也不敢抬。忽听哎哟一声，万锁从灌木丛里扑上去夺过手电筒，扭打在一起，我们也乘势赶过去，把那家伙翻倒在地，我举起斧头正要砍，赵伯伯说：“不忙，问清楚再说。”

原来这家伙是毕干成的著名打手李麻子，在他手下，不知流了多少伐木工人的鲜血！丧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如今落在我们手里，哪能轻饶他！这家伙躺在地上只愿求饶。赵伯伯喝道：“你照实说，毕干成叫你来做什？”王万锁用斧口抵住李麻子的脖颈说：“说一句假话，马上砍了你！”李麻子哆哆嗦嗦地说：“我说我说，毕干成叫我埋伏在这里，单等干掉赵寿廷，答应升我当棚长。”说着像捣蒜一般叩头求饶：“我以后不再作这号昧良心的事啦。……”冷不防他猛地站起来，一拳把我打倒，来夺斧子。王万锁背后一斧劈去，李麻子一声惨叫，倒卧在血泊里，再也不动了。

赵伯伯摸了摸李麻子的心口，点点头，把我们拉到路上就地坐下。这时雾更大了，也更黑了，似乎快到天亮的时候，赵伯伯说：“你们回去吧。”万锁坚决地说：“我跟你走！”大成也不想回去，我惦念着爹，没有说话。赵伯伯说：“大成，你不能走，你和小黄一块回去，我们也放心。”

在黑沉沉的夜雾里，彼此对视了一会。不知为啥，临分手的时候，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流一滴泪。

小刘玉逢友吐真情 毕干成毒施苦肉计

弟兄们突然失去了赵伯伯和王万锁，好像自己身上掉了

一块肉似的。我常望着东南方山脚下出神，誰知道他們逃到哪里去了呢？

过了两天，邓相廷通知迁棚到“齐家寨”修洪道。

一百多工人，像囚犯一样，背着烂草席，破蓑衣，一个跟一个，低着头走。有的連衣服也沒有穿的，头发又长又脏，全身污黑，看不見肉，只見一对布滿血絲的眼珠子在轉动；有的拿几块烂布巾巾，用草繩挽成疙瘩，围在身上；有的腰上拴一个木瓢，背一个烂背篋；有的正在害病，也被赶出来，拄一根棍子，喘喘歇歇。有个病人实在走不动了，另一个工人赶忙过去搀扶。我正和爹低声說話，忽然閃过来邓相廷，把行李往我跟前一擱：“給我背上！”

爹怕我頂撞他，忙走过來說：“我背吧。”

“爹！”我喊了一声，忍住气把行李接过来。

好多工人也背着管事棚长們的行李，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背的行李卷有他本人两个大，压得头上直冒大顆大顆的汗珠子。仔細一看，原来就是那天晚上給毕干成提馬灯的小鬼。我看着他可怜，就放慢脚步，輕声地說：“小兄弟，我替你背！”

这孩子扭动了两下脖頸，因为从头到腰都被行李压着，轉不过来。我又問：“你叫什么名字呀？”他用沙哑的声音說：“刘玉！”我搶着把他的行李背上。他跟在后边，小声地說：“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从談話中，才知道他是中江人，两年以前，母亲病死，爹就把他帶上山来，去年冬天，他爹病了，想吃白米飯，管事不給，爹掙扎着爬到柜房去鬧，被毕干成吊在一株核桃树上，拿冷水

浇，活活的冻死了。从此他就当了毕干成的“小娃”。

刘玉抹抹头上的汗说：“我想到灌县去讨口，也比这里松活。”

“你跑呀！”

“跑不脱呵！一天卡得紧紧的，要给经理管事洗衣服，拿烟倒茶，打洗脸水洗脚水，提鞋倒尿，每顿要守在桌子跟前添饭，有剩菜剩汤我才能吃，没剩的就要挨饿，经理管事不给一文钱，一点不顺意，两个耳光，一顿三花棒，你要是顶撞几句，他叫一声李麻子……”

一听说李麻子，我全身不由得震动了一下。小刘开心地笑起来：“现在可好啦，恶人遭恶报，是谁敲了他的沙罐啦！”

我故意问：“是谁？”

“听说跟一个姓王的工人有关系……”

“哪个姓王的？”

“开小差跑啦，就在你们工棚里呀。”

“你听谁说的？”

“他们在账房里议论，我拿烟倒茶听见的。他们还派了几条枪去追哩。”

“追到没有？”

“阿弥陀佛！打空手回来啦！”

我心里落下一块石头，出了一口粗气。

“齐家寨”是一座高山的名称，有藏民居住的寨子，有藏民耕种的土地和散居的板房。

我们一到新棚，果然情况大变。这是一个用树棒棒绑扎

的两层楼工棚，工人增加到四百多人，睡不下，硬挤进去，一翻身，一刮风，整个工棚摇摇晃晃；床上垫的是树枝丫杈、黄竹条条，早上起来，浑身酸痛；棚顶盖的是树皮子、烂木块子，太阳一晒，树皮子卷起筒筒，晚上下大雨，满棚漏水，我们只好挤在一堆，拿烂铺盖顶住脑壳，一夜没睡，第二天还照常出工。

一张大布告贴出来：邓相廷升了通河管事，又增加了青山管事、棚长，添了两名打手，一个叫李刚，一个叫李元旺（外号李閻王）。

我们吃的臭包谷粑里不掺苦荞籽，却添了很多老鼠屎。分量也减少了，一天十一两；原来每顿有几根干萝卜丝，现在只有半个干海椒，一小块岩盐要吃好几天。上工更早，下工更迟，火把去，火把回，后边有便衣队押送；早上一打“醒炮”，打手们便拿着三花棒来查铺，起来迟的，挑开被盖就打。吃饭的时候，管事、棚长坐在甑子旁边，不到五分钟，甑子一盖，抬回柜房，谁来迟了，一脚把饭碗踢翻。领包谷粑的时候，工人们一长串排在柜房的窗口前，由棚长清点人数，挨个散发，来迟了白瞪眼。

晚上查夜也紧了，一响“定更炮”，手电光到处乱晃，出去解溲也得挨三花棒。

一天早晨出工，忽见大树上绑着灰鼠狼，满脸青肿。大家吃了一惊。毕干成当着我们骂他，毕干成一走，他骂毕干成没良心，见了我们，装出一副可怜相，低声下气央告说：“弟兄们，做做好事，给我喝口水吧。我受这罪，也是为的你们呵！毕干成说我不会管教毛子。……”

不久，灰鼠狼当了副棚长，态度果然大变，对工人也和气些，肯和工人摆龙门阵，也常到我和张大成跟前问家常，甚至同情起工人没有菜吃的苦处，鼓励我们偷偷拔野菜的行为了。有人就说他天良发现，向着工人了。独有张大成不信这一套：“天良发现？他就没有天良！嘴上蜜钵钵，心上辣角角。这号子人烧成灰灰也是黑心肺！你们看着好了。”不管怎么样，灰鼠狼照样鼓励我们拔野菜。奇怪的是，几乎每次拔野菜，都要遇到打手们，有时他们突然从刺笆笼里钻出来，拦腰一棒；有时突然从树上扔下石头，把脑袋打个疙瘩……每次灰鼠狼都很关心地走来，看看伤，说两句安慰的话。

一个大雨天，我们没有出工，挤在工棚里，大家望着雨从棚顶上哗哗漏下来，正在怨天恨地，说张道李的时候，突然灰鼠狼挤进人堆喊道：“弟兄们！‘蛮子’地里包谷白菜长得正好！走！我们掰包谷拔白菜去！你们看，我还弄来了几条口袋！”

有几个一跃而起，披起蓑衣就往门外跑。灰鼠狼叫道：“都去都去，这样好机会不可错过！”连推带拉去了几十个。有个经常和灰鼠狼咬耳朵说话的工人陈光兴，硬把口袋塞给我，我拒绝了。

下午雨稍停，偷白菜的刚回来，有几十个藏族老乡跑来质问，为什么支使工人偷菜、偷羊子。毕干成推说是工人干的事，他不负责任。争吵一场没有结果，藏族老乡骂一阵回去了。我悄悄问跟去偷菜的李顺发：“怎么，你们还偷了人家的羊子？”李顺发说：“那是灰鼠狼他们干的，都牵到柜房去了。”

正說話的時候，工人們忽然爭吵起來：

“你們為啥子偷人家莊稼？”

“大哥莫說二哥，你們也差不多！”

“人窮骨頭硬嘛，偷雞摸狗的算啥子？”

“一顆耗子屎壞了一鍋飯，就你們幾個害了大家的名譽！”

“誰是耗子？你們三台人才是耗子！”

“你們樂至人是賊！”

“你們才是賊！”

我聽着罵樂至人是賊，很不入耳。正想站起來說幾句，爹和張大成碰一下我的腿，我回過頭來，才發現灰鼠狼不知什麼時候溜到身邊坐下，眯着鼠眼說：“你聽，在罵你們樂至人呢，罵得好毒！你們樂至人真能受這口冤氣！”

我說：“他罵的是賊，我們又沒做賊！”

人們還在互相叫罵，有的卷袖子要動手。爹忙出來調解說：“算了算了，弟兄們！都窮糊塗啦！扯皮扯得臉紅筋脹的，人家看笑話哩。不管三台人、樂至人，都一樣吃臭包谷，一樣穿爛巾巾，苦沒受夠？眼淚沒流夠？還有精神扯皮哩！人家偷了羊子，吃了羊肉，我們落個打得頭破血流，何苦來呢？”

工棚里有人喊道：“對呀！老黃說得對呀！”大家都不作聲了。我心里像一盞明燈閃亮，說不出來的興奮，望着爹的臉，卻沒有留心灰鼠狼不知什麼時候溜走了。

受挑撥大鬧王爺會 圖活命夜奔雜谷河

六月初六是“王爺會”，按照老例，這天要“打牙祭”。灰鼠

狼又拉了些工人夜里去偷羊子。

藏民又丢了羊，天不亮，就集合一大群男女老少，拥到賬房門口說理。我們听見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跑去看。毕干成打发便衣武装，放了几声空枪，又拿繩子捆绑了十几个藏民，要押送到理县去。几个藏胞妇女怒吼起来：“你們这些豺狼心豹子肝，財迷了窍啦！ 錢瞎了眼啦！ 把羊送回来！ 人放出来！”

“天杀你！ 刀副你！ 一木出林，万木遭殃！ 一代办厂，九代当娼！”

打手們放了几枪，把十几个藏民押送走了，一群妇女、孩子拥过来，抱住男人的腿不放，被枪把子打翻在地，放声痛哭。有的工人赶忙去搀扶。

接連几件事，鬧得人心里火烧火燎的，都猜不透那些豺狼耍的什么鬼把戏。工人中間，猜忌一天比一天多，你說我是賊，我說你不要脸。見面不說話，說話就要打架。

六月初六一清早，毕干成就把几百工人召集起来“訓話”。他罵我們是“懶虫”，是“賊皮子”，是“天生的穷骨头”；說我們修洪道磨洋工，一天放的木头不够数，要扣工錢。他把手一揚，威胁說：“你們有三百八十九个人欠我的債，十年也还不清……怎么？ 不相信？”他掏出賬本本，“看！三百八十九个人，不多不少。王紹清，欠三十万元，何常发，欠三十五万元，李順发，欠四十五万元，黄明兴，欠六十万元……白紙黑字……你們鬧什么？ 安靜些！ 皮子发痒啦！ 想造反啦！……你們以为我是聋子？ 听不到你們晚上唱的啥子歌？ 有胆子站出来唱

吧！你們几个不安分守己的家伙，要是你們想挨三花棒，想帶虎头枷，想在树上跳舞，就随你們的便吧！好啦，現在天气长啦，正是洪水季节，从明天起，一天干十六个鐘头，听到了嗎？十六个鐘头，要是作不到，磨洋工，就一文工錢也不給。……你們要是願意欠一辈子的債，也听便，我毕干成的三花棒是不認人的，你們这些賤骨头，反正打掉一块皮，过几天又会长出来的，那就試試看吧。……”

毕干成訓完話，工人們三三两两去王爷神前烧香磕头，祈求王爷消灾免难，逢凶化吉。我和爹也磕了头，跟张大成几个人到山上閑耍，大家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不說話，天气也沉闷得很，太阳被云雾遮掩，透不过气来。林地里散发出潮湿的霉烂气息，鳥儿在密林里喊喳乱叫。

我們繞过一道猫鼻梁，看見远远岔道上有人影子晃动，仔細一看，是便衣队。我們掉过头，从拐峁子轉上另一条路，又看見几个打手。这才明白，原来是毕干成为了防止工人逃跑，到处設下崗哨。大家轉游的兴致也沒有了，便轉身往回走。

吃午飯了，人們涌向一个小平坝——我們平常吃飯的地方。忽然发现一桩怪事：大多数的菜盆里，湯面上浮一层少得可怜的肉渣渣皮筋筋，另一少部分菜盆里却是大块大块的肥猪肉肥羊肉。我們正迟疑着，只听一声口哨，几十个人搶先占領了这块陣地。一向跟灰鼠狼称兄道弟的陈光兴，神气活現地說：“这羊肉好肥呵！不去拉羊子，哪有这肉吃！”这边的工人不滿地咕噥道：“不要脸！偷人东西还夸口呢！吃下肚去也不昌盛！”

陈光兴忽地跳起来，摆出斗鸡架势说：“你咒罵誰？想吃肉叫一声老子嘛，老子欢喜打发你一点。”

“呸！把你们乐至人的祖先都丢尽啦！”一口唾沫吐过去，正吐在菜盆里。

十几个工人跟着陈光兴冲过来，饭场混乱了，菜盆打翻，几十双粗大油黑的拳头攪在一起，叫喊着、咒罵着，一只草鞋从空中掉在大饭桶里；一个工人被踩在脚底下，嘴上流血，他刚挣扎起来，又被灰鼠狠飞脚踢中脑袋。我一看打倒的是李顺发叔叔，忙窜上去，把他抱起来，一手架起拳头往外冲，正招架不住的时候，周铁棒、张大成和爹都冲了进来。周铁棒大吼一声，六只胳膊像铁柱子一般，分开众人，人们向两边溃散，好像无数小浪被一股大浪淹没了一般，无数的拳头倒了下来。这时候，爹声音颤抖地喊道：“弟兄们！你们听听我老头子的话吧！青山毛子都是一个命呀！一天两顿臭包谷，哪样野菜没吃够？刺龙宝、野菜花、六二九、石杆菜！哪样苦罪没受够？三花棒、虎头枷、鸭儿浮水冰灌肠（一种吊刑）！苦熬不下几个烧纸钱，还了旧账欠新账，算盘一响眼泪淌，堂前爹娘不能见，妻子儿女哭断肠。你们打吧，看倒霉的是谁呀！……”

爹说着哭了起来。人们这才去看李顺发。只见他头上、肋骨上，都被铁器打了几个窟窿，血流不止。山上没有药敷，只好用清水洗，用破布将伤口包扎起来。大伙把他抬进了工棚。

第二天，狗管事就来逼着李顺发上工，大伙求情，答应把他那份活路包下来。管事哪里肯听。没法，只得把李顺发抬

到工地，藏在一株大树洞里，下边铺些枯草败叶。就这样“休养”了几天。

因为流血过多，尽吃臭包谷糊糊，李顺发渐渐支持不住了，整天发高烧，昏昏迷迷，过了几天，伤口生蛆啦，我们又把他抬回工棚，要求邓相廷送他到杂谷脑医院。

“邓管事，李顺发快死了。积积德吧！谁没有个三灾八难呵！”爹求告说。

毕干成这黑心贼眼珠一转说：“真快死了吗？这不能不問！”回头吩咐邓相廷：“把賬本子带上，去看看。”

当他们来到工棚的时候，李顺发已经不省人事，伤口的臭味扑鼻，毕干成赶忙用手巾捂住鼻子，邓相廷拿文明棍戳一戳李顺发的身体，向毕干成说：“看样子不行了！”

毕干成不信，把文明棍夺过来，在李顺发的脸颊上敲打了两下，李顺发嘴唇颤动着，呻吟了一声。毕干成骂道：“你这懒狗，装得好像呵！要赖賬是不是？告诉你，就是真死啦，也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卖钱，还我这笔债！……把合同拿来算一算……”狗管事翻开賬本，一手打着算盘念道：

“民国二十九年，李顺发害‘烧二哥’病（打摆子），借米五斗；砍杉木不合规格，扣年工资三斗；民国三十年扣工具费四斗五升；民国三十一年，买新衬衣一件，折米四斗。扣草鞋费、鞋子费三斗五升……三年共計欠米两石，加上利息……”

还没念完，李顺发就不行了。毕干成又用文明棍在李顺发的脸颊上敲打了两下。李顺发现出了怒容，语不成声地说：“經理老爷，……跟我一块……到阴間……去算賬吧……”

我們用几块树皮子裹住李順发的尸体，抬在一棵大树旁边，挖了个坑，爹忽然想起什么，又跑回工棚，拿出两个包谷粩来，塞在死者的手里，然后，把死者掩埋了。

爹坐在新土堆旁边，呆呆望着随风飘散的落叶，长久不說

話。森林里的空气真悶人呵！傍晚的太阳放出昏黄色的光輝，四周的阴影逐渐包围过来，风吹得树叶儿瑟瑟发抖，几只烏鴉在头頂上盘旋，凄惨地叫着。

“爹！我們走吧，天快黑了。”

爹不住地叹息。

过了不久，我們在洪道边修架子路，鋸馬脚料。爹趁四



下无人的时候，忽然对我說：“志儿，我們逃走吧！”

我吃惊了，望着爹，尽力想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他内心盘算些什么。

“你看，你上山也两年啦，这笔賬一輩子也还不清呵！我原說今年能够伸伸抖抖回家团年，給你媽，你弟弟妹妹买点什么……誰知老板东算西算，利上加利，給李叔叔就算了六七石，我們还欠的多哩，光两次回家借了一石多，杂七杂八不得十几石？……志儿，你爹也五十出头了，看見李叔叔死，沒个亲人在身边，連个尸骨都搬不回去，心里真疼呀！”

“爹！你不要想得太多了！”

“山里比地獄还黑呵，他們天天在謀害你，拿繩子纏在你頸子上，越纏越紧，只要他們喜欢，繩子一收，就跟李叔叔一样……唉！万一我有个好歹，你娘……你……还有你弟弟妹妹……”

“爹！我們跑不出去呀！”

“跑不出去也要跑，总比眼睜睜讓人家拿繩子勒死好得多，唉，你真該跟上赵伯伯走呵！”

“我們找赵伯伯去。”我心里忽地閃亮了一下。

“說不清他在哪儿呢？……你听我說，志儿，我想了好久，只要翻过这架山，再走三十多里就是杂谷河，……你看清这方向了么？一直往东走。不經過威州、灌县，一过杂谷河，多翻几架山，从茂县繞个大圈儿。这些龟儿子不会想到从这个方向来追我們的。”

“可是，爹，你沒有想想我們回去做什么呀？”

“想过的。守着家园比啥子都强，这两年把几亩田也荒了，回去好好收拾收拾，喂几条猪，把你弟妹拉扯大……”

“要是保长再拉壮丁呢？”

“实在呆不住的话，我们两爷子就在各州各县下力，抬滑竿，也比山里痛快！”

“张大成怎么办呢？”

“他也会逃跑的。我们昨天夜里商量过，不要一块跑。叫管事们发现，我们一个也难跑脱了。”

我脑子里出现了妈妈和弟妹的形影，出现了故乡的情景，小池塘、溪水、石桥。“好吧，听你的话，爹。”

那一夜，我翻来复去没有合眼。估计快要放醒炮的时候，爹捅了我一下，我们带着弯刀，蹑手蹑脚地走出工棚，穿过羊肠小道，躲进密林里。四周一片漆黑，树上间或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和各种小虫的鸣叫声。爹拉着我的手走出密林，沿着预定的方向摸下山沟。这是一条大约两米宽的溪流，岸上堆积了许多木材。我们涉过溪水，听见山上放醒炮的声音。我们从乱石堆里爬上山道。一阵风吹过，跟着下起雨来，满山雾气弥漫。忽然爹叫了起来：“志儿，我们走错了方向。”

但是回头已来不及了，天已经大明。我们在山巅、土梁之间拐弯抹角往前走。心一发急，脚步也加快了。快走上山头的时候，雨停了，太阳从正面照射过来，雾气跟着消散。

“站住！”一声尖厉的喝叫，在山谷间引起了长时间的回应。

我猛回头一看，在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三个人

追上来了。

爹急促地说：“快跑，翻过山就好了。”

“站住！开枪啦！”

我已经爬上山顶，爹落在后边几步远，喘着气催促道：“快跑！”这时枪响了，爹轻轻哼了一声，倒在地上。

“爹呀！”我惊叫一声，打算去搀扶他。

“你快跑，不要管我，打死也比抓住好！”

天呀！我怎么能丢下爹呢！一看，敌人从三个方向包围过来，从正面追来的是李阎王。爹两步爬上山顶，伏在灌木丛里，搬起一块大石头，等李阎王刚冒出个头来，爹举起石头砸下去，李阎王倒下了。爹就势扑在他身上，用石头在他头上乱砸，把他的头砸得稀烂。末了，爹无力地丢下石头，倒在李阎王的尸体上了。

我丢了弯刀，一下扑在爹的身边，抱住爹的头，摇他，叫他，再也叫不应了，但爹的眼睛还睁着，好像在责备我不听他的话，没有快跑。这时另外两个狗腿子已经跑上来，一把揪住我，骂道：“走吧！狗杂种！”我说：“把我打死吧！我要和爹一块死！”那两个狗东西不由分说，就把我绑了起来，嘴里塞上破布。

死里逃生黃志遇救 故友重逢月夜談心

他們不讓我与工人們見面，繞路走到賬房，帶我去見畢干成。

“畢經理，逮回来一个。”

“老狗呢？”

“被李元旺打死了。”

另一个补充說：“李元旺也叫老狗拿石头砸死了！”

“不中用的东西！……好呀！小杂种！又打死了我的工头，”說着，毕干成走过来狠狠揪住我的耳朵，“还想跑么？欠我的債不想还了么？你們干了三年，欠我十多石米，几十万块钱，想騙起走么？……你要双倍的还我。唔！把李元旺欠我的債也加上，誰叫你們打死他！好吧，先把他枷上，这小杂种还没有尝过这味道，等我吃过午飯，睡过午觉，再給他吃点別的东西，要他招認出来为什么要逃跑，和誰商量过，还有誰想逃跑……帶下去吧。”

他們給我帶了一副沉重的虎头枷，用繩子捆住我两只脚，然后把我关进离賬房不远的岩洞里。这里似乎是一間特等牢房，洞口有一扇厚木門，用斤把重的大鉄鎖鎖住，門上一个小小方孔，只有飯碗那么大。洞里阴森潮湿，一股血腥味令人作呕。在黑洞里呆久一些，周围的情景也看得清楚了，地上摆几块大石头，到处堆些烂布巾巾，乱头发。水从岩壁縫里渗出来，跟地上的血水渗合在一起，反射出暗紅色的微光。我想，不知有多少工人在这里遭了毒手哩。重新逃跑和急于求死都没有希望了，因为这副枷把我箍得渾身不能动弹，只好坐在石头上，把枷靠住岩壁，想減輕一点它的压力，但是不久，岩上的水順着枷流到脖子里、背心里。我閉住眼睛，細細回忆爹临死时的面孔，爹的一切……

忽然有人輕輕打着招呼。奇怪，是誰呢？紧接着又喊了

一声，我睁开眼睛，看见窗洞上露出一个孩子的面孔。

“黄志哥，快，给你！”

原来是刘玉。我挣扎着起来，靠着岩壁摸到窗口，小刘连忙将一碗水送到我嘴边，喝完以后，又将两个包谷粑塞在我手里，中间还夹着菜哩。

“小刘，快回去，他们发现你就没命啦！”

“不要紧，他们睡得像猪一样，你快吃。”

整个下午没有动静。天黑时，两个狗腿子把我带出牢房，卸下虎头枷。

“狗崽子，饿了吧？吃烤鸭子啦！经理特地为你准备的。”

我横了心：听凭贼种们摆布吧。

狗腿子押着我，来到后山，停在一株大黄桷树下，又将我的脚捆紧，一个人爬上树，骑在一根大枝干上挽绳子，不大工夫，就把我头朝下脚朝上反挂在树上了。我四肢的骨节像碎裂了一般，一阵血涌上来，眼花耳鸣，火星乱飞。狗腿子跳下树，向我冷笑了一声说：“这叫‘鸭儿浮水’，最便宜的菜。懂吧，经理看你年青，特别照顾你，要是再想要花样，逃跑，骗钱，那就要你尝尝‘倒吊金钩’‘火烤两面黄’了，这些菜你连见也没有见过！”然后，这两条狗大摇大摆地走了。

林子里，乌鸦惨叫，毒蛇蠕动。从毒蛇想到豺狼虎豹，头皮便发起麻来。直到一声定更炮响，才记起这里离工棚很近，时间还早，大约野兽不敢来。可是爹临死时候的面影又出现了，这面影逐渐增大，逐渐明显，逐渐鲜活，满身血迹，在说话哩，在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哩。我哭了，泪水从干涩的眼睛里挤

出来，我正准备问他说的什么，面影又突然不见了。眼前一片黑暗，感觉背上像针扎一样的刺痛，接着，腿上、脖子上、胸部也刺痛起来。我想起赵伯伯说过，山上有种拇指般大的毒蚂蚁和长脚蚊，很多遭吊打的工人，被它们咬得遍身血泡。一时皮肤火辣辣的，痛得我想在地上打滚。我咬紧牙，拼命抖动全身，想把这些吸血虫抖下来，可是白费，虫子越聚越多，只觉得在鼻子上、嘴边、耳朵里到处乱爬，后来，我已经分辨不清楚是蚊子的声音还是耳朵的轰鸣，便昏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有人叫我的名字，用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扫虫子，一阵风吹过来，我清醒了。

“黄志哥，是我刘玉。”小刘边说边替我解开绳子。

我躺在草坪上，尽力活动四肢，小刘递给我一把弯刀，说：“这时候还不到半夜，你快逃走吧！天不亮，他们就要送你到理县卖壮丁了！”

我紧握住小刘的手，看着他的眼睛。

“黄志哥，快呀！”

“你呢？要逃我们一块儿逃！”

“你先走吧，我还想在这里多留些时候。”

“为什么？”

“你看，要是我走了，这次就没人来救你啦！”

我把小刘的手握得更紧。

“时间不早了，你快走吧。”

我把弯刀插在腰间，站起来，猛然看见半山上一道手电的亮光，我急忙抓住小刘的手。小刘却很镇静：“不要紧，还离得

远哩，这齐家寨我熟悉得很，我可以从那边岩畔上梭下去，他们还没有上坡，我已经上床睡下了。”

手电光又晃了一下，他们从后山上来了。

小刘指着高处一片密林的阴影说：“你先在那里藏起来，等没有动静了，再从右手绕下二道沟。千万不要往山下跑，他们轻轻一把你逮住啦！”

我向高处的密林跑去，不时停下来看看后面，手电光越来越近，隐隐约约，好像有三四个人；他们快要走到黄桷树下的时候，我已经钻进密林，爬上一棵大树，只见手电光四处乱晃，停了一会，有两个人向山下跑去。另一个却从我这方向上来了。我溜下树，从右边穿过林子，后面的人也跟踪追过来。我沿着山道跑，走到两条岔路跟前，选一条最窄的小道向山上走，发现前面一间藏民住的板房，閃爍着灯光。我没敢停留，又跑。快到杂谷河边的时候，迎面山头上已经现出灰白色，回头一望，齐家寨尖峰高耸，黑影幢幢，好像一只巨大的怪兽，这黑影似乎向我头顶压来。我加快了脚步，远远望见长长的一道闪光，听见了河水的咆哮声，这声音越来越近，随着东山上逐渐升起的彩霞，河身越发看得清楚了。

我一股劲涉过了杂谷河，沿河边走着，疲劳，饥饿，受毒刑以后的创伤……一齐来折磨我，走着走着，顿时两眼昏花，天旋地转，我终于不省人事，倒在地上了。

等我完全苏醒的时候，发现睡在一间茅草房里，周围是土墙，一边墙上挂些农具，另一边是锅灶，锅里正冒热气，我怀疑是做梦，摇晃了一下身子，这一摇，把睡的板床摇得吱吱的响，

惊动了外边的人。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你醒啦，快吃点稀飯！”說着，給我盛了一碗热气騰騰的白米稀飯。

我想坐起来，刚一直腰，渾身疼痛，四肢酸麻，她赶忙把我按下。

“不要动不要动，……怪可怜的孩子，受这些苦难，爹娘見了才心疼哩！”

她是一个普通庄稼妇女，温厚，賢慧，看样子不过三十岁左右。我惊奇地問：“大嫂子！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呀？”

“这个地方属威州管。娃儿的爹叫傅大奎，在利川伐木公司当‘漂师’。你是今天上午被他們救出来的，那时他們正在夹壁岩拆垛子，刚救出来，傅大奎的两个朋友就說認得你，赶忙抬进家里，用温水暖身体，直到你呼出一口长气，又睡过去的时候，他們才去繼續干活。你尽管放心，这里和你家一样，你安心将息身体吧，看你多瘦呵！”

“那两个好朋友是誰呢？”

大嫂子笑着說：“他們叫我不忙告訴你，你猜一猜。”

晚上，有四个人进屋里来。我一看，其中两个原来是赵伯伯和万鎖哥，我不禁放声痛哭。赵伯伯坐在床边，拿身子偎着我，时而給我擦眼泪，时而摩摩前額，过了好久，我才漸漸平靜下来，把前后的經過告訴他們，大家又是叹息。

这傅大奎兄弟二人，他弟弟大綱，約莫二十七八岁，身体高大，闊肩挺胸，两眼发光，一看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大奎沒有大綱壮实，也不多說話，坐在一边，双眉紧鎖，嘴

上舍一根旱烟管，巴达巴达不停地抽。他見大家都不做声，就說：“这世道快变了吧？日本鬼子投降啦，不打仗，日子該过得松活些吧？”赵伯伯說：“啥子松活呵！听说刮国民党蔣該死正調兵遣将，打共产党哩！”大嫂插嘴說：“难怪四乡又在抓壮丁。”大奎說：“这年头，反正掙下銀錢是保长、老板的，生下儿子是老蔣的，轉来轉去也轉不出人家手掌心！”万鎖說：“我看这蔣該死是真該死了！今天也喊打，明天也喊打，共产党反而越打越多哩！”

赵伯伯压低嗓子說：“共产党跟穷人是一事。古話說：官逼民反，越逼越反。反的人多啦，官家江山还能坐稳？你們看，这几年当官的哪个不发国难財？刮来刮去还是穷人遭殃。我才到利川伐木公司，听说这儿的老板靠山大，势力厚，本錢多，工錢高，把別家伐木公司挤垮，把工人騙得来，先灌迷魂湯，再打耳瓜子。到年終，工錢算成票子，票子天天跌价，算来算去，还倒剝你一层皮；誰要是哼一声，就把你判个汉奸罪名，丢监下獄。老板呢，到处修大公館，地下鋪外国呢毯，买田置地，招兵买馬……”

我插嘴問：“这家老板是誰？”

“有名的范軍长，罗师长，陈毛牛，你不知道？”

大綱說：“嘿！我昨天从賬房走过，听陈毛牛說，日本投降啦，老板更要发财了！日本鬼子一跑，好些中央牌的大官都去南京上海发劫收財，四川的土軍閥也回重庆成都啦，范老板打电报来，叫把工人逼紧些，赶快把几万立米木材运到成都，捞一笔大款子。”

我問：“誰買這幾萬立米木材？”

“你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大城市里再沒有飛機下蛋啦，大官僚、大財主們在城里拆民房，蓋大公館，修大公司，要木材，聽說南京上海都跟范老板訂了貨哩！”

萬鎖說：“這世道變來變去，還是我們窮人倒霉！等着看陳毛牛的手段吧，比畢干成毒辣得多哩。”

聽他這麼一說，我又難過起來，很想回家去。

趙伯伯沉思了一會，搖搖頭說：“回家不行呵：畢干成不會放過你的，他們要打發人到樂至去抓你，找你的保人，把你關進監里。”

萬鎖哥也說：“就在利川公司先混混吧，大家一塊住，一塊吃。”

趙伯伯接口道：“對，等你將息幾天，跟我們一塊去做工吧。你也二十多啦，不要天天想着爹，自己身體要緊。”

這時已經深夜了，慘白的月光從窗口射進來。我緊緊握住趙伯伯的大手，心里一酸，幾乎又流出了眼淚。

工人斗智謀三年不見一木 大魚吃小魚利川獨霸岷江

我在利川伐木公司整整干了三年，這三年中，我和趙伯伯他們一起當毛子，當“漂二娃”，走遍了岷江灘。趙伯伯待我比爹還親。

利川廠經理陳毛牛，真名陳益奎。見他我就記起畢干成。但陳毛牛比畢干成更凶殘，更沒有人性。他生得滿臉橫肉，眼睛像湯圓大，胸口上長滿四五寸長的黑毛。常提着手槍，騎着

大馬，后面跟着警卫，从山上走到河边，从这个工棚走到那个工棚，来回巡查；手下的监工一律穿軍服，背短枪，出工收工，前头一些兵，后头一些兵，把工人押在中間，像押送犯人一样。他还养了一群松潘狗，这些狗都受过专门訓練，有的叫“米苏”，有的叫“銀耳”，有的叫“云云”；每一条狗值一百个硬洋，一天要吃半斤肉，三頓鸡蛋炒大米飯。一到工人收工回棚的时候，陈毛牛就命令监工們到处喊：“放狗啦！要扁痢扁血的快一点！”狗摇着尾巴跑出来，先在工棚周围轉几遭，汪汪叫个不停。然后坐在棚子中間，伸出舌头，露出利牙，眼睛盯住工人。大家都睡下了，它們便到处搜寻，听见什么响动，嚎叫几声，监工的就应声而出，虛放几枪，吓得工人們半夜不敢出外解溲，屎尿都拉在工棚里。

狗住的地方是两层板房，淋不着雨，刮不着风，冬天也很暖和。陈毛牛派专人侍候，訓練跳高，扑假人。因此，这些狗学会了一种本領：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追捕逃跑的工人，专咬工人的脑壳和心口。咬死以后，陈毛牛就当着一工人把尸首抛到河里，洋洋得意地說：“老子的狗比几排枪还凶哩！有胆子的再試試看！”

这是日本投降后第二年的春天，我和赵伯伯他們一起，在双卡子伐区修洪道，出口处直通到杂谷河。一天，我們正修过沟架子，陈毛牛的大狼狗又咬死一个逃跑的工人，丢在河里。事后，工人們偷偷把同伴的尸体捞出来，挖个坑掩埋了；傅大綱忽然把鋸子往地上一扔，罵道：“跟他們拚了！”

好比一把火，立时把周围几十个工人燃烧起来，有的拿起

斧头要杀陈毛牛，有的要和管事算血賬。傅大奎說：“拚是拚不过的，他們有枪，有松潘狗，我們手无寸鉄，拚也是白丢性命。”一句話說得人人泄气。傅大綱翻了哥哥一眼。赵伯伯忙說：“大奎說的也有道理。硬拚不是办法，我們要 和老板斗智謀 給老板来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說不出。”

我猛然記起前天修架子路的时候，把馬脚料鋸长了，木材放下来，从洪道上飞出去，把架子也打垮了，于是灵机一动，对赵伯伯說：

“眼看要到涨桃花水的时候，我們要叫它放不出一根木材！你看，那不是过沟架子路和悬岩架子路，只要把馬脚料鋸长些，或是鋸短些，叫木材飞洪，打垮架子，垮了又修，修了又垮……”大家笑起来，大奎說：“监工的查出来怎么办？”万鎖笑道：“那些草包懂个啥子！查出来他也不能替我們修！”赵伯伯想了一会，拍着脑門說：“对！就这样办！我們不光是要在涨桃花水的时候，叫老板看不见木材下水，还要在整个洪水季节，叫木材过不了卡子。大綱，今晚你抽空給漂师們說一声，和这边合伙干，又要木头漂不出灌县，又要老板查不出破綻来。”

果然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这个伐区的所有洪道，每条不到一百米的架子路，要修一个多月，刚修好，管事、监工催着放木材，只听山上一陣轟隆隆的雷鳴声，架子路被飞洪打垮了，这时正是桃花水涨，杂谷河上孤零零地漂了几根木头，陈毛牛大罵管事监工是飯桶，叫工人日夜加班，赶修洪道，一月以后才修好，但是桃花水已經过去了，放下的木头，在各个洪

道口碼起了大大小小的垛子。陈毛牛气得直翻白眼，工人们却暗暗高兴。

“漂二娃”一听说山上干起来了，个个都摩拳擦掌，干了起来。他们利用槌漂的机会，从这个工棚传到那个工棚，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在河里，在沙滩上，在两岸的石岩上，纷纷议论着。监工们一来，就喊起号子，假装着干活，将垛子上的木头东刁一根，西刁一根，横七竖八地摆在沙滩上，岩畔上；七八月份，洪水特别大，一涌过来，好多木头冲散失了，在岷江河一带的金枪岩、狮子口、豹子圈、铁门坎、五花岩等大卡子上，插起了大小垛子百十个，有的垛子高得像小山。到九十月，洪水过去了，垛子一个也没有拆下，紫坪铺收不到木头，范老板从重庆成都打电报来催，陈毛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吹胡子瞪眼，骂管事，打工人，闹得沿河两岸鸡飞狗跳，可就是眼巴巴看着好几万立米木材，换不来银子。

一九四七年夏初，桃花水正涨的时候，我们仍然用这个办法修洪道，放木材。但是陈毛牛把计划改变了。四月，他集中了大部分工人去赶漂、拆垛子、放筏子，将管事、监工、打手都调在沿河两岸来巡查，这样一来，有些胆小的工人没有主意啦，傅大奎就是一个，他劝我们：“鸡蛋不要跟城墙碰，凡事都是命注定的，恶人自有恶报，自己安分守己，求得一家大小饿不死就算了，何必多管闲事呢？”傅大纲顶撞说：“按你说，那些被松潘狗咬死的，乱棒打死的弟兄，都是恶人遭了恶报啦？”

两弟兄谈翻了脸，吵一架，各自干活去了。

眼看大河里的垛子接二连三快拆下来，我又急又气，问赵

伯伯怎么办，赵伯伯说：“人心不齐，凭我们几个光杆杆蛮干要吃亏的。”

凑巧这年这一带伐木公司都想捞一把，木材催得紧，抢着往紫坪铺赶漂，把一条河挤得满满的。老板们混水摸鱼，明争暗夺，抢木头，拉工人。势力大的公司，像利川、利记、松太等，有枪杆子，有钱，收买一批地痞流氓，袍哥大爷，霸占河道，抢先赶漂；势力小的伐木厂干瞪眼，赔了本，还要挂红送礼赔不是。真是狗咬狗，大鱼吃小鱼。

这年七月，我们赶漂到威州，正遇上利记公司，陈毛牛的管事命令工人：“快呀！快抢过利记，陈经理有奖！”

工人真的去抢，利记也不甘落后，结果把利记的两个工人挤下水去，利记的管事在岸上骂起来：“他妈的，再抢我要开枪啦！”

这边也不相让：“你才他妈的！你有枪我没有枪！”

“我们到李尔康那里去说话！”

“我们到范军长那里去说话，你们那个李尔康算个毬！”

“你在川西北打听打听，提起茂县专区的大舵把子李尔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是我们杨老板杨华堂的姪儿。你想在老虎嘴上拔毛么？”

“哈哈！我就敢在兔子嘴上拔毛。要是乖乖的让路，给你留点面子，要是不识好歹，休怪我手下无情！”

说着，把盒子枪大小机头一扳，哗啦一声，子弹上膛，两排队伍跟着张牙舞爪，摆开阵势；那边也不示弱，十几个便衣队举起长枪，作出饿狗扑食的姿势。

“你是哪个公司的？”利記的管事口气緩和了一些，打算妥協求和。

“你是哪个碼头的？”利川的管事毫不客气，繼續进攻。

“都是自家人，何必認真！”

“臭婊子！誰和你是自家人，干脆点，讓不讓路？”

“狗杂种！你罵誰？老子就是不讓路！”

“你敢說三声不讓！”

“莫說三声，一百声也……”

話音未落，一声枪响，紧接着“叭！叭！叭！”一陣連发，子弹向上空飞出去，利記的管事一惊，摸摸脑袋。

陈毛牛的管事冷笑道：“哼！亏你还在混碼头，几声空枪就吓得屁滾尿流，……滾回去吧！”掉头向工人们大喝一声：“快搶到前头去，我拿人格担保，搶赢了，每人奖一块大洋。”

有些工人果然一拥而上。利記的管事恼羞成怒，忽然掉轉枪口，叭叭几声，利川的工人倒下了，这边队伍也急忙向利記的工人射击，頓時工人处在两面夹攻之中，喊声震地，血肉横飞，利川人多势众，一股劲压过去，利記渐渐不支，且战且退，約莫半个小时，結束战斗，利川胜利了。

可是沙滩上却洒下許多伐木者无辜的鮮血。陈毛牛馬上貼出布告，管事連升三級，奖励大烟二十两，沙滩上的尸首却沒人掩埋。

火燒木料場利川厂呼救 打死松潘狗陈毛牛哭喪

一滴血一个教訓，一滴血一分仇恨。上过老板一回当，河

里漂的木头又减少了，旧的垛子还没有拆完，新的又插上了，每次遇到利記、松太搶漂的时候，尽管陈毛牛的狗腿子喊得喉嚨嘶哑，也没有人冲上前去；洪水季节很快过去了，岷江河滩上，稀稀拉拉，横七竖八的摆起木头。两年間，光紫坪鋪一个地方，就堆积了近万立米木头，沒有漂下成都。木头被太阳晒得焦干。一个晚上，这堆木头忽然着了火，急得陈毛牛和他的狗腿子們大哭大喊：“利川的弟兄們！快来救火呀！”

工人們望着熊熊火焰，沒有理睬。

“陈經理賞給每人一斤酒两斤肉，快来呀！”

“經理和你們是一家人呵！”

工人們爬到高处，观看火景，直看着木头烧尽。

事后有人說，利川公司气数尽了，这是菩薩放的一把天火。也有人說，这是利記公司为了报复威州一战，收买地痞流氓干的。不管怎么样，我們都觉着快活！

这年底，利川公司的老板借口損失太大，亏本太多，剋扣了工人一半的工資，有的債上加債，討吃回家，有的在灌县一带流浪，背炭，背石灰；我和赵伯伯、万鎖怕抓壮丁，怕遇見毕干成的狗腿子，不敢回家，也不敢在县城流浪，便在大路边上“打堂”，当脚伕，抬滑竿。过完旧年元宵，又进了利川厂。

一九四八年，蔣管区越来越糟，物价一天涨几次，法币当废纸卖，大官們，土豪們，你爭我夺，加租加稅，好像粪池里一群搶屎吃的狗，快要淹死了，你挤我，我挤你，都想在这最后的时刻多捞些油水，苛捐杂稅像插在穷人头上的利刀，逼得穷人无路可走，城里城外，街边路旁，到处是乞丐，到处是餓死的

人。

老百姓偷偷的传说，大巴山上红军又过来啦，苏维埃政府设在通江，不派款，不要粮，打一仗，胜一仗，龟儿子“刮民党”军队命不长啦，说得人们半信半疑，又惊又喜，盼望着，担心着。

这年，利川公司的老板对工人更加恶毒，工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了。陈毛牛将工时延长到十六七个钟头，工人们由于过度劳累，害病的特别多，一个工期竟病了五六十人，有的害痢疾，有的害伤寒，有的遍身浮肿。陈毛牛不管三七二十一，叫人挖些大黄，泡一锅开水，见人一瓢。好些人喝下去，发高烧，烧的嘴唇乌黑，心里发慌，爬到河边去，泡在水里，结果，有的被洪水卷走，有的被背水工人发现，扶回棚来，不久也死了。

兄弟们见这惨景，心想：与其留下来折磨死，不如逃出去寻活路；晚上有松潘狗追捕，难跑脱，就在白天赶漂的时候，事先约好，趁监工们不防备，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成群结伙的逃走；没有跑的工人，天天跟老板磨洋工。河道那么长，木头散失那么多，监工的也顾不过来。

在那一段时间，岷江河上经常听到枪声，经常在山岩上、河滩上发现腐烂了的尸体。尽管这样，逃跑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不到一月，跑掉近一半的工人。后来，陈毛牛想出一个办法，白天也将松潘狗放出来，在重要卡子上沿河逡巡，监工们远远躲在能够听到狗叫的地方，这样一来，一个监工就可以监视好几处工地了。如果遇到两三个人分散逃跑，就分头追捕，狗比人力气大，跑得快，往往一遑可以追捕好几个人。

一次，我们正在塔子沟拆一个中垛子，远远看见一条松潘

狗摇头摆尾地过来了；它先在河岸上来回跑着，然后坐在沙滩上，吐出舌头，用猙獰的眼光盯住工人们干活，不时舐一舐被狗蝇子咬过的地方，发现有誰歇口气，就汪汪地叫，有誰想下垛子上岸，它就摆出要扑人的架势。等了好久，我看看远近都没有狗腿子跟上来，向赵伯伯使了个眼色，拿起啄竿装做要上岸的样子。等走近岸边，松潘狗果然张牙舞爪扑过来，我就势用力一竿，将狗打落水。这畜牲原来只能在陆地上逞凶，一下了水，就只有招架之功了。赵伯伯、大綱、万鎖等人急忙迎上来，趁狗仰起脖子在水里掙扎的时候，四五根竿子一齐叉住脖子，将它卡进水里，一会，只見它身子颤动了几下，就沒气了，連哼也沒哼一声。

这件事轟动了岷江两岸。陈毛牛派了几十人，四处找寻他的爱狗，后来，终于在下游河滩上发现了它的尸体，陈毛牛哭了一场，一面打电报到重庆成都，向大老板报丧，一面派人驗尸。一看除去身上被石头磨掉了几块皮外，沒有其他迹象証明是工人打死的；随后，給死狗作了一副上等棺材，用白布裹尸；埋葬那天，由陈毛牛亲自主持葬仪，四人抬棺，吹鼓手引路，狗腿子們送殯，陈毛牛涕泗滂沱，哭不成声。安葬已了，又烧了一大堆紙錢。

过几天，又有一条松潘狗失了踪。这可叫陈毛牛发狂了，一面命令管事調查狗的下落，一面亲自帶一班打手，沿河巡視。只見他，头戴巴拿馬帽，架一副黑色眼鏡，身穿对襟大褂，腰悬轉輪手枪，胯下高头大馬，敞开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满脸杀气！走了一趟，也沒寻着他的狗爹。

这时正是八九月間，岷江上到处插起危险的垛子，水急浪大，工人们不愿上去，陈毛牛用手枪逼着说：“你们打死我的松潘狗，还想白拿我的工钱么？给我吊起，为‘来苏’报仇！”

工人们在手枪威胁下，无可奈何地上去了。有的因为又饿又困，一爬上溜索，见到下边波浪滔天，顿时头昏眼花，手一软，掉下河里被大浪吞没了。有的工人撑起竹筏子上垛，刚把棚子砍掉，垛子猛垮下来，把竹筏打烂，工人没个退路，被卡在木头缝里，磨得稀烂。有的被逼上垛子，一时心慌，不敢下手砍棚子，陈毛牛就在岸上喊：“快砍，老子开枪啦！”

喊了两声再不下手砍，叭叭两枪，工人从垛子上滚到河里，鲜血染红了岷江。

我看着工人们痛哭自己的弟兄，心上像刀扎，赵伯伯和万锁好几个夜晚都没有合眼，大綱把牙齿咬得嚓嚓直响，大奎老是低着头，巴达巴达地抽烟。有一回，陈毛牛用手枪逼我上垛子。我心里忽地冒起火来：跟他拚了吧！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

陈毛牛翻身下马，走到我跟前，端详了一会，将手枪一晃：“我以为你是金刚呢，原来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你认得我陈大爷么？”

“你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我怎么不认得你！就是把你烧成灰灰，我也认得你！”

陈毛牛把牙一咬，扳开保险机，枪口对准我：“上去！”

一股巨大的力量涌上全身，我不由自主飞起右脚，踢掉了手枪。几个打手正要动手，赵伯伯、万锁、大綱急忙跑过来把

我护住，周围几十个工人也一拥而上，有的拿起啄竿，槌杠，有的拣石头，横眉怒目地瞪住陈毛牛。赵伯伯笑了一笑，平静地说：“陈先生，要讲打架，我们很在行。枪吓不住我们！以后别来这一套，弟兄们会给你留点面子。”

陈毛牛现出一副尴尬的样子，看着这个，又看看那个，好像今天才第一次认识我们。忽然又把脸一沉，向打手们骂道：“笨蛋！站到整像呀！”随即抡了手枪翻身上马，鞭子一挥，马蹄在沙滩上扬起一片尘土，出去老远，还回头向工人们喊道：“共产党！共产党！你们都是共产党！……”那几个打手一听说共产党，吓得面无人色，赶忙逃跑了。

“草包！……”是谁说了一句，接着爆发出一阵轟笑。

其他的“漂二娃”知道了这消息，更不愿意上垛子了。河里漂不走木头，山上、岩畔上、沙滩上、沟里洼里，到处困的是木材。陈毛牛一气到了成都，我想：这准是去衙门告发共产党啦，不觉好笑，但也担心陈毛牛下毒手，便问赵伯伯，赵伯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孩子，你作得对！天下穷人都要成共产党啦！他才告不赢哩。”见我傻楞楞地看着他，又继续说：“共产党在东北打了大胜仗，几百万军队压下来，东边直压到江苏，西边直压到汉中，快进四川啦，连蒋该死都快完蛋啦，四川的土军阀难道就不怕共产党？他们靠蒋该死靠不住啦，衙门都快关啦，他向谁告？你不要担心，稳起！”

大奎誤中毒蛇計 工人怒打陈毛牛

果然陈毛牛空着手从省城回来。回来就换了一副脸，不

那么神气了。还对工人说什么“这世道要变啦！”“兄弟和大伙一样都是外乡人，混口饭吃，活一天算一天，还分啥子你我呀！”又向工人许愿：“公司赚了钱，年底分红得奖，希望兄弟伙多维持。”遇到危险活路，工人不愿干，就摆起酒肉，连拉带劝。酒肉骗不了，就用钱财，后来甚至把棺材也抬到河边来，作为死后的奖品。

有一次，陈毛牛把我们叫到五花岩去拆一个大垛子。这垛子很长，很高，左岸是树木，右岸是石岩，河下乱石林立，波浪滔天。陈毛牛向工人说：“你们上去吧！奖二斤酒，五斤肉。……机会难得呀！”

工人们望着滔天巨浪，没有答话。

半晌，陈毛牛好像要哭的样子说：“加八尺白布，五块金元券……看在范军长名下……”

陈毛牛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人哼声，最后加到两丈白布，二十块金元券，一口上等棺材，并且叫人把棺材抬到河边，将酒、肉、布、钱都放在棺材上，陈毛牛拿枪对准自己心口说：“现货交易，一言为定，要是哄你们，我陈益奎一家……男盗女娼……你们都喊我龟儿子！”

“我去！”人群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众人都把眼光集中在这人身上，我一看是大奎，惊得呆了，大奎着急地喊：“大哥！你怎么啦？”

我们正要上前去拉住他，陈毛牛向打手使了个眼色，于是这群判官小鬼拥过去，将大奎围住，拉到溜索跟前，用绳子捆住大奎的腰身，绑扎在溜索上（溜索这端被打手们拉着，另一

端拴在对岸的大树上)。赵伯伯一見这情景,急了,将手一挥,我們就跟着跑去拉住溜索,慢慢将大奎放上垛子。人們一个个目瞪口呆,只見大浪像烏云一样,一霎时,天也昏了,地也暗了。

大奎用顫抖的声音喊:“大哥! 稳住点!”

大奎解下腰上别的斧头,把垛子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然后,向岸上比了一个开斧的手势,举起斧子,向綑在垛子面前的一根大木材(綑子)砍去,木材沒有动,大奎停下来了。

陈毛牛見大奎不动,脸色一下变了,原来那副无賴、乞求的面孔換了,露出野兽本性,举起手枪,威胁道:“傅大奎! 你要識相! 我那些錢財不是白舍的,說話算話,再不砍我就开枪啦!”

大奎向岸上看了几眼,似乎下了狠心,举起斧头,一下,两下,綑子喳的一声,这是一个快要砍断的信号。大奎又比了一个手势,用力一砍,只听一阵天崩地塌的声音,垛子垮了,但木材却沒有順水漂下去,它卷起巨大的浪头,向两岸翻滾,闖倒大树,插起新的垛子,把岩石震得嘩嘩的往下飞落。

我們赶快把溜索拉紧,正准备把大奎溜上岸来,猛听得咔嚓一声,頓時眼花手軟,溜索断了,大奎像一只被击中的鳥一般掉进河里,立时被巨浪吞沒了。

原来这是陈毛牛下的毒手。他早已指示打手們,如果下的賭注大,工人又贏得了这笔賭注的話,就趁垛子拆下的时候,割断溜索,害死工人,搶回賭注。这一着,本来是赵伯伯預

先防备了的，但因为山岩地势陡，站不下许多人，打手们又预先拉住了接近河中间的那段溜索，等赵伯伯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人们的心，也好像被砍了一刀，一阵阵的绞痛，眼巴巴看着大浪翻滚，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赵伯伯的嘴唇颤抖着，半晌，才向大家喊了一声：“弟兄们，我来作证，是这些狗养的害了大奎，是他们把溜索割断的！”

我们回头一看，陈毛牛已带着一帮打手走远了。大奎顺手拿起一把斧头，要去追杀陈毛牛，赵伯伯一把拉住说：“你一个人顶什么事？仇是要报的，要大伙商量商量才行呀！”

晚上，我们有十几个弟兄留在傅大奎的家里，一面商量怎样对付陈毛牛，一面劝说大嫂，一夜没睡。嫂子眼睛也哭肿了，好几次要到河边去找大奎的尸体，都被我们挡住。

第二天一早，我们约了附近工棚的工人到账房去找陈毛牛，由赵伯伯领头，半晌，陈毛牛黑丧个脸出来了。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吓得两只眼睛得鸡蛋大。他假装镇静地问道：“你们怎么不上工？来找我干什么？”

赵伯伯大声说：“猪鼻子插葱——装象，你为什么害死傅大奎？”

陈毛牛假装吃惊：“谁害死傅大奎？俗话说：黑老鸹在头上屙泡屎，不死也要死，怎么诬赖起我来？”

赵伯伯指着陈毛牛说：“经理，几十岁的人说话不知羞！我亲眼看见你手下的人拿刀子割断溜索，还想赖过去？”

“捉賊要捉贓，拿証据来！”

大綱指着一个人身穿軍服，滿脸灰气的大烟兵喊道：“就是他！就是他！捉住，不讓他跑！”

这兵見势头不好，一溜烟跑掉了。

頓时响起了一片怒吼声：

“黑心肺！过河拆桥，砍倒綑子謀害人命！”

“你这断子絕孙的老王八，偿命来！”

“对，要他偿命！”

工人们揮舞着拳头包围上来，陈毛牛看了看四周，打手們一个个都跑光了，又看看屋里，打算躲进賬房，刚一迈步，赵伯伯冲上去挡住房門，說道：“你想溜呀？……”

陈毛牛急忙賠笑脸說：“确实不是兄弟害死的，你們要我做什么呢？”

“你說不是你害死的，你敢把凶手抓回来审問么？”

“敢……敢敢。”

“好，你叫人馬上把凶手押起来！……”

人群中有人喊：

“先要他交出撫恤金来！”

“对！两百个硬洋！棺材，衣服，烧埋費，样样备齐！”

“叫他馬上答应！”

陈毛牛双眉一皺，眼睛一眨，馬上又裝出笑脸道：“好，兄弟都答应……”

“口說无凭，写张紙約来！”

“赵大哥，看住他写！大綱，你也跟去！”

人群里一阵骚动，向两旁闪开，让出一条路子，只见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颤巍巍地走上前来。正是傅大嫂。她瞪起一双大眼睛，指着陈毛牛骂道：“你这个男盗女娼的龟儿子，你害的我好苦呵……”

是什么东西梗住了她的咽喉，说不下去了，身子无力地倒下去，大綱和万鎖急忙把她扶住。

“大嫂！你痛痛快快地骂吧！”

“把你心上的气都出了吧，有我们报仇！”

大嫂挣开身边的人，上前两步，猛地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菜刀，对准陈毛牛的脑袋掷去，陈毛牛把头一偏，当的一声，刀口嵌进板墙上，吓得陈毛牛脸色煞白，大嫂楞了一阵，忽然用手捂住脸，放声痛哭起来：“苦命的人呵！……你等等……我就来了……弟兄们、叔伯大爷们，给我报仇呵！……”

“打这龟儿子……”

人们被大嫂的哭声激动起来了，一声呐喊，大綱和万鎖上前扭住陈毛牛，顿时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他的头上、身上，血从鼻孔里耳朵里渗出来，正在这时候，忽然一个工人惊叫道：“快！大嫂投河啦！”

这一喊把大家怔住了，我们丢下陈毛牛，飞快向河边奔去，但是迟了，大嫂已经被激流卷了进去，只看见飘散在水面上的头发，随后猛的往下一沉，在水面上激起几点黄色的泡沫来。

大恶霸搬兵紫坪铺 众英雄夜走岷江滩

我们从河边回到账房来，陈毛牛已经不见了，大门紧紧闭

着，打了半天，也沒人理睬，大綱气得滿臉通紅，拿起斧子就往門上劈，震得板牆嘩嘩直抖。

“陈毛牛，你装狗啦，快爬出来！”

“再不出来，放火烧棚子啦！”

門砰一声倒了，陈毛牛的管事从床底下爬出来，他的舵把子威风完全沒有了，滿身尘土，臉色蒼白，两腿打顫說：“大爷們！大叔們！陈經……理早跑啦……不信进来看……看。”

“搜！”

十几个弟兄，一拥而入，搜遍了賬房的每个角落，夹壁板牆，大柜子，連地板也撬开了，沒有陈毛牛的影子。

“陈毛牛鑽到哪里了？老实說，饒你狗命！”

“兄弟实……实在不……知……大概是到……医院……去啦。”

拍拍两个耳光，管事双膝跪下，接連叩头說：“大爷們，說出来經理要枪毙我呀！”

“你怕經理的枪，就不怕我們的拳头么！快說！”

“是，……是是，我說，經理……騎馬去紫坪鋪搬保安队啦……还有王秃子、賈二麻子……他們去古尔沟、龙洞子調手枪队，赶天黑就到这里啦！……”

“陈毛牛对你說些啥？”

“經……理叫我守住倉庫，監視你們的行動，……还說，队伍在……四面撒下个大网子，要叫你們一个也……跑不脫，……饒我这条狗命吧，大爷們！”

管事又接連在地下叩头。

背水的工人，做飯的廚師都証實了管事的口供，頓時大家心里亂了，一个个又悔又恨。趙伯伯叫人把管事捆起来，鎖在賬房里，招呼大家回到工棚去，他像一个指揮官似的，站在高处，双眉微微一皺，向大家說道：“弟兄們！剛才是我大意，叫陈毛牛鑽空子跑了！他挨了打，气不过，要搬兵来报复我們。东边的古尔沟伐区，西边的龙洞子伐区，合起能搬来六七十条枪，南边紫坪鋪的保安队，少說也有百十条枪，来回七八十里，晚上就要到这里。他們把四面都包围起来了，当中只剩一条岷江河，大伙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一帮子土匪？……”

大家沉默着，大綱喊道：“跟他們拚！拚死一个够本錢，拚死两个賺一个！”

他一开头，大家也嚷开了。

“人家近二百条枪，你拿啥拚？”

“不拚等人家捉活的么？”

“朝北面跑，北面沒队伍。”

最后，一个老工人說：“赵大哥，你說怎么办吧，我們听你的。”

趙伯伯說：“弟兄們！陈毛牛这回起心狠毒，来势很凶，硬拚是拚不贏的。按我的意思，先打开粮食倉庫，讓弟兄們分个精光，吃个痛快。吃完远走高飞。陈毛牛走旱路，我們走水路，大路朝天凭人走，冤家对面不相逢……不要吵，听我說完呀。我們里头少說也有几十个招把手（撑筏子的），老孟，老秦，老周……都是好汉，今天就看你們关火啦！……”

“好呀！”人群里一陣欢呼。

“河滩里摆的是木头，馬上吊綫(綁扎筏子)还来得及，弟兄們，我們来个水軍大鬧岷江河吧……”

又是一陣欢呼。是誰插嘴道：“鉄牛子，你可不要学那黑旋风，入到水里就变成泥菩薩啦！”众人大笑。那个名叫鉄牛子的站起来說：“赵大哥！虽說有招把手，也得提防保安队在河坎上打枪。”

一个工人插嘴說：“胆小鬼！筏子比人跑得快，你怕啥？”

“枪子比筏子跑得更快呀！”

“不要那么說，枪子自己又沒有腿杆子……”

“你們尽嚷什么！有我就有你們，筏子两边綁上大木头，人睡在中間，舒舒服服地梦你老婆去吧。”說这話的正是滿臉絡腮胡子的老筏工孟昌平。

“就怕筏子翻身，老婆沒梦见，倒变成个水鬼！”

“多綁些救命扣，你怕啥！”

赵伯伯招呼大家靜下来：“好啦！弟兄們，干起来吧！老孟，由你指揮吧，多少人？多少筏子？多少時間綁扎好？留下的人跟万鎖、小黃去倉庫搬东西，分粮食，做飯……弟兄們，今天在路不許乱吵嚷，碰到保安队的大烟兵，沉住气，不要怕，不要乱答腔，过麻好滩、观音岩、盐井滩……不要心慌，要听招把手指揮……”

赵伯伯說完，大家都忙起来。一切都进行得有条有理。担任分粮的弟兄，打开倉庫，見到白花花的米面、猪肉、蔬菜，高兴得流出眼泪来，将米面捧在手心里，看了又看，聞了又聞，这是我們流血流汗换来的呵，但是全給老板們占用了，我們都

終年吃臭包谷。

天一黑，岷江上喧囂起來。有的背着個大背篋，里边裝滿破被子之類雜七雜八的東西，有的已經走到河邊，又返回倉庫和賬房取他自己需要的家具，什麼口袋呀，鍋呀，斧子呀，甚至一把飯勺也舍不得丟掉；直到把一切零碎雜物都搬盡之後，才搬些干柴堆在板房周圍，點起火來。干柴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音，火舌歡快地舐着板壁，竄進門窗，爬上屋頂；我們一邊向河邊走，一邊回頭看火光，隱約還听得見賬房里發出呼救的聲音，原來陳毛牛的管事還捆綁在屋子里，我們完全把他忘記了。

這是一個月黑夜，江面上黑影幢幢，幾十張木筏順流而下，好像一列出征的戰船，浪花拍打在筏頭上，發出清脆的响声，偶而一個大浪頭撲過來，筏子顛簸了一下，接着又恢復了平衡。

我們究竟到哪里去？連趙伯伯在內，誰也不清楚，但是誰都明白只有一個目的：很快趕過紫坪鋪，衝出包圍圈。大家都屏住呼吸，望着山下漸漸離遠的火光，沒有一個人說話，只聽到浪拍筏子的聲音。

我和趙伯伯坐在最前面一張筏子上，他眯縫着兩眼，時而望望前方，望望兩岸，時而又回頭看看趕上來的筏子；我們這張筏子的招把手正是老孟，他站在筏頭，像一尊神像，兩眼不眨地注視前方，兩只粗大的胳膊扶着前梢，暗中，我仿佛看見他的鬍鬚在微風中顫動。

忽然一道亮光從左岸掃過江面。



“手电！”是誰喊了一声。

这一喊不打紧，两岸几十道光柱同时落到江面上，闪闪灼灼，江上突然紧张起来，有人在扳动枪机。“你们是哪里来的？”听出是陈毛牛的声音，赵伯伯沉着地回答：“松太的。”

“誰他媽的叫你們半夜赶筏子？”

“你他媽的管不着！”

陈毛牛好像忽然醒悟过来：“就是他們！快打枪呀！他們把我的木头偷走啦！”

叭！叭！叭！密集的子彈横扫过来，有的打在水里，有的打在筏子上，有的从头顶上飞过，发出嗤嗤的声音。忽然后面卜通一声，一个弟兄中彈掉进河里了，赵伯伯喊：“趴下！弟兄們，沉住气呀，莫大意呀！”

保安队一边打枪，一边追赶筏子，陈毛牛一边哭叫。

老孟屹立在筏头上，巍然不动。筏子跑得很快，在激流上一浪一浪地赶过去，子彈先还在头顶上乱飞，随后逐渐稀落，

终于停止了。赵伯伯喘口气，后面筏子上人声嘈杂起来：

“真险呀，差点打中我脑门心！”

“保安队都是些草包，子弹离头上还远着哩！”

“哼！要是我手头有支枪，准把陈毛牛打下河来！”

“铁牛子！吓昏了吧？怎么不说话？”

“你不见张大哥落水了么？都怪我，一把没拉住，唉……”

“怪他自己不听命令，谁叫他不趴下呀！”

大家说说吵吵，有的把身上湿衣服脱下来拧水，有的在低声埋怨洋火被水打湿，点不着烟。

“注意啦！”赵伯伯喊了一声。

一看见左岸逐渐靠近的灯光，才知道已经到了紫坪铺，大家静下来，趴在筏子上。赵伯伯和老孟并立在筏头，准备应付岸上突然的盘问。

但谁也没有注意江上的动静，筏子顺利通过了紫坪铺。

翻天覆地人民当家作主 阳光普照黄志重上青山

我记不清楚，当时是怎样冲过那些急流险滩的，但许多印象，直到现在还深深留在脑子里：赵伯伯始终屹立在筏头上指挥大家前进，老孟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领着筏子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浪头，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后面有的筏子被急流卷进漩涡里打烂了，万锁和大纲不顾一切地跳进水去，把弟兄们救起来。筏子好像离弦的箭，直泻而下，只见两岸岩石的阴影从身后飞一般抢过去。弟兄们的衣服全湿透了，一直到了万寿场，才觉得又冷又累。我们上了岸，在河边燃起一堆一

堆的篝火，我一躺下就睡着了，朦朧中，仿佛聽見趙伯伯的講話聲和弟兄們的說笑聲。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身邊只有趙伯伯和萬鎖。他們告訴我，弟兄們都離散了，有的回了家，有的投奔親戚，有的去四鄉找活路做。趙伯伯說：“我和萬鎖商量好啦，找紅軍去！”

我半天說不出話，趙伯伯看出了我的心事，撫着我的頭說：“小黃，你媽眼都望穿啦！該回家去看看，我們找到紅軍就寫信給你，好不好？”

說實話，我真想一下飛到媽媽身邊去，飛到弟妹身邊去，但又舍不得離開趙伯伯和萬鎖呵。

我們在棧房裏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他們送我翻過一個小山才分手，當我回過頭來再看不見他們身影的時候，心里一酸，眼淚直涌上來。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離開了趙伯伯和弟兄們，就好像離群的孤雁，失散的羔羊。我坐在路邊傷心地痛哭，直到一個過路的陌生人，好奇地停下來問我，才強打起精神，一步一回頭地朝我的家鄉走去。

* * *

快到家那一天，為了躲避保長們的注意，我等到天黑才進村子。五年了，一切都沒有變，兩間破茅草房，大路邊上的黃桷樹，……只是媽更見蒼老了，臉上的皺紋增多了，頭髮灰白了，弟弟已經十五歲，妹妹還不到十歲，她不認得我，有些害羞。

想起死去的爹，我們痛哭了一個晚上。媽告訴我，兩年前有人來問過我的下落。從那以後，保長經常來催壯丁款子，加上地主逼債要租，逼得媽好幾次想上吊，但一看見弟弟妹妹，

想起爹爹和我，又不忍心死去，只得硬着头皮活下来。

我回到了家，不敢出門；一到晚上，媽就叫我去舅舅家躲起来。舅舅家离这里只有七八里，来回都很方便，有时媽到舅舅家来看我，有时我又偷偷回家住一个晚上，这样躲躲藏藏地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心里真憋得慌。

听到紅軍要来的傳説，穷人們暗暗高兴，都想：“紅軍快点来就好啦！歪人該落馬啦！”保长們、地主們、舵把子們，吓得昏头轉向，赶紧收买地痞流氓，組織“民团”，把乡公所守得严严实实的。这些“民团”，借口防共軍，查戶口，催粮款，成群結伙，到处奸淫搶夺，攔路搶劫，鬧得家家鸡飞狗跳，人人提心吊胆，赶場的，走亲戚的，中午一过，就早早回家，閉門不出，鎮子上，大路边，看不到人影，听不見狗叫。

年关一过，粮款逼得更紧，許多穷苦佃农出不起粮，房子被民团一把火烧了，人赶到“叫化营”（叫化子集中住的地方）里，但是，住在“叫化营”也要出“化子捐”、“地基錢”，討不着吃的，就到处找观音土，搬“芭蕉脑壳”，掏沙茵吃，有的中毒死去，有的得臃胀病死去，田地荒蕪，餓尸遍野，狗吃多了死人肉，眼睛也发紅了，大白天看見活人也乱扑乱咬。

地主們、土豪們、奸商們，趁机大发橫財，将仓里屯积的粮食高价出卖，住在城里的地主官僚，一个个像丧家狗一样溜到乡下来。一时草木皆兵。地主、保长們天天躲在乡公所里，打电话，派狗腿子进城里探听消息，发现一张共产党的传单、标語，就把乡公所的大門一鎖，跟着民团鑽进古坟里藏起来。

这些日子，我認識了一个在鎮上小学当教員的本家弟兄，

叫黃柏青(他早年在城里讀書,來往不多),他經常到家里來找我,向我講共產黨的主張和當前的形勢,並且要我多和窮鄉親聯絡,打聽惡霸地主們的動靜,每隔兩三天,我就去鎮上向他報告。我猜他一定是共產黨,但每次問他,他都笑着用別的話支吾過去。來往久了,我們村的舵把子地主黃子恆(外號鉄算盤)犯了疑心,一次,鉄算盤很客气地問我:“侄兒,鎮上你認識誰呀?你要借糧不要向外人借,我家里有,都是自家叔侄,不說借個三二斗,就是欠那石把租子也好說。……”我沒有理他,心想,這家伙過去見到窮人,看也不看一眼,吐口唾沫就過去了,今天對我這樣客气,一定不懷好意;我把這話告訴黃柏青,柏青說:“共產黨快進縣城啦,他怕敲沙罐哩。”

一九四九年冬天,一個晚上,黃柏青忽然和李二叔到我家來,叫我快走。我們跑到附近一個山上,爬上一株大黃桷樹,向西北方一看,只見到處是火光,隱約還聽到槍聲,一會,鎮子上也起了火,原來是民團、惡霸、土豪們干的事,他們一聽說解放軍進了縣城,就到處逮捕共產黨員,殺窮人,燒房子,準備把槍拖上山去。黃柏青說:“看樣子,解放軍明后天就到這裡啦!”

第二天,我們去鎮上一看,鄉公所大門緊閉,平時抖威風擺架勢的惡霸地主們,像烏龜一樣縮着腦袋,不敢出家門一步。黃柏青從學校里拿出一大捆標語、傳單、小旗子,分給我們到回鄉去張貼散發。窮人們一個個露出了笑臉,年青人穿上干淨衣服,一會忙着燒開水,一會忙着搬鋪草,孩子們拿着旗子,跳呀、鬧呀,像過年一樣,老太婆們也拄着棍子出來觀望。

中午，解放軍果然來了。都是年青小伙子，頭戴鋼盔，身背三八式，滿面紅光，精神抖擻，一直過了整個下午，到天黑的時候，才有一部分駐在鎮子上，第二天一早又走了。

人們談論着，這個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隊伍，燒柴喝水還要給錢。”那個說：“我活了七十七歲，第一次聽到當兵的叫我聲老大爺。”孩子們唱着才學會的歌子，年青人心里痒痒的，想參加解放軍。

黃柏青整天忙得飯也顧不上吃。他已經搬到鄉公所住，把原來的牌子也摘掉了。

過幾天，鎮子上來了工作組，一律穿藍布衣服，背短槍，還有個女幹部。當天晚上，柏青就把我叫到鄉公所去開“減租反霸”的醞釀會。我一看，來的人都是窮佃戶，有李二叔、黃大嬪、何三叔，……還有工作組的同志們。

柏青給我們作了介紹。工作組的王組長向大家講話，他像擺龍門陣一樣，有說有笑，問這問那，他還好幾次提到我，看來柏青早已把我的情況向工作組談了。開完會，王組長還特別跟我握手，稱我是工人階級的好兒子，鼓勵我在減租反霸中積極帶頭，末了，還問我：“趙壽廷來信沒有？找到紅軍沒有？”

從此，我成了鄉上的積極分子，白天晚上，登記田畝，動員群眾，監視地主。過幾天，一個翻天覆地的萬人公審大會在鎮上召開了。台子前，面向群眾跪着一溜罪犯：有殺人放火血債累累的土匪頭子陳金魁，有多次強姦婦女、霸占田地的惡霸地主陳玉魁，有勾結土匪暗殺共產黨員的保長何紹清，也有鉄算

盘黄子恆……他們有的是逃进山里被解放軍捉住的，有的是藏在古坟里，被群众搜出来的。台上設有死难烈士的灵位，当受难群众控訴种种慘絕人寰的遭遇，泣不成声时，台下群众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男人們拿着石头木棒，女人們拿着剪刀，一拥而上，公安队的同志好不容易才挡住他們。

地主阶级的威风彻底打垮了，村里村外，到处洋溢着欢乐和幸福。减租退押的斗争很快就结束了。

经过这次斗争，李二叔被选举为农会主席，我被选为农会委员兼民兵队长。工作组走了，黄柏青调到区上了。乡政府的职权全部交给农会代管，农村的大小事情都要处理，整整忙了大半年，区上又来通知：要进行土改。农民們一听说，都高兴的唱起来：“乐至来了共产党，地主恶霸一扫光，夺回了田地，夺回了财产和牛羊，白沙滩上开了花，荒坡旱地谷子黄，草房换成新瓦房，泥巴腿翻身当乡长。”

一天，黄柏青突然从区上来，笑咪咪地递一封信给我，说是山里来的同志捎给我的，我急忙拆开看，上面写着：

黄志同志：想你在乡下工作一定很忙吧。那年分别以后，我和赵伯伯在江油一带流浪了大半年，后来听说全国要解放，赵伯伯就回大邑去了。最近来信说：他们乡里清匪反霸，闹得翻天覆地，大仇也报了，他还当了农会主席哩。

你知道，我自小就没家，赵伯伯走后，我又到理县去找活路。一天，我正在街上走，忽然有人叫我，你猜是谁？

原来是张大成呀。他在信成公木厂当杂工，說自你走后不几天，工人和附近的藏族同胞都反啦，吓得毕干成和邓相廷鑽在夹壁板墙里，不敢出来。以后人都散了，他才进了信成公木厂。他劝我去，我就去了。临解放的时候，木厂垮了台，我們又流浪了一个冬天，直到成立人民的川西伐木公司，我們才算見了太阳。

川西伐木公司的领导人就是解放军的曹营长，对工人就像自家弟兄一般，称呼我們同志，吃穿都和工人一样。生活比过去好多啦。曹营长要我們把老工人都找来参加建設，开辟新林区，将来还要成立森林工业局哩。小黃，你也来吧，我們在一起，亲手把林区建設成大花园，該多美呀！……

王万鎖

1951.12.23

我看完信，仿佛又回到过去的年代了，半天沒有說話，黃柏青以为我留恋家乡，問我：“怎么样？不想去了吧？”

“你的意見呢？你看，这里摆着一大摊……”

“快进行土改了，工作倒是多，不过，山里工作也重要，国家才解放，要建設，要木材……伐木公司派干部向政府要工人，政府还能打埋伏么？你去吧。家里的事你不要担心，有政府、农会照管……”

元旦以后，一个早上，我从家里动身了。这次和十一年前可不一样，媽虽說舍不得我走，但很放心，特別給我准备了两

身换洗衣服,一床被子(这是胜利果实呵),两双新布鞋,高高兴兴地送我到五里桥。妹妹牵着我的衣服,说:“哥哥!当了劳动英雄,戴了红花,把像片喜报寄回来呀!”说得妈妈也笑了。

东山头上朝霞灿烂,一轮红日升起,我整了整背包,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敞开胸怀,迈开大步,迎着阳光走去。

四川省林业厅森林报记者集体整理

姚冶华插图

煤海恩仇

淮南煤矿謝家集三矿 赵揚全

离了虎穴,又入狼窝

不提过去,倒还罢了,提起过去,真是黄连树上挂猪胆,根苦,梢苦,全是苦。小时候听老人讲,我祖上是从山东逃荒到安徽蒙城来的,爷爷是个乡下的老实农民,就是别人骑在他脖子上,也不敢大声吭气。爹打了一辈子长工,年老被地主赶出来,得了伤寒症,不久便死去了。

因为家境一贫如洗,我十一二岁就给地主高来桥帮工。外人都喊他笑面狼,等我稍微长大一点,便给笑面狼扛二活。年幼身体单薄,担水压得脖子肿,锄地累得腰儿痛。一年苦到头,落个黄皮包骨头,衣没衣,被没被。十八岁那年,我讨了老婆。不知磕了多少头,笑面狼才把我老婆也收留下。一年之后,老婆肚子渐渐大了,娶妻生子,添丁增口,在富人家来说是个大喜事,可是我们小夫妻俩倒为此发愁。可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天晚上,老婆正在为地主推磨,孩子生下了。腊月里,孩子生下地,连一块遮体的布也没有。第二天,天快黑啦,

笑面狼把我喊去，他冷冷地笑了笑說：“恭喜你，老赵呀，不知你媳妇养的是个烧鍋的，还是个放牛的？”

“老爷，是个放牛的。”

笑面狼又笑了笑說：“如今年岁凶荒，我們这小戶人家养活不了閑人，明天叫你媳妇回去吧。”

我听了这些話，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忙求道：“老爷你行行善吧！讓她母子滿了月再走。我家連个草庵子也沒有，叫她母子在野地里打伞嗎？”

笑面狼脸一翻，說：“哼，你也不想想，我們書香門第，哪能用臭娘們，明天就給我滾！”

我是个紅脸汉子，便說道：“俺赵揚全人穷志不穷。走就走。”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我們离开了高家。

呼呼的北风，专门和我們穷人作对。风刀霜剑，削刮着我們，老婆嗚嗚咽咽抽泣。俺一无亲，二无故，往哪里投奔呢。就在祭灶的这天晚上，我們投宿到破庙里。小孩子冻得哇哇乱哭。老婆对我說：“风这么大，看样子风要討雪。”我强打精神安慰老婆說：“咱祖上沒干亏心事，闖过难关有明年。”为了吃飯，我們后来又給伪乡长赵兴仁干活。这可真是离了虎穴，又入狼窩。白天老婆四乡討飯，夜晚她母子就宿在赵兴仁的山芋窖里。老婆成天价愁眉苦脸，孩子餓得面黄肌瘦，那种油煎的日子，挨一天像一年。

我二十五岁那年，天旱，庄稼不收。为了活下去，与老婆商議，把三儿子卖給人家，換了二斗芒大麦。这年是荒春，老婆又生了孩子，家里穷得連刮痧的錢也沒有。又忍心将大女

儿小英，二女儿米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亲骨亲肉就这样活活地被拆散了。青黄不接，采榆树叶剥榆树皮吃。树叶树皮吃光了，老婆饿急了，吃了几十斤观音土，折磨得黄皮寡瘦，险些送掉性命。就这样死死活活，总算从刀山上把荒春滚过来。

又过了两年，三个孩子(卖掉的一个儿子和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的两个女儿在外)渐渐能拿动讨饭棍了，我们的累赘也轻了一点儿。老婆帮人家补补连连，洗洗浆浆，吃人家的残茶剩饭，一年也能塞饱三个月肚子。逢上收割季节，老婆带着孩子们到地里拾点庄稼，倒也不错。谁知祸星又照到我们头上。这年秋天，老婆拾了二斗多黄豆，拣了二百斤红芋。赵兴仁有些眼红，说孩子妈偷了他地里庄稼。赵兴仁那老狗提着根枣木棍子，一声没吭，朝我老婆身上就打。老婆被打得满地乱滚，急得一头跳到沟里寻死。那老狗还用棍子狠狠地把她往水里捣。眼看就要被溺死，我豁上饭碗不要，跑到老狗面前说：“别说她没有偷你家庄稼，就是偷了，你可以送官治罪，她一个妇道人家，你打坏了咋说。”那老狗仰仗着他有钱有势，冷笑道：“哼，打死你老婆，算我睡觉压死个臭虫。这庄子全是赵家的地，你给我卷卷狗皮行李滚蛋！”红脸汉子，哪能受他们欺侮，一赌气便离开了赵家。

四路无门把炭掏

一天，夜深了。我们全家五口人，饿着肚子，晃晃荡荡歪倒在蒙城县一家旅馆的房檐下。我一颗心又痛又乱，迟疑地

想着以后的生活。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見滿臉皺紋、皮色焦黃的老婆，歪在一張破狗皮上，眼淚橫流，正在偷哭。見此光景不覺一陣辛酸，我仰臉向天望去，天，低低的，陰沉黑暗。大孩子睡着了；二孩子正在一粒一粒地嚼着鹽豆子；可憐的小孩子睡在他媽媽懷里，死不放手地啃着她那干癟的奶頭。一家人正在愁苦，忽然一陣皮鞋聲由遠處傳來，旅館門前的照市燈一下子亮起來。一個穿長袍的中年人走近我們，瞪着一雙蠅子見血的眼，只對我身上瞅。我趕忙把頭低下，二孩子嚇得一頭扎到我懷里來。那個穿長袍的人端詳了我半天說道：“去干工怎麼樣？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趙揚全，本縣人。不知到哪裡干工？”

這時從旅館里走出一個茶房，急忙插嘴說道：“啊呀呀，你這人算走了好運啦，他老人家就是淮南窯上的喬廣德，經常收留難民百姓到窯上掏炭。”

喬廣德擺手打斷了茶房的話：“跟我去干工，一天二斤半好面，每月還根據下井的班數，發給一筆零花錢。”

“煤窯是怎麼樣的，去干什么活，我行嗎？”

“煤窯呀，就是挖煤的煤山，下井坐電梯，干活穿六個鼻的大皮靴，推四個轆轤小電車，活可輕呀，想推就推，不想推，用棍子一打就自个跑了。井底下一年四季如春，寒冬不用穿棉衣，春秋又能省夾衣，風刮不着，雨淋不着，日曬不着。”

“老爺，給我補個名字行嗎？”

老婆也眼巴巴的盼望我能找個事做，忙放下懷里的孩子，站起來夸口說：“他是個鄉下人，沒見過大世面，寡言少語的，

就是有气力，三頓飽飯一吃，干活頂頭牛用。”

“好吧，我就救救你們吧，后天一大早在旅館門前集合，我帶你們走。來遲了，我喬某有公事在身，概不等候。”說完話，走進了旅館。

这天晚上，我比結婚那天還高興。老婆夸我找了個好差事，孩子們也都有了喜色，一家人興奮得一夜沒合眼。

我們一群几十个難民百姓，東歪西倒的在路上晃蕩了三天趕到了蚌埠碼頭，搭上火車來到了淮南九龍崗煤窑。下車后，我們被礦警像趕羊似的趕到窑戶村住下。這時走過來几个穿長袍的先生，來恭喜喬廣德：“這次發財，啊呀，喬兄生財有道，小弟要討杯發財酒喝。”我們都感到莫名其妙。接着“老虎系”（勞務系，當時專門管工人的，他們比老虎還狠，大家都喊“老虎系”）來了一個先生，給我們訓話：“這個村叫做窑戶村，既然大家願意下窑，兄弟代表煤師表示歡迎。當工人就得規規矩矩，安分守己。白天黑夜你們要住在这里邊，為了大家財產人身安全，周圍電网上都放有電，挨着電网就要電死。”說着他用手指着東面二十多丈遠的地方叫大家看，一個窑戶的屍體躺在電网上。一只惡狗，伸着舌頭，在那里守着屍。大家都把頭低下，不忍心再看第二眼。

我們几十人擠在一排東倒西歪的草房里，地上水汪汪的，囊衣草長得挺肥。几条破席子鋪在地上，囊衣草鑽通席子直挺挺站立起來。我們就睡在地上。當天晚上大家餓了一頓。第二天借來的米面又霉又黑。我們一群餓漢，狼吞虎咽，吃了一個飽。大家剛吃罷飯，喬廣德又來“拜訪”大家，厲聲地說：

“大家都吃飽了吧，我現在提醒大家一句，既來之，則安之。你們借的糧也吃了，明天統統下窑干活。”

煤海血泪

天還沒亮，碴頭提着棍子來“拜訪”我們，推推拉拉把我們趕到礦門口。碴頭低頭哈腰地向站崗的說話。一個礦警荷槍實彈挨排搜了一遍身，才准我們進礦。先到礦燈房領油燈，又扔給每人一個黑布帽和一雙草鞋。下井前先在井口排好隊，又被礦狗子搜了一遍身，從一個姓張的工人身上搜出一支洋烟，礦狗子哇哇怪叫，說他違犯礦規，揚鞭便打，威逼他把烟吞到肚里。在井下我們跟着碴頭屁股後面，昏頭昏腦地爬了許多巷道，最後來到了一個地方，碴頭指着一個小眼說：我們這個礦，是急傾斜立槽煤，到窩里去，要爬四五十米的人行眼，眼內有根棕繩，順着繩子下去後，再爬十多米就到了干活地點。爬眼時雙手要抓緊繩子，有言在先，掉下去摔死，櫃上概不負責，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听了心直跳，恰巧，這天派我去推車，在運輸路上干活。當我放第四車煤時，從眼內竄下黑乎乎的一根柱子。我急忙把老虎嘴子关上，伸手一拖，卻是一條血肉模糊的人腿，吓得我頭皮發麻。正在為難時，忽然燈光閃閃，一陣笑聲傳來，幾個監工的掄起皮鞭打得我東躲西藏。這時喬廣德走到我面前端詳一會：“好啊，原來是你呀，領了糧下井不干活，真沒有良心，該打。”

“我推了三車炭，誰說沒干活？”

“窮鬼，混蛋，我看你還嘴硬！”喬善人揚手叭叭打了我兩

个耳光子。

“煤眼内放出一条人腿，我害怕。”

“害怕，就不要下井，怕死别托生猪。”一个监工加油添醋地说道。

“是乔广德骗来的……”那东西见我揭他的丑，突然阴森着脸，举起棍子朝我劈头盖脸打下来。

在淮南九龙岗窑上有一大半工人，都是这样被骗进矿的。在阴森腥臭的矿井下，根本没有什么安全设备，连起码的通风设施也没有，闷得人透不过来气。一次我在五号风井干活被瓦斯（煤气）熏死在洞子里，无人过问。幸亏被一位运输工人发现，把我拉到明风口救活了。上井后，我向老婆说了这件事情，她哭着叫我回去，其实身入了虎穴，行动已不由己了。

我在老十三槽二道半用穿枪捣煤时，又险些死在里边。这个地点煤质很好，资本家做梦也想着这块煤。碴头王白眼为了讨主子的喜欢，逼着我到里边干活。我一看大顶放了线（冒顶的预兆）来了压力，便求道：“王碴头，今天我身子不好，不能到里边干活，这个班钱算给碴头效劳啦。”他不问青红皂白，抡起皮鞭抽我。我刚往里边一鑽，伸枪捣炭，突然大顶冒落下来。我闪过来靠住一架棚子才算幸免砸死。

后来我又被派到西小井老十三槽干活。一天洞子里突然着了火，满巷道都是烟火，火顺风势，逼得人无路可逃。我当时便脸朝下用帽子捂着脸躺在水沟里，衣服全着了火，脊梁被烧热了。矿上矿师老爷们一听井下发火，怕火区蔓延，立刻命令把洞子封闭上。我连忙挣扎着从火区里爬出来，又被煤气

熏昏在里边，心如明鏡，就是不能說話。后来被卫生工(专门抬死人的)把我扔到小南山万人坑里，老婆得了信，哭哭啼啼到万人坑来認尸首。因为我到地面喝了明风，渐渐地清醒过来，他母子們才把我从万人坑里抬回去。



这次我总算虎口余生，侥幸活了过来。事后我們算算这笔血债，一共死了七十多人，当时好几个阶级兄弟沒有烧死，还在呻吟，便活活地被资本家用瓦石封閉在火区里。在旧社会，煤矿工人生命沒有一点保障，九龙崗矿西小井万人坑，填满了矿工的尸首。一九四三年矿山流行一种瘟疫病。我們把它叫做害“大家病”(家家都害病)，这种病非常可怕，传染得

很厉害，得了这种病，发高烧，不断抽筋，最后淌一滩血就死去了。矿工们怕把病传给他们，派出大批矿狗子到处搜病人，不论死没死，全都抬到万人坑里去。那一年江南来了六百六十人，在这次流行病中死得只剩下现在在谢一矿干工的王金田了，人们都喊他六百六。大通矿有个名字叫二百二的工人，也是因为从河南开封府来到大通矿干工的二百零二名工人在这次流行病中死去二百零一人，弟兄们为了纪念死去的阶级兄弟才喊他“二百二”。咱矿上的张志成同志，在这次瘟疫中被矿狗子抬到了万人坑，在那里躺了三天两夜，恶狗去吞吃他，他尖叫一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看着周围全是尸体，挣扎着爬到水沟边，喝了几口泥浆子水，又活过来了。

支撑着活下去

日本小鬼在淮南八年，工人们生活更苦了。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句话年轻人体会不深，为什么说不如牛马呢？耕地用的牛，给东家耕了一天地晚上还能得顿饱草，有牛棚住；在井下拉煤车的马每天只干八小时，能吃上五斤半黄豆，在井下还有马号房，在地面盖有洋房似的马棚，还有专人侍候，马病了，有马倌为它看病。工人呢，每天在井下干十六个小时，出的是牛马力，不但吃不饱，而且铺地盖天没有房，赤身光腩没衣裳，伤风头痛无人问，死了便扔到万人坑里去。那时我家五口人在矿上，每月我上五十九个班还挣不上吃的，老婆孩子四处讨饭，孩子十四、五岁还光着腩。我和老伴合穿一

条裤子，我下井她就睡在家里，我上井后，她再穿上裤子领着孩子去讨饭。后来我们省吃俭用，三年没尝油，节省一点钱，裁了七尺白纱布（做蚊帐用的布）给老婆缝了一条裤子，老婆有了裤子穿，就可以干活了，其实这条裤子连羞丑也遮不住。她每天，天不明到山上拾柴，直到天昏地黑才敢回家。一九四四年冬天，大雪封山，家里吃烧全无。一次我从矿里下班回来，在路上拣了两块炭，夹在胳膊窝里。那个时候“检身”很严，每天工人出进矿门要排九次队检身，这两块炭被鬼子搜查出来了。他又骂又打又踢，我不服气，想还手，几个小鬼子端着刺刀上来，把我绑到亡命柱子上，用皮鞭抽我，一个日本军官，瞪着猙獰的大眼，活像恶鬼一样，牵着一条狼狗走来。这一切情况告诉我，鬼子们要放狼狗吃我。我不觉流下泪来，想起了老伴和几个没成年的孩子，我要死了，他母子们讨饭连个挑担子的人也没有。几个鬼子哇哇一阵子，元田牵着狼狗跑上来，我怒目瞪着他们，心想：中国工人要有骨气，死要死得硬气。那条狼狗就像撒了欢的野马，冲我扑上来，一口咬住左腿，撕了手掌大一块肉下来，当时我就昏迷过去。

当我在模糊中醒来时，屋内挤满了弟兄们。老伴和孩子们正围在我身旁哭喊，我才知道自己还没有死。我对大家说道：“你们放心吧，我要支撑着活下去。”

換湯沒換藥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工人们敲锣打鼓迎接这个胜利的日子。我心里想，这回工人就能过好日子了。

誰知国民党和鬼子一样，都是豺狼。汉奸队摇身一变成了矿警队，原来的把头汉奸，照样騎在工人头上。工人们上班进矿，得排很长的队，他們像对待犯人一样，一个一个地对相片，驗明正身，才准进矿。出矿照旧得解衣检身。井下安全設備仍然沒有，天天死人。那时离矿門不远有个停尸房。工人死了不准家属进矿看一眼，每天总有几个妇女在那里哭泣。工人们把矿門叫做地獄門。粮价飞涨，工人干一班活，还掙不到二斤米。工人摸清了国民党的根底，大伙都不約而同的怠工。

一九四八年冬，徐州大会战(指淮海战役)要胜利了，淮南矿区的国民党吓破了胆。伪矿长和把头們企图不发工人工资，想偷偷地把矿上值錢物资运走，这个阴谋一下子被工人識破了。

一天上午，一輛装满貴重东西的大汽車开到离矿門不远的地方，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砸破了汽車玻璃窗，搬下了物资。敌人被迫发给工人工资。这一阴谋沒得逞，敌人又布了第二条路，把矿上所有珍贵东西，装了五火車皮，他們准备逃往南京找宋子文。这件事被鉄路局工人知道了，他們一报信，这一下可激怒了我們，工人们到矿門口集合，赶到火車站，掀了二、三十米鉄道。国民党还想垂死掙扎，派来了一营兵，乒乒乒乒乱打枪。这样一来工人们都拣起石头和半截棍，人山人海把伪兵围在中間，准备与伪兵搏斗，敌人一看大势已去，便夹着尾巴逃跑了。火車上装的东西，原封未动又运回矿上来。这一次护矿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光荣的煤矿工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淮南解放了。共产党办事都从工人利益出发，处处为我们着想。煤黑子真正当了矿山主人。党提出了安全生产方针，实行了新采煤方法，保证了工人生命安全。旧的矿井逐步改变了面貌，实现了机械化采煤，消灭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建设了工人宿舍，图书馆，俱乐部，医院，学校，疗养院等等一整套文化福利设施。矿工们深情地歌颂幸福的生活：

煤矿工人成了神，
哪天不驾两遍云（指上、下井），
豆什面换来了面和米，
窑黑子娶来了心爱的人，
阳光一照满屋新，
高楼上住着矿工们，
幸福生活哪里来，
仰仗党和毛主席！

一解放工人们都使足劲地干活，人人创新纪录，向党报喜，那时，我虽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觉着自己还像小伙子一样，刨小眼我刨出了班刨十五米的纪录。党把我送到北戴河去休养。据说过去北戴河是洋人、大官僚与资本家养神纳福的地方。住一夜要十八块银洋。早先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工人能到北戴河去休养。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赵扬全坐上火车，在那里休养了四十多天。

解放后十几年来，党和领导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前前后后到外地休养了十次，如果按天计算，共计休养了三百五十八天。在休养期间党和领导川流不息地给我们问好。在旧社会，把我折磨得腰疼腿酸；在新社会，党把我治好了。我大儿在李一矿当副科长，小儿在农村当生产队长，今年春，儿子媳妇都劝我退休，他们说：咱家又不缺吃少穿，你再干工，我们几个居心不忍。一听儿子媳妇这样讲，心中非常难受，我说：“乖乖，你们都忘本了，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咱这一家人早不知饿死在哪个田坎子上了。”全家人听了都哭起来。

张泽均整理

刘勃舒插图

党呵，我的再生母亲

常州民丰纺织厂 赵 诚

我已经五十二岁了，可我真正过人的生活，只是解放后的十四年。母亲生下了我，只能眼睁睁地让我替地主、资本家做牛做马；只有党，才是我的再生母亲，她让我翻身得救，还教育我怎样做国家的主人。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是织部木工间的木工。这几年来，我被厂里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惭愧，我哪里配得上当先进，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而且做得很不够。比方说，当木工的，哪有不爱木螺丝的。这几年，我注意回收木螺丝，旧的还能使用，为啥要去物料间领新螺丝呢？可偏偏他们替我计算，说我为国家节约了材料。厂里有个时期，布机上用的皮圈供应不上。我听说，这要影响生产的，怎么不着急呢？于是，我抽空到厂里厂外寻找旧料修理回用。恰巧，到废品公司里发现一批报废了的A形三角皮带，我便建议供销科买了十担左右改制成皮圈来克服缺料的困难。其实，作为厂里的工人，这也是应当做的事，人们也说是先进事迹。另外，还有一些同志翻陈账，一九五六年我刚

从庆丰厂調进民丰厂，一进厂見废皮仁拋得滿地，总有点不順眼，怎么忍心讓它浪費掉。我就向領導上提出废品翻新的建議，厂党委很重視，就調我出来，还配了一个助手帮我搞。在許多同志支持下，試制成了废品翻新的土机器。这，又被算在我的份上，說我一年中翻新四千五百只皮仁，为国家節約了二千二百五十元。真难为情，这怎能算我的成績呢？應該归功于党呵，归功于大家呀！在旧社会，你有天大的本領，哪有你用武之地。

可不是嗎？我年輕时身强力壯，哪样活不能干。可是，在家乡只能替地主做牛做馬。記得有年冬天，地主叫我到湖里撈猪草，正值西北风呼呼叫，像尖刀似的刺进我那单薄的衣衫里，我冷得嘴唇发紫，手撐不住竹篙，船在水里直打轉轉，怎么办呢？只好空着船回去。哪知狠心的地主見我没撈到猪草，劈头一竹篙，打得我抱头哇哇大哭，接着又是拳打脚踢，我受不了，哭着往家逃。媽媽疼我，也沒办法，她安慰我几句，又劝我到地主家去。我怎依呢？不久，我就憋着这口气，只身跑到上海亲戚那儿，托人介紹到厂里做工。

可是，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我做工，使尽了力气，只能勉强維持生活。我想，苦就苦些，这是命运注定的，只要平平安安过日子，一天三餐能糊上口，那就算了。沒想到，灾难終于临头了，这悲惨的遭遇，害得我家破人亡。如果没有穷朋友們的周济和劝說，恐怕我早就喂了黄浦江的魚虾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个早晨，原动部的工程师不在，老板叫我

去開車。

離開車還有半小時，我去檢查機器，發現馬達有毛病，就立即開了紅燈（開紅燈表示有人在上面修理，不能開車），同時動手修理馬達。

過了一會，突然資本家的少爺跨進車間門，罵道：“癩三，死到啥地方去啦，時間到了還不开車！”他不問三七二十一，推上電閘刀，便揚長而去。而我呢？正在竹梯上修理馬達，冷不防機器開動，手像觸電似的一麻，右手的三個指頭隨聲軋掉，馬上覺得眼前金星亂竄，身不由主，從三丈多高的空中摔了下來。

直到下一班工人來接班，找不到交班的人，却看見油槽里有血。“啊”，接班的工人見我昏厥在車腳底下，不由得大叫起來。接着，工人們都紛紛



围攏来，有的把我扶起，有的擦血，有的摸摸我的胸口还有一点微热，准备送去急救。这时资本家也聞訊赶到，他見我血迹斑斑的脸像紙一样蒼白，怕自找麻煩，眉毛一豎說：“快拖出去，通知他屋里人来收尸，有啥大惊小怪的，哪家工厂不死人！”工人们不忍，他們发揚階級友爱精神，湊了錢，送我到广慈医院急救。资本家却叫人到数十里外我爱人那儿去报丧。天呵，那时我爱人正坐月子，忽听我丧了性命，像晴天霹靂，心中一急，血向上窜，口噴鮮血，不一会就断气了。岳母听说我被机器轧死，又見她的独生女儿急死，霎時間，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和一个刚落地的孤儿，孤苦伶仃，年老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她一时想不开，心一横，便投了黄浦江。我那苦命的儿子，还沒能看清楚他媽媽的臉，就离开了人間。

其实，我並沒有死，我正在医院里跟死神作斗争！可是，资本家却散布流言，說我已經死掉，还吓唬送我进医院的几个工人，說誰再去医院，就开除出厂。不久，我伤势沒有好，医院就逼我出院，要我結賬。我說：“这笔賬要向工厂算。”院方派人向老板要錢，老板却一口回絕說：“并无此人。”医院收不到錢，又回来逼我，我哪来的錢呢？沒有，就做清洁工抵賬。我只好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把右手吊在脖子上，穿着号衣，倒痰盂、擦地板，什么都干。我那受伤的身体，飽一餐，餓一頓，被折磨得像根枯草，曾有几回暈倒爬起，爬起又暈倒。苦挨了六个月，医院覺得在我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又怕折磨死了，反倒增添麻煩，才把我推出医院。

在医院里，我一点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我多

么想念家呵。可是，他们不准我跨出大门一步。等呀，等呀，亲人怎么一直不来看我，她们到哪儿去啦？有时我还默默地责怪她们太沒用了，难道连打听一下都不懂嗎？现在我出院了，真像出籠的鳥一样，怎么不高兴呢？我刚拔腿要跑，突然发现身上还穿着号衣，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当时我昏昏迷迷地被抬进来，怎知衣服脫在哪儿。后来，听一位清洁工說：“到太平間找找。”果然，我在太平間的角落里，发现这件烂得发臭的血衣。那时也不管他什么，穿上就往外跑。跑呀，跑呀，簡直像一陣风。我恨不得一步就飞到妻子身边。金娣呵，你可把我盼坏了，你生下的孩子身体可结实，这孩子是男是女？当时，我的家在浦东，要摆渡过江才能到。可是，摸摸口袋，癩答答的，一个銅錢也沒有。便决定先到厂里去一趟，借几个錢回家。沒料到，刚要进厂門，資本家在那儿，他見了我，馬上眼珠一翻，沉下面孔說：赵誠早死了，誰認識你！“通”地一声把鉄門关上。我气愤地瞪了瞪厂門，沒办法，拔腿就向家里赶去。到了輪船碼頭，船工听我訴說的身世凄苦，他們很同情我，一个錢也不要就讓我上了船。到家已是半夜了，这时候金娣她們一定睡得很甜？我便放声大喊：“金娣呵，金娣，快開門呀，我回来了！”一遍，两遍……我連續喊了好几遍，还是沒人答应。她們到哪儿去了呢？不会，一定是白天家务操劳，辛苦了，我又边喊边捶門。里面的人听得实在不耐煩了，回答：“瞎吵点啥，我家哪来的金娣，你弄錯了吧？”奇怪，自己的家会弄錯嗎？我不相信，便問道：

“此地阿是同兴街第六弄？”

“是的。”

“阿是十七号？”

“是的。”

地址一点儿沒錯，怎么会不是自己的家呢？既然不肯开门，又听声音不像金娣，也不像我岳母，难道是搬了家？她们搬到哪儿去呢？还是敲隔壁的门，隔壁的老婆婆是多年的邻居，她该知道吧！

“老婆婆，开开门，我是赵诚呀！”

老婆婆吓了一跳，赵诚，不是早去世了吗？怎么会来敲门？她把被褥往头上一盖，缩成一团，嘴里直嚷：“赵诚呀，我知道你死得苦，冤有头，债有主，要去找你的冤家对头呵！”

我开始听不懂，还以为耳朵不好，听错了呢。后来才明白她把我当成鬼了。心里一急说：“你不开，我敲到天亮也不走！”闹得没办法，老婆婆的儿子一手拿了根铁棍，在门里问：“你到底是誰？”

“我是赵诚，我没有死，我不是鬼呵！”

他听我的声音，像是赵诚，便把门打开了。好心的老婆婆见了我，不知怎么才好，要把真情实况告诉我，又怕我有三长两短，她可担待不起，只说了句：“你的家搬了。”搬到哪儿去呢？没有说，他要我在这里休息休息，等天亮就送我去。

老婆婆知道我沒吃饭，便烧了飯給我吃，又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被头，安排我睡的地方。睡觉的时候，她翻来复去，弄得床吱吱响，我也睡不着觉。原来，她不想让我知道伤心事，在千方百计想点子！过了一会，她叹了几声气，自说自话：

“唉，这件事怎么办？”我睡的地方和她只有一板之隔，听到了，惊异地问：“婆婆，你为啥叹气，什么事这么伤心？”婆婆马上撒了个谎，回答说：“我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昨天相骂，我气坏了。”

“婆婆 不要气，以后我来劝劝他们。”

天亮了，我要婆婆告诉我，她们搬到啥地方？可婆婆怎么也不说，只是苦苦劝我别走，至少也要等她那个在厂里做夜班的大儿子回来再说，我以为她要我劝劝她的儿子，也就答应了。

吃过早饭，她大儿子吴生根放工回来了。他是个直性子的人，看见我大吃一惊，嘴里嚷道：“你……还活着？”

“我……活着。”

“唉？！……”他低下了头。

“唉什么，你兄弟俩吵架了，是吗？”我问。

“没有呀？”

“那你为什么叹气？”

“你还不知道哇？”

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 细细思量一下，大概是他们以为我死了，其他并没有想到，便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呀！”

“嫂子……”

“嫂子怎么样？你说呵！”我着急地问。

“她们，全死啦！”

“啊！……”

这突然的噩耗，我连做梦也没想过，不觉天旋地转，站立

不住，再加我身体弱，經不住这一刺激，便暈倒在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劝我定下心来。我怎定得下心呢？当时我哭成了一个泪人。亲人，飯碗，什么都完啦，我到哪里去呢？还不如早点死掉算了，我呼天喊地，两只眼睛絕望地望着黄浦江。这时，老婆婆的大儿子，一把揪住我，說：“赵誠，你千万不要走絕路，要死，也得拚死在老板面前，鬧他个三缸六渾，这冤仇你不能不报呵！”这句话照亮了我的心，这天大的冤仇，我怎能不报呢？我捏紧拳头，咬紧牙关，恨不得把那吃人的旧社会和残酷的资本家捏个粉碎。可是，光我一个人有啥用？我能把资本家怎样，他們家里有一批狗腿子，厂外又有宪兵、警察做靠山。去法院伸訴去！法院怎么会替穷人講話，就算告上了，哪抵得上资本家到茶館請次客！不行，我鬧了大小好几次，都失敗了。我，经历了种种苦难，这时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帆，除掉一些亲近的穷朋友周济之外，什么希望都沒有。我到处流浪，上海待不下去了，就回到常州。

一九四九年四月，常州解放了，我和其他被压迫、受剝削的阶级弟兄一样，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不久，我参加了工会，又被推选为工会主席。这时，我见到了光明，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心里非常激动。

一天，我下班时，遇見家乡的四个民兵，在大街上飞快地奔走，便赶过去問个究竟。哦，他們是出来寻找家乡的逃亡恶霸地主陈荷生的。提到地主，就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过的牛馬生活，过去的仇恨又涌上心头。我主动提出帮助民兵緝拿陈荷生。我問：“你們晓得他逃到啥地方去啦？”

“不知道門牌，只知道巷名。”其中一個民兵回答。

“不礙事，有地方就好辦，我幫你們尋。”

從此，每當班後工餘的時候，我就獨個兒到民兵說的那條巷子里躡躑，嚴密地注視着來往的行人。朝朝暮暮，不知過了多少天，什麼線索也沒發現，可我並不灰心，還是堅持在街頭巷尾尋找。果然，有一天深更半夜，我看見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影竄進巷口，就緊盯着他追進去，愈走愈靠近，等我看清了這就是地主陳荷生時，我心里暗暗罵道：“狗養的，看你藏到哪裡去！”忽地“吱呀”一聲門响，陳荷生這個賊不見了。我悄悄走到門前，用手电筒把門牌一照，默默地記住門牌號碼，才回頭往家中走去。

第二天，我帶了民兵來到這家門口，一推門，一個中年女人迎門坐着縫針綫。“同志，有什麼事？”那女人驚疑地問。

“找陳荷生！”

“這裡哪有陳荷生？你摸錯門牌了。”她不滿地回答。這時，我靈機一動，鎮靜地說：“沒錯，他約我來的嘛！我是廠里的。”說着，便用手指着廠徽，表示我確實是有事找他。“前些時候，他托我在廠里找點事，現在找到了，請他去上班。”那女人用手扶起架在鼻梁上的眼鏡，起初冷淡地看看我，一會兒就微笑了，她以為這下陳荷生有隱蔽的地方了。做廠最保險，他成了“工人”，還怕什麼？可她還不放心，不時地抬頭看看我，見我樣子很誠懇，才信任地說：“謝謝你，現在他不在家，你到前面大街上集成百貨店找他，他在那裡。”

我走出門，又帶着民兵在集成百貨店門口布置下來。我



只身走进店門，地主陈荷生見了我，知道是同乡人，拔脚就向灶堂里逃。我追上去，当胸一把揪出了他。这个血債累累的恶霸地主面色灰白，像只臃肿的螞蟥瘫痪在地。我气得眼睛直冒火星，用力

一擰，把他提到大門口，讓民兵轉交給有關部門依法懲办了。

旧社会給我种下兩顆階級仇恨的种子，一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欺凌，叫我一家沒法过活，逼得我十三岁当小伙計，十五岁只身漂泊到上海寻口飯吃；二是資本家对我的殘酷剝削，压迫，弄得我家破人亡。今天，我能亲手逮住恶霸陈荷生，怎不快活呢？我边想边回家，心里說不出的痛快。

一九五二年搞“五反”运动，工厂里展开了一場尖銳的階級斗争。我原来所在的常州庆丰布厂的不法資本家刘桂坤，解放前和武进县伪县长湯人杰有勾結；解放后，一貫对党不滿，敌視工人运动。他不光是搞偷稅漏稅，抽逃資金，还暗藏着一支手枪，梦想有一天用这支枪对付工人階級。这些罪恶

行为叫我怎么能不管呢？我多么向往有这么一天，发动工人弟兄一起和他清算这笔账。党是最了解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意的，厂里的“五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和大家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和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有一次，我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找不法资本家刘桂坤到工会谈话，要他坦白交代。刘桂坤见没有别人，就要花招，起先是一口抵赖，后来见蒙混不过，又满脸堆笑地说：“赵主席，我们自己人，有话好说，要是你身边不便的话，在我这里先拿一千万元（旧币）用用，小意思嘛，何必闹得面红耳赤！”

“好啊，一千万元拿来！”我压住大气说，心想，你这狐狸精，解放前无恶不作，现在倒装得这么慈善。哼，你想用金钱收买我，我非拿到党支部去揭发你不可。刘桂坤听了我的话，又满脸堆笑，以为万事大吉了。我见了他这副样子，脸都气紫了。“你笑我只值一千万元，是吗？呸！”我再也忍不住了，就拍桌骂道。刘桂坤以为我嫌钱少，转脸陪笑说：“好商量，好商量。”他换了口气又说：“我家有两个老婆，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常州，都不错，赵主席，你……”

“两个怎么样？”我没等他讲完就反问。

“尽你拣一个。哈哈。”

我受到这种侮辱，牙一咬，“咚”的一拳打在桌上，骂道：“放屁，你想腐蚀我，我不是你们那种人！放老实点，休想在我身上做梦！你逃多少税，抽了多少资金？枪藏在什么地方？赶快交代！”他听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忙说：“赵诚，我和你无冤无仇，我哪来的枪？你分明是要我的命！”他边说边将衣

袖一卷，露出一副恶狠狠的面孔，說：“好，別的先不說，槍，你查好了，要是在啥地方查到，你就在啥地方槍斃我。查不到，你可要負責！”哼！他想一下吓倒我，可他嘴硬骨头酥，心里很慌，因为他确实藏着一支手槍，他明明知道我見過這支槍。這時候，我鎮靜地說：“槍，總是要搜查的，可現在還得靠你自覺，劉桂坤，你放老實點，拿出來，沒啥。以後到了搜的時候，你可要負責！”說完，我就轉身走了。

鬥爭越搞越深入，我和工人們經過一番苦心調查，終於知道了這支槍藏在什麼地方。於是，我又去找劉桂坤，要他交代。他很不老實，還在打如意算盤，以為沒人知道，擠不出一句話來。看來非搜查不可了，於是，我配合公安部門，依法辦了手續後，到劉桂坤的小老婆家，把這支槍搜了出來。這個不法資本家終於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我經過了階級鬥爭的鍛煉，受到黨的教育，階級覺悟提高了，立場更堅定了。我懂得過去受的苦是階級苦，心里積下的仇恨是階級仇恨，我要求加入我們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階級復仇，為偉大的事業奮鬥。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黨接受了我的請求。當我舉起右手向黨旗，向毛主席像宣誓的時候，我激動得流淚，千言萬語，不知從哪里說起，臨了說了幾句話，黨呵，我的再生母親，我要按着你指示的方向前進，不管工作有多少困難，也不管階級鬥爭多麼複雜，我一定做你的忠實的儿子；站在鬥爭的最前列！

蔣才喜 蔣仁法整理

柯 明插圖

“五一”节的回忆

杭州市重工业局副局长 吳宝坤

一九六三年“五一”节又到了。

在我的一生中，已經参加了十四次紀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十三次是在解放后，一次是在解放前。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五〇年那两次。这两次“五一”节是在两个不同时代里度过的，拿它一对比，可以看出我們工人今天的政治地位，有了怎样的变化。

* * *

解放前，我曾經在兩水县一家官僚資本家办的浙江鉄工厂当工人。那时，老板根本不把我們工人当人看待：进出厂要搜身，大小便要报告……工头們拿着鞭子在車間里走来走去，逼着工人干活。什么国家大事呀！政治活动呀！啥也不叫我們知道，啥也不讓我們参加。我們工人很长时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我們自己的节日——“五一”劳动节。

有一天，我們宿舍旁边的土地庙里，住进了几个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干啥的，只知道他們对我們工人很好，教我們識字，教我們唱歌，还告訴我們：工人兄弟要团结起来……我覺

得他們講的話有道理，就經常上土地廟去玩。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我和老孫等幾個朋友又上他們那兒去談天了。我們談着談着，忽然他們中有人壓低了聲音對我們說：“明天是你們的節日——‘五一’國際勞動節，知道嗎？”

“我們的節日？”我們都感到奇怪，“啥叫‘五一’國際勞動節呀？”

“喏，就是全世界工人兄弟團結起來，爭取……”他們源源本本地把“五一”節的來由和意義告訴了我們。這些話，聽來多新鮮、多貼心呀！我們商量了一會兒，決定要好好慶祝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們七、八個工人一齊走到監工面前，說：今天是“五一”節，應該放假一天。監工沒料到我們會來這麼一着，牛眼一瞪，頭一歪說：“放個屁假，廠里沒這個規定。”

“半天呢？”

“半天也不成。”

我們幾個人合計了一下，覺得人少，不宜多爭，就一道遞上了七、八張事假條。監工这下沒辦法了，一面收下事假條，一面威脅着：“哼，月底扣工資。”“扣工資”對我們工人，確實是很厲害的一着，特別是家裡人多、吃口重的人，困難更多。可是我們寧願餓肚皮，也要好好地慶祝一下自己的節日。

這天，我們集合在土地廟里，談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談了工人的生活，而談得最多的是資本家怎樣剝削壓迫我們工人，這大大激起了我們對資本家的

階級仇恨。在旧社会，工人不仅沒有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甚至連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被剝夺了。記得我在大有源翻砂厂当学徒的时候，有一天，天气特別热，我們翻砂工身上又是汗又是灰，粘搭搭地怪难受。想洗澡，厂里沒有



澡堂，我們几个学徒工就在老板、工头回家吃午飯的空暇，走到厂背后的臭水塘里去洗一洗。誰知，正当我們快要洗好起来的时候，老板已气呼呼地拿着皮鞭拄着腰在門口等着呢！我們衣服也沒来得及穿，就慌慌张张地跑进去，进去一个，他就揍一个，个个人身上留着二寸来寬的血痕。在旧社会，工人竟連洗一个澡的自由都沒有！我还記得，有一次我在大众翻砂厂做工，做了一个多月，老板連一个子儿都不发。我和三个

工人一道去向老板要工資，老板回答：“沒有錢！”我們知道他不是沒有，只是想把這筆錢放在銀行盤剝利息罷了。於是，就和他吵了起來。最後他看看沒法擺脫，只得答應緩幾天發。哪知道，就在這天晚上，突然來了兩名警察，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們四人帶進拘留所，扣押了一天一夜，理由是我們同老板吵架。看看，在舊社會，工人要求按時發工資竟也是一條犯罪行為！

我們幾個人越談越氣，越覺得工人只有鬥爭，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後，我們還義憤填胸地唱了一支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歌。下午，我們七、八個人就把事先寫好的標語塞在褲里，悄悄地分頭走到隱蔽的又能讓工人看到的地方張貼。那天，我們從翻砂間一直貼到離工廠三、四里遠的湖邊村，一共貼了二百多張。記得我是和老唐、老陳、老應四個人一道去貼的，兩個粘漿糊，兩個貼標語。我們心里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工人兄弟們知道自己的節日啊！

標語貼出來後，工人們看了都很高興，老板們見了却害怕得要死。“五一”節過後第二天，標語就全部給撕毀了。從這次紀念“五一”節，使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看清了資本家是最怕我們工人組織起來的。於是，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就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罷工，規模一次比一次大，鬥爭一次比一次尖銳……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了——我們整天盼望的這一天終於到了。我們可以堂堂皇皇地慶祝我們自己的節日了。一九五〇年我們慶祝了解放後第一個“五一”節。這個節日過的可

开心啦，是我今生不会忘記的。当时我已經被工人兄弟选为杭州市机鉄业工会第二分会主任。“五一”前夕，我第一次和同志們一起捧着提前完成全月生产任务的喜报向自己的节日献礼；我第一次敲鑼打鼓地把自己亲手写的“全世界无产階級团结起来”的标語貼在工厂大門上；我第一次以工会干部的身份，向工人們作报告：“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們工人階級自己的节日，国家规定放假一天，工资照发……嘴里說着这些話，心里感到甜蜜蜜的，我們工人可真是当了主人了。那几天，我兴奋得像着了迷似的，白天搞生产，晚上参加节日筹备工作，常常搞到深更半夜，不但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反倒愈干愈有劲，愈想愈兴奋。脑子里尽是翻騰着解放后看到的新鮮事：

“解放后沒几天，我去工人政治訓練班学习。一跑进門就有两个人笑嘻嘻地迎上来，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說：‘来学习啦，欢迎！欢迎！’我奇怪了，这是誰呀，怎么刚見面就像老朋友似的熟悉？后来，有人告訴我，这两个同志，一个是下城区区长楊雪岩，一个是工会筹委会主任孙文成。我听了以后楞住了，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拿惯了鐮头的粗手，摸摸掌心里的老茧，自言自語道：跟区长、主任握手，还是第一次呢！真是世道变了！”

“解放后第四个月，我出席了杭州市工会代表大会。想不到在这个会上，我們当时的市长江华同志，也坐下来和我們一道討論为工人謀福利的大事！他們認真地記下我們的要求，还叫我們对劳资关系政策提意見呢！”

“……………”

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五一”那天早晨,我四点钟就起身啦,穿上一套新人民装,加入了游行队伍。那天,我第一次大声地喊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

*

从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五一”节,可以看出我们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已由过去被压迫的奴隶地位,提高到今天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天翻地复的,是我们无数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怎能不时时刻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生产、工作和学习。

朱梅莉 徐 玲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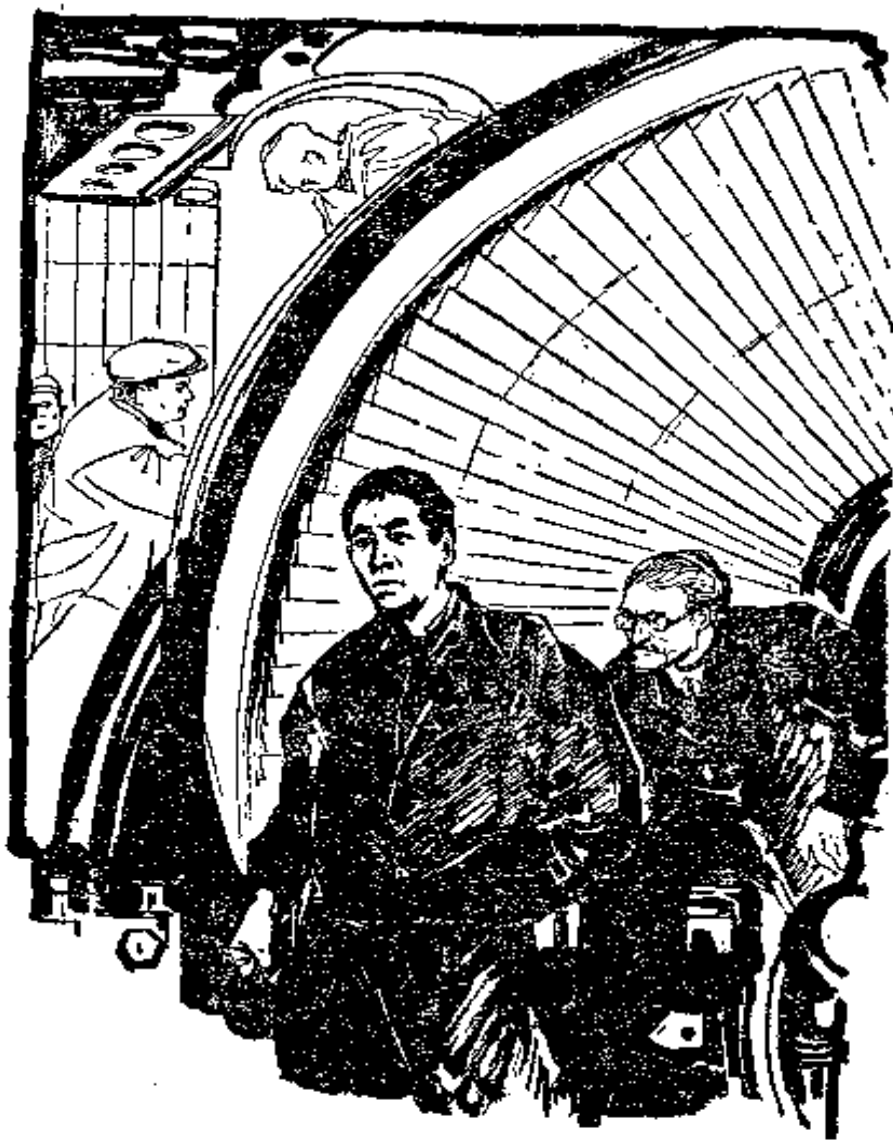
刘勃舒插图

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程师 鲁宝林

每当我跨进汽轮机车间，听到阵阵震耳的机器声，总是感到分外亲切。因为我已經在这里工作四十多年了，这个车间里大部分机器的安装工程，我都参加过的。我就是闭上眼睛，也能叫得出它們的名字，甚至記得清每台汽轮机上有几个螺絲釘。看到这些机器，也使我时常回想起过去的苦难岁月和那受尽屈辱的日子。

喏！就在这台英国的汽轮机旁边，記得一九三四年安装的时候，我怀着好奇心向負責安装的一个英国人問了一声：汽轮机主軸的間隙是多少？誰知这家伙眼皮也不抬，面孔一沉，死样怪气地說：“哦！你也要問这个？你去讀了二十五年書以后，我再来答复你的問題。”他把二十五年这几个字說得特別响。当时，我是一个青年工人，对技术方面的問題什么也不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懂得中国人应当有什么样的骨气。所以我牢牢地記住那个英国人的話。我想，总有一天，我們中国人也会造出汽轮机来，到那个时候，我們就装一台給你們看看，叫你們認識認識中国工人！



这以后，我就拚命鑽研技术，用心向老师傅学习，老师傅怎么干，我就跟着学。但是，那些外国人非常狡猾，比較重要些的技术工作都不叫我們做，不要說老师傅，就是中国实习工程师也別想看到。有一次，安装一台德国造的

汽輪机，負責施工的德国人，对一些比較精密的工作都自己动手，不要我們参加。帝国主义分子真狠毒，他們想永远不讓我們掌握这些技术，这样就可以永远騎在我們头上欺压我們。我当时想，要将来自己安装机器，現在无論如何得把他們这些“秘密”学到手。一天，机会来了。德国工程师刚装好叶輪，因故离开了車間，我急忙走过去用塞尺測量一下，看看他装的叶輪和机壳的間隙到底是多少？誰知道，我正在測量的时候，这

个德国人回来了。他像凶神似地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够了又諷刺我說：“我做得不对嗎？那就請你說說：應該是多少間隙？”這話是多氣人呀！

这种气人的事說也說不完。当时，还有些家伙，什么工作也不会做，屁也不懂，只凭他的“黄头发、綠眼睛”，照样可以任意欺压我們中国人。这些人进厂的时候，穿着破皮鞋、旧西装，十足的“洋装瘍三”，竟也当起什么領班、車間总管，要不了几个月就住起洋房，进出汽車了。那时候，厂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話：“不管技术好坏，只看皮肤黄白。”从厂长泼利斯到专管出灰工人的泰納尔都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就好像天生低人一等似的。然而，厂里哪一台汽輪机、哪一台鍋爐不是我們中国工人装起来的呢？中国工人的血汗，变成了黄金和白銀，源源不断地流到美国和英国去了，流到美国老板和英国老板的衣袋里去了。

还記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曾想：这一下总可以出口气了。国民党也是中国人，总要爭口气的。哪知道，国民党和美国老板是一路貨，只管自己刮鈔票，造洋房，拍美国人的馬屁，哪有一絲一毫中国人的骨气！甚至当时汽輪机上的一块隔板、一个螺絲釘都得从美国进口，哪里談得上自己制造、自己安装汽輪机！我想：自己四十多岁了，这輩子要出这口气是难了！可是我总是幻想着：有那么一天，我亲手来安装一台汽輪机。

嗨！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我幻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一九五八年，我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梦”终于

变成了现实。当我听到厂里要安装上海工人自己生产的六千瓩新汽輪机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也要掉下来了。

八月二十三日清晨，天蒙蒙亮，我第一个来到了安装現場，摸着这嶄新透亮的汽輪机，感到渾身都充滿了力量。我算了一下，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五八年，整整二十四年已經过去了。此刻我好像看到那个英国人正恶狠狠地指着我说：“你去讀了二十五年書以后，我再來答复你的問題。”我还要他答复什么呢？我們国产汽輪机已造好了，我馬上就要动手安装了。

“有党的領導，有大家的支持，我們一定要比裝任何一台外国貨汽輪机裝得又好又快，为中国工人爭气，为祖国增光！”我当时暗暗在心里发誓。

这一天，我的老战友——早已退休的起重工徐和全听到厂里裝国产汽輪机的消息，天一亮就赶到厂里来。党支部書記想劝他回去，他笑笑說：“那不行，我干了这么多年，总算看到了厂里第一次裝国产汽輪机。这一回真长了我們中国人的志气，我这个老头子要好好出把力呢！”他說出了我們所有老工人的心里話。

講到安装汽輪机，解放前最快也得一年左右。我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外国专家”裝×号汽輪机的时候，光是校正汽缸水平就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時間。就拿那个要我“去讀了二十五年書以后”再答复我的問題的“外国专家”來說，他負責安装的一台汽輪机就搞了一年多呢！

“要爭气，就得比他們裝得快，裝得好！”我們大伙都这样想。所以在安装中，我就和大家一起商量提出了先安装冷凝

器、再安装下汽缸的方法，这样，校正汽缸水平时间大大缩短了，前后只花了十一个小时。

正在紧张安装阶段，不巧，厂里高压锅炉出了故障。为了不影响发电，我们提出了“一双手抵两双手用，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顶”的倡议，抽出人去支援修锅炉。安装工作仍在飞快地进行着。到了第三天，住在控江三村的我们厂里工人的家属，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慰问队，热情地来慰问鼓励我们，还送来了精美的点心。闸北发电厂党委听到我们电焊工不足，就立即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支援。在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援下，安装工作顺利地进行着……。八月二十八日零点二十五分，我们终于以四天零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的速度完成安装任务，创造了我国电力设备安装史上空前的纪录，为我们的祖国增添了新的光辉！四年多来，这台国产汽轮机一直安全平稳地在运行。每天，我走过它的身旁，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们，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

现在，让那些鄙视中国工人的帝国主义者们伸长头颈瞧瞧吧！我没有读过二十五年书，参加安装的所有老师傅也没有一个人读过二十五年书。没有读书，这不是我们的罪过，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过。但是，从我们漫长的痛苦和屈辱的岁月里，从解放后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们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我们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责任，知道自己有力量。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剥夺了读书权利的老工人，今天不是当上了工程师、技术员，就是成了生产上的骨干，我也在一九六〇年被政府提拔为工

程師。我們懂得了只要緊緊地依靠黨，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大的成績！

我現在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但是，我感到自己還很年輕，我們國家還沒有擺脫“一窮二白”的面貌，世界上還有占總人口三分之二的被壓迫人民沒有解放，我還要干，要為建設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事業貢獻出一份力量。讓青年工人也記住這一些，永遠保持中國工人的骨氣，做“紅色堡壘”的紅色工人。讓一切敵視我們的帝國主義、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面前發抖吧！

朱兆富整理

劉勃舒插圖